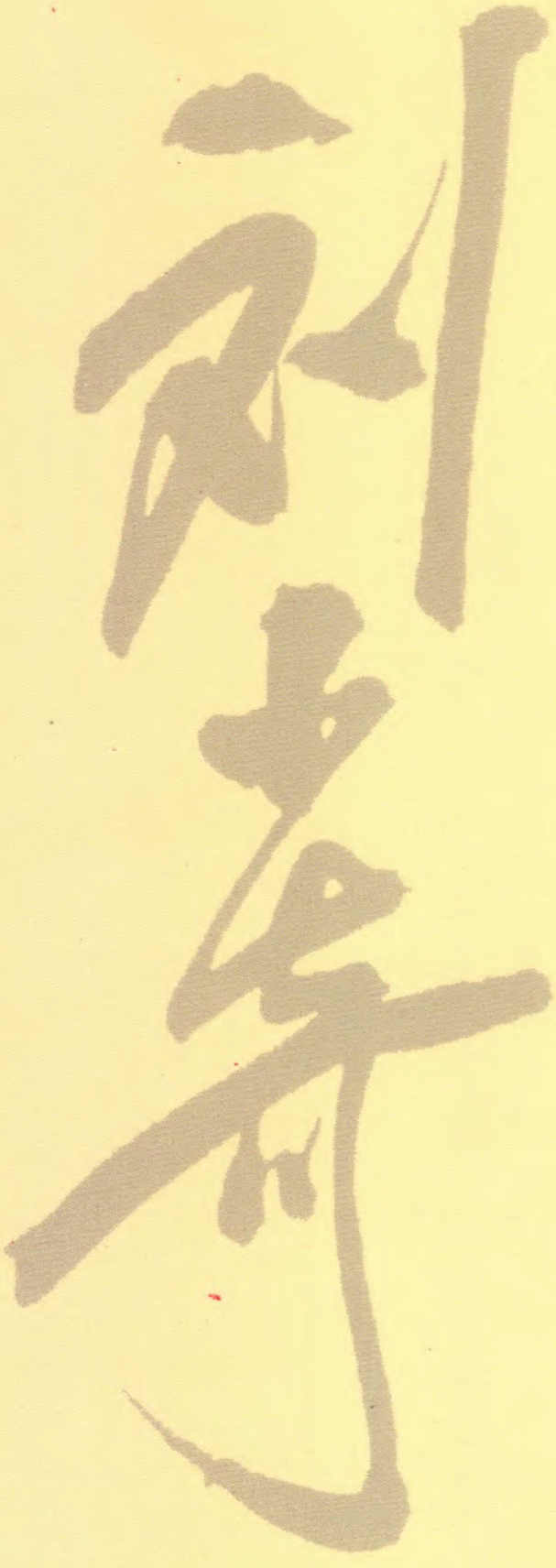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十一册



ISBN 978-7-5073-4689-3

定价：70.00元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十一册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073-4689-3

Ⅰ.①建… Ⅱ.①中… ②中… Ⅲ.①刘少奇(1898-1969)—文集 Ⅳ.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5372 号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十一册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　央　档　案　馆

责任编辑／张文和　宋柏晴　杨　平　王卫芳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http：//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63097018　66183303　66188019　66552519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华艺公司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80×1230mm　32 开　20 印张　512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4689-3　　定价：7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 版 说 明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选稿范围是：（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电报稿、题词、修改件中加写改写的文字等；（二）经本人审定过的讲话、报告和谈话记录稿；（三）非本人起草但经本人审定用本人名义发表或根据本人谈话内容整理并经本人审定而以其他名义发表的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一小部分未曾印发过。未经本人审阅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

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在作者生前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刊印；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刊印；已经编入《刘少奇选集》的，按选集版本刊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注明刊印所依据的版本，有的还注明了发表情况。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号和〔〕号内核正，衍字加□号。文稿中史实不准确的，照原稿刊印，加注释说明。原稿标点一般照排，对明显有误者加以订正，没有标点的加标点。文稿原来没有标题或原有标题不适合本书体例要求的，由编者拟写或改写了标题。编者认为内容较重要的文稿，其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排印。

注释排于篇末。每个注释的详略程度根据理解正文的需要而定。正文中涉及的来文、来电、来信及其他文件，一般都作了注释，少数未能查到原件者，暂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　央　档　案　馆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1）
关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遇袭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2）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4）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六二年一月）……（96）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106）
中央关于已安排的协作、加工定货、物资分配、
三类物资收购等处理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142）
祝贺尼泊尔民主日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144）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47）
对财政部关于《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
大量亏损》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48）
祝贺摩洛哥王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149）
对《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
严重》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151）
对《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153）
对陈云等关于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二年三月）……（155）
给段树成等人的信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159）
接受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易卜拉欣·扈利
递交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161）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六二年三月）……（163）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稿的修改
（一九六二年三月）……（172）
对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
报告稿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176）
祝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78）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印发刘少奇谈话要点请示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四月四日）……（183）
关于阅发陈云有关经济工作意见摘要问题
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185）
关于任命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命令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187）
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188）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等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
运动情况报告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189）
对谢富治关于甘肃省公安工作中几个问题报告的
批语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92）
对关于部分军事部门违规修建计划外工程材料的
批示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193）
接受摩洛哥首任驻华大使兹尼贝尔递交国书时的
答词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195）
对无锡市机电工业产品大量积压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199）
对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201）
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202）
对《内部资料》第八期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205）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提纲

（一九六二年五月） …… （207）
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问题给广州市政府的信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 （213）
关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遇刺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 （215）
对《大豆怎样吃法更好？》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 …… （217）
关于楼堂馆所收归国有统一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 …… （219）
对中央批发国家经委党组两个文件的指示稿的修改
（一九六二年五月） …… （221）
对中央批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大区经委主任
会议的报告》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 …… （223）
接受加纳新任驻华大使默塞尔递交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 （224）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
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稿的修改
（一九六二年五月） …… （227）
对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全国各地货币回笼情况
资料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二年五月） …… （229）
对《机关生产的弊病很多》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 …… （231）
同意发表霍查演讲摘要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 …… （233）

对《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对外贸易收购工作的通知》
稿的修改
（一九六二年六月） …… （234）
对《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六月） …… （235）
对反映农民搞单干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 …… （242）
接受蒙古新任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递交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 （243）
祝贺加纳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 （245）
对石家庄市委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
几点意见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 …… （247）
祝贺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 …… （249）
关于约请刘建勋等来京谈农村工作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七月） …… （251）
对刘建勋等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七月） …… （253）
对谭启龙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七月） …… （255）
对中央政法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
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 （257）

中央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259）
对无锡市传达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宣传
要点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七月）……（267）
中央关于讨论《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269）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271）
关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袭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273）
关于暂不付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274）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276）
祝贺中国加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279）
对中办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桥西公社社办工业
调查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282）
对国家经委、计委关于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大力
开展木材节约代用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二年九月）……（284）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者决心进一步
同美帝勾结》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九月） …… （286）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六二年九月） …… （287）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 （292）
祝贺本·贝拉就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总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 （306）
关于合理开发西双版纳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 …… （308）
给刘允若、刘涛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 …… （310）
对《一家国营商店和一家合作商店的比较》
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十月） …… （312）
中央批转石家庄市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
问题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 （314）
对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
决定稿的修改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 （317）
致胡志明的感谢电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 …… （320）
对《列宁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 （321）
祝贺坦噶尼喀共和国成立及尼雷尔就任总统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322）
中央转发关于加强水产科学技术和畜牧兽医工作
两个建议材料的通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324）
对中办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工商关系问题和处理
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326）
对中央转发关于组织农民冬闲劳力清理采伐迹地
报告通知的批语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328）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控制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
等问题通知草稿的修改和批注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330）
关于会见日共袴田里见等人给杨尚昆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一月）……（332）
关于木材加工、利用等问题给薄一波等的信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334）
接受老挝首任驻华大使苏万拉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337）
关于必须综合利用农村动力机械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339）
在北京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时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341）
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343）
祝贺尼泊尔民主日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350）
在北京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时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353）
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355）
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357）
刘少奇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公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376）
祝贺中国、巴基斯坦签订关于边界问题协定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382）
为学习雷锋题词
（一九六三年三月）……（384）
在欢迎老挝国王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385）
在老挝国王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389）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二十四日）……（393）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395）
哀悼慰问在印尼阿贡火山爆发中遇难受灾居民
给苏加诺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397）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条例的命令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3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399）
致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邀请书
（一九六三年三月）……（401）
关于接受邀请访问越南事给胡志明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404）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405）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首府巴塘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4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421）
在奈温将军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428）
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试验的历史阶段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435）
在缅甸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440）
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442）
祝贺印度尼西亚接管西伊里安行政权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444）
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4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453）
在金边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461）
关于邀请崔庸健访华的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468）
给女儿刘平平的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470）
在越南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472）
在中越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节选）
（一九六三年五月）……（477）
在河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500）
在河内阮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512）
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518）
关于校对中越两党会谈记录事给周恩来等的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533）
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稿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三年六月）……（535）
在欢迎崔庸健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540）
在崔庸健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 （546）
对李富春因病住院后工作安排问题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 （550）
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552）
对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
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三年六月）…… （567）
对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
会议报告通知稿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 （569）
中央关于继续中苏两党会谈的指示电报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 （572）
关于应邀访问朝鲜事给崔庸健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 （574）
对《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
（一九六三年八月）…… （576）
在朝鲜欢迎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579）
在朝鲜咸镜南道和咸兴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584）
在平壤举行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588）
祝贺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 （592）

祝贺乌干达独立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593）
慰问古巴遭受飓风灾害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594）
对《群众反映》摘登的一封干部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595）
对《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
公开信》稿的修改和批语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596）
给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598）
对印发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
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七日）……（600）
祝贺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602）
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在
群众中进行反修宣传试点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604）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
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606）
致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614）
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615）

祝贺桑给巴尔独立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616）
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
中央的公开信》稿上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617）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

胡绳[2]同志：

此件我又把前面几段看了一遍，有一点修改。国内形势部分还有些地方是别扭的，请你们明天好好再改一遍。又，明天工作会议各小组可能开会，请你们派人去听取意见。

刘少奇

八日下午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二十一《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首页上。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2〕 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关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遇袭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亲爱的总统阁下：

惊悉你于1月7日在望加锡遭到帝国主义指使的暴徒的袭击[1]，谨向你致以亲切的慰问，并且对这次事件的不幸牺牲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正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号召和领导下，积极准备收复自己的神圣领土西伊里安[2]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竟然企图对阁下进行暗害。这就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甘心放弃它们的殖民统治，为了阻挠和破坏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它们不惜采取最恶毒和最卑鄙的手段。

我们深信，在阁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在解放西伊里安的正义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可以指望得到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支援。胜利必将归于印度尼西亚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月9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前往望加锡体育馆途中，遇暴徒手榴弹袭击，幸免于难，现场三人被炸死，二十八人被炸伤。

〔2〕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以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许多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同志。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

在这个报告里，准备说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党的问题。

一　目前形势和任务[2]

国 内 形 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十二年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解放后所创立的空前未有的大统一的局面，日益巩固起来。

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建立了基础比较强大、部门比较齐全的重工业。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教

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

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一步地巩固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提前了两年，在一九六〇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

第二，我国的基本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

的增长。

第三，我国机械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各个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第五，地质勘探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我们对于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我国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3]

第七，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有很大的成绩。农业机械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国营农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八，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这支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已经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

第九，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十万人。

第十一，我们在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第十二，我国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

就。

这一切成就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能够发挥的潜在力量，是极为巨大的。

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滋长。

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农业的严重

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4]

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中央认为，有一部分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都及时地制定出来，有些政策则规定得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这几年来，一些过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

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在这里着重地谈到过去四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研究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清楚错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地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这不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表明我们党一贯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而且也表明我们党对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争取新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早已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农村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一九六〇年冬季，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6]，党的各级组织在农村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拟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7]。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

普遍试行，时间并不很久，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虽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农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情况的这种逐渐好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目前许多困难的克服，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六一年秋季，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8]，这是继续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同志几年来多次指出，计划工作没有做好，指标过高，变动过多。他要求，必须落实，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一九六〇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可惜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没有具体执行。一九六一年五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10]。七月间，中央根据许多调查研究的材料，根据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拟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11]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12]。中央指出了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切实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提出了调整工

业指标的具体方案。这两个文件，经过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13]的讨论，已经正式下达。

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关于精减职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著。

在商业方面，一年多来，中央作出了一些关于调整商业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规定草案四十条[14]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15]。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稳定市场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半年来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根据调查研究的一些材料，中央正在草拟商业工作条例初步草案[16]，过些时候将要发到全国试行。

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

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目前农业生产的底子还很薄，能够拿出来支援工业和供应城市的东西还不能很多。工业总产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市场的供应仍然很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一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加重了。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

这里要指出，由于农业减产，一九六一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五百二十多万吨（一百零五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们还需要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粮食。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要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或者进口一千七百万吨化学肥料。同志们，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把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粮食方面，我们就不能进口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种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妨碍极大，必须迅速改变过来。

中央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

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必须看到，我们完全有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十二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创造了相当强大的物质条件，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

基本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经验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

代价那么高。”

在最近几年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错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但是，永远不犯错误，完全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设想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功往往是要经过许多挫折的，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们的建设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我们学会建设工作的学费。

我们能不能在取得建设工作的经验方面，比取得革命经验少花费一些代价呢？应该说是能够的。问题在于我们全党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过去十二年中，特别是过去四年中，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经验。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经验，是很可宝贵的。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重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同时，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为工业和

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17]

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反对所谓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决不能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团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任何部门、地方或者企业，如果违反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自由地处理供、产、销的问题，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

力量。

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积累，但是，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积累恰当，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积累过多，反而会妨害生产的发展。

应该在有计划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应该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

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

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该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

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同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专政或者法西斯专政，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把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实践中、在群众的行动中，继续补充、发展或者改正这种意见，并且使正确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

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统一。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在制定计划、指挥生产、处理产品等方面，同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也迫切地要求统一的党的政策和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人和农民都怕政出多门，怕政策和计划多变，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如果发生了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也就必然同时出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集中统一的现象。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违反他们的愿望。

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商业，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以外，还应该有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例如：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还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

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

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8]。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19]

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艰苦奋斗几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

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20]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挂帅，就是党的路线挂帅，党的政策挂帅。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学会精打细算，并且细致地安排具体工作，反对“政治空谈”。

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

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21〕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22〕，并且根据积累的经验，正在各个方面制定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使全党全民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

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经验教训，是全党同志应该深刻领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间向我们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23〕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去做。

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和全体人民群众所期望的那样，鼓足扎扎实实的干劲，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任　　务[24]

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

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们要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这个远大目标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央认为，现在拟定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我国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

钢：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二千八百万吨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上列的产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编出确实符合实际的、并且留有余地的计划。

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指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

在一九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有些方面还没有很好地进行。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按实际需要说来，已经迟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

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

要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发展大牲畜，必须认真保证制造和修配中型农具所需材料的供应。

第二，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且力争超过。

第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尽可能在春耕以前，至迟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减人任务，并且进一步地规定下半年的精减任务。对于减下去的人，应该妥善地加以安排。这是加强农业战线、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必须坚决保证完成。

第四，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一切停建、缓建项目的设备、材料和建筑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妥善保护，不许损坏。

第五，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

生产。

第六，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发展城乡交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和正确的物价政策，改善市场状况，努力保证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要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钢材的品种。

要切实地加强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短途运输工作。

第八，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

第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实现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项任务，切实把调整工作做好，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从而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的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

员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少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全国贯彻执行。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十年奋斗目标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二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更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

行动。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

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

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

作风是互不相容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

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理会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25]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

当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懂得。我们自己不懂得的事情，群众中有许多人是懂得的。就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问题来说，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

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中所说的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

很明显，如果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办公共食堂，如果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讨论，事情就不会是那样。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着使同志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们准备在后面再逐步地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

像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怎么会不妨碍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呢？怎么会不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相抵触呢？怎么会不同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相抵触呢？这种错误的做法怎么会不造成分散主义呢？

分散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对党中央闹独立性，对人民群众、对下级独断专行，压制民主。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我们纠正了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以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对分散主义熟视无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会使我们很难前进。

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属于分散主义性质的许多混乱现象。

先说政策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些同志、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采取了不严肃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或者怀疑观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几年来，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

有的部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在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自作主张。有的在请示、报告的时候，隐瞒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

有些地方，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实地向下传达，不认真地执行，或者借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有的甚至采取“封锁”的办法，不让下级和群众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中央通过的毛泽东同

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26]发出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拟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27]发出以后，还发生这种情形。

再说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

这几年，国家计划指标定得过高，而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不向中央和上级报告，在国家计划以外，另立计划，层层加码，甚至把他们自己的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冲击国家计划，这就更加损害了我们的计划经济。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执行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任务，而是分散力量去干计划外的事情，甚至把国家计划丢在一边，用国家计划规定的某些专用物资，去完成它们自定的计划，或者去搞那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楼、馆、堂、所”的建设。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全局的需要，完成国家规定的上调任务，而是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务”；对往上调的物资是层层扣留，对国家分配下来的物资也是层层扣留；有的还擅自挪用应该由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假借“协作”的名义，私相交换；有的甚至少报产量，隐瞒库存，“监守自盗”，“以邻为壑”。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

候，不执行国家计划，不按实际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员。在精减职工的时候，有些单位讨价还价，甚至边减边加，或者明减暗加。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遵守国家的规定，擅自动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去搞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囤积物资，预付货款，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

这几年，擅自动用应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生产这些物资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多。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适合情况的计划，并且把国家的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计划、劳动计划、财政计划都搅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一十七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建设八个鞍钢所需要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建设三十五个长春汽车厂所需要的投资。中央下达的国家计划内的建设项目，本来已经过多，已经不适当，国家计划外的项目又大大地增加，这就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资效果不能迅速发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些计划外的投资，虽然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是有许多是非必需的，是乱投乱用的。其中用以建设“楼、馆、堂、所”的，就有十七亿五千万元。单是这一笔完全

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就相当于建设每年总产量为三百多万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投资。

一九五八年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当年全国各方面就新增加职工二千零八十二万人。一九五九年国家要求精减职工八百万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万人。一九六〇年国家计划规定增加职工二百万人，实际增加了四百八十三万人。在这三年中，工业部门的职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须坚决精减职工，严禁从农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

在这里，不准备再用其他的材料来说明国家计划被搅乱的情况。同志们从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义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人说现在没有多少分散主义，或者说分散主义并不严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许多分散主义现象的发生，是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关系的。例如，国家规定的生产、基本建设任务过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国家的物资管理制度也不尽合理，这就给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了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许多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想很快实现。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建设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它们在已经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上，又另加新的任务，提出更急的要求。这些地方、这些部门、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许多干部，主观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的建设事业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各种可能的条

件，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同整体的关系。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妨碍国家统一部署、损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义现象。

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严重地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斤斤计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这是分散主义产生和滋长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义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散主义，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单位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损害了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义的种种做法，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散主义不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对于国家干部，在思想上起着腐蚀作用。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会根源，但是，不可否认，也是同分散主义有关的。

大家看到，由于分散主义，一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衰退了。

由于分散主义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门、不少地方、不

少单位，上下关系和相互关系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竟然在党内耍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有意不提关键性的项目，有意少报投资，等到计划批准以后，再要求另立专案，追加投资。这是不能准确地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超出正常讨论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在同志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不说老实话，不交心，怕吃亏，喜欢当“聪明人”，藏一手，不互相照顾困难，常常使一些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下来，得不到合理解决，使工作受到损害。

总起来说，分散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有下面四条：

第一，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破坏党的政策，就必然要损害党的统一。

第二，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

第四，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

显然可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从来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

列宁总是强调地指出，马克思是主张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需要集中制，是绝对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集中制和纪律，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溶成一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说，如果没有这些，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纪律的企图，就会变成空谈[28]。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反复强调说，没有严格的集中制，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能够实现这种经济的只有无产阶级"[29]。列宁认为，要建成这样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活动，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所说："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

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30]

列宁在谈到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伤害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31]

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列宁的这些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极端民主化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政党不相容。他说：“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对党组织“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32]。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党的纪律概括成为四条：（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说：“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33]在这四条纪律中，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

中。”

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地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在全国解放以后，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逐步地消灭经济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关系，作了扼要的阐明。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应该在人民内部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常常说，要力争上游，什么是我们在工作中首先要力争的上游呢？就是要在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力争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力争上游。如果没有造成这种政治局面，其他方面的上游是难于争取得到的，即使一时争取到了，也是不巩固的，不能持久的。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在这里。

同志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历来是维护中央统一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使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他还是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从而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的路线，使党中央的领导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又很迅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

的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央不断地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同各地方、各部门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分不开的。

从遵义会议以来，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局部地区曾经在一个时期发生过错误，但是，由于有了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正确领导，这些错误就很快得到纠正，使我们的事业能够避免严重的挫折，而不断地胜利前进。只是在那些完全脱离中央的统一领导，向中央闹独立性，坚持他们自己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地方，那里的工作才遭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由此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同上面所说的那种完全脱离党中央正确领导的、路线性质的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分散主义倾向，如果不坚决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需要把几个问题解释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慎重处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指出

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历来重视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中央的许多正确的政策，都是在总结地方的和群众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同地方的工作同志共同商量制定出来的。

一切正确的政策，一切正确的领导，总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4]。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违反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中央的集中领导，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从总结群众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主观的臆想出发。

中央的政策，国家的统一计划，都是要依靠各地方发挥积极性来实现的。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把许多管理权力下放到地方。把应该下放的管理权力放下去，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确地合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永远要做的，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党中央要求地方发挥的积极性，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只要这种集中统一是适当的，就会有利于地方发挥前一种积极性，防止后一种错误的积极性。

各地方的积极性，首先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积

极性，坚决执行国家统一计划的积极性。各地方应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精打细算，合理地使用本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好地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实现。就一九六二年来说，各地方发挥积极性，就是要根据中央的政策，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求保证完成这个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上调任务；就是要完成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就是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就是要完成各方面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比较快地摆脱目前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的某种被动局面。

第二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问题。

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可以而且必须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作出某些补充规定，使中央政策更好地同当地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是，应该指出，中央制定政策，是从全局的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中央的政策，既集中体现全局的利益，又照顾局部的利益。因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政策，只能够在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加以具体化，决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因地制宜”，而任意修改，甚至拒不执行。

中央制定的政策，有的可能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各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些方面不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应该及时地向中央提出意见和

建议。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然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既定的政策。

至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尊重当地群众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律。在农业的具体工作上，特别是在技术措施上，管得太多太死，这种过分集中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违反中央政策的一种瞎指挥和命令主义。

我们说，要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下，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绝对不是否认因时因地制宜，也绝对不是否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和灵活性。把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瞎指挥、命令主义混为一谈，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问题。

中央对经济、文教事业，一贯地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央集中过多，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地方、部门的权力过大，而且又层层下放，分得过散，在最近几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既不利于更好地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不利于正确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改变最近几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把权力集中起来。首先是要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

以便中央从全局出发，统一安排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更有效地克服当前的困难，更快地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下一步的新的发展准备条件。

这里所说的把权力集中起来，也包括要把地方和中央管理部门过去下放过多而现在必须集中的权力，逐级地收上来，由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管理部门直接掌握。

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从生产任务的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某些物资的分配、劳动力的调度等方面，给各地方、各部门一定的机动余地和调剂权力，以便它们能够解决本地方、本部门的特殊问题，更好地完成国家统一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拿基本建设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应该把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交地方具体安排自己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地方的这些项目，都必须包括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以内。

地方计划是国家计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制定地方计划是实行分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各地方可以、而且应该合理地利用本地方的各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千方百计，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地方，国家应该给以奖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应该拟订合理的奖励办法。

应该了解，实行分级管理的根本要求，是各级地方和各级管理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所属的企业单位和

事业单位认真地管理好。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所有地方，所有管理机关，都必须遵守党和国家统一规定的政策和制度。例如，在一切农村人民公社中，都必须继续试行和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一切国营工业企业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在一切商业单位中，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商业方面的指示，并且按照规定切实试行商业工作条例草案。在高等学校中，也必须切实试行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35]。

总之，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要有统一的政策，全国要有统一的计划。绝对不允许在中央的政策以外，有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另一种政策；也绝对不允许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外，有同国家统一计划相抵触的另一种计划。

关于经济工作方面集中统一的要求

有了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以后，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才能保证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为了在经济工作方面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央提出以下十项要求：

第一，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地方计划必须纳入国家计划。改变计划或者补充计划，必

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凡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工业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已经下放给地方的，必须在一九六二年内通盘安排，逐步收回。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要工业企业，已经下放了的，应该收归省、市、自治区直接管理。

第三，所有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无论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不准有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投资。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

第四，国家规定的生产资料的调出计划，必须切实保证完成，不准留好调坏、七折八扣，甚至占用不调。国家分配的物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的规定使用，不准用来干计划规定以外的事情。超产和节约的生产资料，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处理。

第五，国家规定的生活资料的收购任务和上调任务，除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经过中央批准减免的以外，必须保证完成，不准多留少调。

第六，国家确定的劳动计划，必须坚决执行。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不许增加人员。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一律不准超过。

第七，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不准任意变动。由地方、部门规定的产品价格，需要变动的时候，必须报告全国物价委员会批准。

第八，国家财政预算规定的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完成，支出不许超过。地方的财政预算，不许列赤字，不许先支后收，不许挪用银行资金。

第九，国家规定的信贷计划和现金管理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流动资金，必须经过国家财政机关核定、批准。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准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企业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现在有些企业的合理亏损，由国家财政开支；企业的积压物资，由国家统一处理。

第十，国家规定的出口计划，必须如质、如量、如期地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进口计划，不准各地方、各部门擅自变动。国家的进口物资，必须按照中央的规定分配，不许扣留先分、移作他用。

为了实现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及时地提供真实的情况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出切实的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通力合作，帮助中央计划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一致遵守的国家计划。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不许耍策略，藏一手，隐瞒情况，谎报数字。在计划确定以后，都必须严格遵守，保证实现。

越是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要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和中央的工作部门，必须切实地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力求使自己的领导

正确，使方针、政策、经济计划、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尽可能合乎实际。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该有一套既有利于中央集中统一、又有利于地方发挥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对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凡是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坚决贯彻执行；凡是不完全符合或者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的，要加以修改或者重新制定。

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加强和改进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各级计划委员会，必须协助党委和政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成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助手。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对于全党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提高觉悟，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分散主义的危害性，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无论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在检查分散主义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一般地对事不对人，决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斗争方法。对于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就可以不加追究。至于那些同社会上的坏分子勾结起来，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应该对他们严格处理。今后，如果有人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闹分散主义，就必须按照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加以处理。在党员群众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不要去反对分散主义，只对他们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全局观点的教育，使大家在提高认识的基

础上，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更好地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办事。

三　党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明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党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

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们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切实改进我们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起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早已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远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

以下，要说一说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

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说过，要调查，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查研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九四一年八

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苦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办事。这就是："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党中央号召，那些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上面所说的那些忘记实事求是作风的同志，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武断办事，而犯了错误的。这些同志，在主观上可能是好心好意，但是，思想方法根本不对头。应该指

出，这几年来在办错事情的干部中间，大量的是属于这类性质。

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这些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有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这种对党、对上级弄虚作假，不是属于不了解情况的问题，甚至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完全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这还有什么党性呢？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再三说，部队缴了敌人的枪，要把数字如实上报，不准多报一支，也不准少报一支。但是，这几年来，有些同志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样做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

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对上级派去的检查当地工作的人员，竟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甚至打击那些如实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这种违法

乱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

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群 众 路 线

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这几年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来，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

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

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全国的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的和各级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工会、青年团体、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在工业企业中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学、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和学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这些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发扬人民民

主的不同组织形式，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应该学会经过这些组织来活跃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尊重这些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决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方法，使这些组织接受。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应该分别地交给有关的组织进行讨论。在作出决定以前，要有充分的酝酿，允许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作出决定以后，要经过这些组织，去动员群众，使大家心情舒畅地、自觉地执行。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少同志是做得不好的，是不及格的。[36]

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如像我们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做扎根串连工作那样，如像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典型示范、分期分批

地逐步推广那样。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把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做好工作。许多同志、许多单位，不注意建立经常工作，不注意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热中于突击工作。他们以为，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但是，实际上，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的一些“大办”，有些是需要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就是那些需要的“大办”，也往往不是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去进行，而是一哄而起，限期完成，结果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造成损失。这一点，应该引为深刻教训。

毛泽东同志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37]革命战争是这样，建设工作也应该是这样。

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于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千篇一律。当然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而且，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健康的群众运动。

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

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今后凡是需要开展运动的事情，属于全国性的，必须由中央斟酌情况决定。凡是不准备普遍推广的事情，都不要登报和广播。

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没有他们的冲天干劲，建设事业中一切伟大成就都不能取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区别什么样的干劲。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也有主观主义的“干劲”。前一种干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后一种“干劲”是不能要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中曾经发生的“瞎指挥风”，正是这种蛮干的表现。有不少的干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地强制群众去干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蛮干作风必须反对。对于坚持这种蛮干作风的干部，如果不泼点冷水，使他们冷静

下来，如果不泄他们的蛮干之气，就是说，如果不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且制止他们继续蛮干下去，那末，群众的真正的干劲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我们既不要把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大家记得，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现在，有不少同志又把农民群众看得非常落后，不敢把政策和任务告诉他们，不敢对他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放弃领导。这种尾巴主义的错误，也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有些地方，在纠正人民公社工作缺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不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工作中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作中也存在，都必须注意切实纠正。

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不对的。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恰恰必须走群众路线。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有些任务的确比较重，比较困难，但是也必须完成。就拿粮食的征购任务来说，目前农村的底子比较薄，农民的口粮标准相当低，可以拿出来供应城市的商品粮食的确不能很多。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负担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在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如果不能够从农村征购到必要数量的粮食，那

末，城市和工矿区的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就无法维持。这样，既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并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把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他们讲清楚，好好地同他们商量，动员他们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同时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当然，领导机关在提出任务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超过了实际可能，要求过急，强制执行，就会使下级干部没有可能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而只有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有时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也无法完成过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走群众路线。这几年工作中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今后应该注意防止的。

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

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根据报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说的一系列的事情，不难看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下级党

组织不服从上级党组织、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情况。在那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党组织和某些干部，喜欢自搞一套，自成系统，自成局面，自由行动，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单位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独立王国”，不喜欢中央和上级过问，不尊重和不认真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这种分散主义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

有一个地方的党组织，曾经写信给中央说，他们要服从上级，但是，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服从了当地上级的规定，就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如果服从了中央的政策，就要违反当地上级的规定。这个党组织要求中央回答，他们应该服从哪一个上级？

这个党组织提的问题很重要。它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些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中存在着分散主义，就是因为在那里有一些同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相抵触的规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全党都要服从中央。

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上是这样，在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上下级关系上也是这样。一切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现象的存在，都削弱了党的统一和集中，因此都必须坚决反对。

在党内生活的问题上，其次要说的是，党委会内部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级党组织必须有坚强的或者比较

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委会成员要维护和帮助这个领导核心。他又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要善于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他特别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

在党委内部，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但是，有些党委，把分工负责变为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而那些“包干”的同志，又往往独断专行。因此，在一个党委内部，形成了一种各自为政、多头领导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下级组织很难办事。

这几年来，党建立和加强了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取得了成绩。党委领导一切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委，也发生了包办代替行政系统的日常工作的缺点。为了应付这些日常工作，党委就过多地增设书记。党委包揽的事务越来越多，使行政系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使党委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地研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把领导工作切实

做好。

党中央认为，凡是存在上面这些问题的党委，都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整内部的关系，使党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来。

关于党内生活，这里还要详细地说一下党内民主问题。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地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党内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绝对不能容许继续存在。

大家知道，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党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38]时期党内过火斗争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39]。但是，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一方面，这是由于目前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不懂得如何防止或者抵制这种错误；有些经历过党内过火斗争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是重犯了过去的错误，或者是不了解下情，没有及时纠正这种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全党同志应该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

为了使党内生活正常起来，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发扬党内民

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这样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40]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对于处在建设时期的我们的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不善于发扬民主，不善于倾听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习惯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

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列宁提出的原则，把认真的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发扬成绩，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推动我们事

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前途充满着信心，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们党强的表现，而不是弱的表现。

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者都应该虚心地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不许压制民主，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组织一直到党的中央，反映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对于党员的这种反映，都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反映问题，即使所反映的情况同事实的真相还有出入，也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

党组织领导人的模范行动，对于开展党内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党的一切领导干部，都必须力戒骄傲自满，都必须同普通党员一样，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在党委会内部认真地发扬民主，造成畅所

欲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

为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经常检查和改进它们的工作。近几年来，不论农村或者城市，许多领导机关，都只忙于日常事务，忙于指使基层组织完成一项一项的具体工作，对于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不管或者管得很少。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从目前党内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有必要向全党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

近几年来，在党内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党内无章可循，无法可守，也不是由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不正确，而是这些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或者被歪曲了，被破坏了。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41]所通过的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的准则。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

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

根据党章的规定，任何党员都不准向党说假话，作假报告，欺骗党；任何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员，都不准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任何党组织的负责人员，都不准滥用职权，任意斗争和处罚党员。今后，任何党员如果犯了这类错误，都必须给予纪律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还应该依法处理。

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都不应该对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而要同一切坏人坏事积极地进行斗争。

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42]。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

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不经过同级党委，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到党的中央，直接反映情况和检举违法乱纪行为。有些地方的党委，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给以正确的领导和积极的支持，而是给以阻碍和限制。也有一些监察委员会，在遇到困难和

障碍的时候，就放弃职责，不能为维护党的纪律而坚持斗争。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都必须改变。

正确地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必将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最近，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重新教育干部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进行了轮训干部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收到初步成效。应该认识到，轮训干部是当前全党的一件大事。各地方、各部门，都应该毫无例外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把它做好。在干部轮训中，应该着重学习《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43]这个文件，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可以肯定，这种学习，对于正确解决目前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对于发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是会发生良好作用的。

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适应当前斗争任务的需要，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下列八项要求：（一）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发愤图强；（二）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三）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四）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七）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八）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上面所说到的在我们党内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是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觉察到，都认为是必须纠正的，而且有许多是已经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的。在我们纠正了缺点、错误，改变了那些不正常的情况之后，由于我们不仅有了正面的经验，还有了反面的经验，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中央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能够根据中央提出的要求，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正确作风，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奋斗。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44]全党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随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我们同样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搬掉。

我们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在有了远大的奋斗目标以后，就必须确定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不扎扎实实地做好具体工作，光有雄心壮志，光叫口号，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我们必须出色地完成当前的任务，逐步地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

同志们！要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全党同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一定能够有成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定能够逐步地实现十年奋斗目标。

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光辉灿烂！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万岁！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

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本篇是刘少奇主持起草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报告数易其稿，经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第一〇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会后中共中央以中发〔62〕77号文件下发。这个报告稿后经整理，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

〔2〕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报告这一部分先讲的是国际形势，内容是：

“说到国际形势，大家都熟悉毛泽东同志几年前提出的这个著名的论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句话，表达了我们时代的国际形势发展的根本趋向。

“同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人民革命的力量日益增长的情况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统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不稳定，这样的动荡，这样的孤立，也从来没有陷入像现在这样深重的危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所掀起的革命浪潮，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想抵挡它，现代修正主义者想阻止它，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堤防，一个一个地被革命的浪潮冲破，或者正在被冲破。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继伟大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二个伟大的革命。我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地促进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觉醒，大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统治的

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总共拥有十三亿以上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的人民日益广泛地投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在西欧、北美、澳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和争取民主的运动正在发展着。

“全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也正在日益广泛地发展着。

“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世界问题上的分歧，首先是对帝国主义的命运的问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同我们相反，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寄托在用无原则让步和屈服的办法去求得同帝国主义长期共存这样一种妄想上面。他们不相信人民，不相信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国人民的出路。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革命。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各国革命运动总是此起彼伏地不断发展的。

“在古巴，在阿尔及利亚，在刚果，在安哥拉，在日本，在老挝，在南越，在南朝鲜，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正在风起云涌地开展革命斗争。

“这种革命斗争是不应该的吗？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完全正当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革命人民坚决地进行斗争，才能够推倒他们，而使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我们从来是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同时，我们从来也是努力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在对外关系上，我们党一贯地遵守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互助合作；

争取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认为，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不是互不相干、互相对立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看法同我们相反。他们认为，要和平，就不能革命；要革命，就没有和平。他们所选择的是：不要革命，只要和平。这实际上是有害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他们实行的许多政策，把他们自己放在反对革命的地位。现代修正主义者坚持他们反对革命的观点和政策，屈从帝国主义，并且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谁不服从，他们就打击谁，排除谁。这样，他们就陷入了沙文主义的泥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

“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种团结，是帝国主义最害怕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竟然采用分裂的手段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破坏这种团结。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他们的指挥棒打倒真理，这是枉费心机。修正主义者永远不能吓倒任何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更不能吓倒任何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判断问题只能够以是非做标准，不能够以‘表决机器’做标准，更不能够以什么‘实力地位’做标准。谁站在真理方面，谁就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是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真理在它这一方面，它并不是孤立的。尽管有人想一脚踢倒它，而历史总归要证明，它是不会被踢倒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的党，因为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旗帜、高举革命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党，是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党。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的党，是符合帝国主义需要的，也是符合像尼赫鲁那样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派需要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次新的反华大合唱。这个反华大合唱，很不得人心，很少听众。任凭他们怎样使劲地唱，归根到底，也不可能唱出什么大的名堂来。即是说，他们不可能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革命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各国的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同一切事物一样，总是走曲折的道路的。应该估计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可能使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遭到某些严重的波折。在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能受到损失，有的已经受到损失。在帝国主义者、反动民族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相互配合下，世界上还可能出现新的反华、反共逆流。这股逆流，可能使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遇到某种挫折，也会使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遇到新的困难。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出现、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出现新的分化，一方面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在目前的一个时期内，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发生程度不同的思想混乱，而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决不会不利用这种情况加紧向人民进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进行各种努力来减轻修正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及时地击退帝国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

“在二十世纪初年，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潮流，曾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占极少数。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了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斗争，终于战胜了修正主义，并且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现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进行着同样性质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在不少国家中，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在开始的时候，数量可能是不大的，甚至是很小的。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坚强地团结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地同现代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地排除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同列宁的那个时候比较，现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好得多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力量大得多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能从反面教育全世界的革命的人民，特别是教育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能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胜利准备条件。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一件坏事，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这件事情，归根到底，又是好事。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可以一时地在世界人民的头上卷起一阵乌云，但是天终究是塌不下来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总是要逐步地觉悟起来的，总是要逐步地走上

革命道路的。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包括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各国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发展、日益尖锐化。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终究要经过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解决的。帝国主义者的王冠，修正主义者的乌纱帽，终究要一顶一顶地滚落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要在全世界胜利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就简单地说到这里。”

〔3〕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一个段落，内容是：“人民公社对于我们能够基本上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4〕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对成绩和缺点讲了一些话，内容是：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很大；我们的工作中又发生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有人提出疑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呢？当前的形势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的前途究竟是怎样呢？等等。我们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是抱着对党、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为着总结经验和改进工作，认真地考虑这些问题，在党的一定的组织内讨论这些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完全容许的。全党，首先是党的各级负责干部，在这些问题上达到共同的正确认识，对于我们事业的前进，是十分重要的。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

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它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根据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已有经验，逐步地形成起来的。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肯定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同时指出：‘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各个战线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有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民公社。中央肯定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作出了关于有步骤地推广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

“在开始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已经规定了一些必要的政策界线。例如，总路线的核心是多快好省，绝不能只要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不顾其他方面。又例如，在人民公社开始建立的时候，中央就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而不许可混淆这些界线。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政策界线的规定，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严格遵守这些政策界线，是做好工作的首要前提。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从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发展为比较完全的和完全的认识，这是认识的一般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产物。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空前的大试验。在许多工作上，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开始的时候有过一些片面性和不恰当的地方。我们必须从实践中学习。正确的认识是要通过实践而逐步地发展起来的。许多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也必须在实践中逐步地制定和完善

起来。

“过去几年中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旗帜。对于这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只从一个局部或者一段短时间内的工作来估量是不够的，而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陆续提出了和补充了一些必要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这三面红旗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充分地吸取一切有益的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把这三面红旗更高地举起。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可以断言，将来的历史记载也只会这样地说：在我们举起了三面红旗的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

“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也正如对于革命问题一样，总是看得最深、最远。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细心地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总是提醒我们，在党内生活中，在国家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最早发现，并且提醒大家注意。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他又曾经尖锐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

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在一九五八年底的武昌会议上，他指出工业计划指标过高和水利建设任务过大的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又提出农轻重的关系、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等问题。许多同志，包括在中央工作的许多同志，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就不能够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益。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认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一九五九年夏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郑州会议所已经开始的工作，克服当时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消除的‘左’的倾向。这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在会议后期，没有贯彻郑州会议的精神，没有把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即‘左’的错误的问题，重新提到议程上来，没有切合实际地进行反右和反‘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路线问题的原则斗争，同在党的路线和组织原则范围内对于具体工作、具体措施的讨论，加以区别，并且指出：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倾向。这个要求，也没有引起同志们的重视。在这次会议以后，不适当地在农村、企业和学校的支部中，甚至在群众中，也展开反右倾斗争，在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发生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就大大

地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某些是非不明、党的生活不正常的现象。”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7〕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并对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社员、干部、监察组织、党组织的组成、职责、权利等做了明确规定。

〔8〕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就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三级所有”是指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大队下设

的若干生产小队。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及各地方的调查和试点经验，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9〕 一九六〇年夏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根据当时的生产形势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这六个字后来写进《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同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李富春共同审议这个报告时，周恩来将报告中提出的“整顿、巩固、提高”后面增加了“充实”二字。九月五日，周恩来又将“整顿”二字改为“调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签发的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并且完整地表述了这“八字方针”，报告提出：“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将“八字方针”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方针。

〔10〕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制订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一九六〇年底一亿二千九百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一千万。六月二十八日，又下达了《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11〕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共八项规定，主要内容是：一、切实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二、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五、加强经济协作；六、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严格实

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八、加强纪律性。

〔1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七十条。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

〔13〕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并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即“工业八条指示”），决定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出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等文件。

〔14〕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四十条。该草案规定了商业工作的方针，提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即：坚持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改进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

〔15〕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制订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条。该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工资制度

应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以及供产销要统筹安排等。

〔16〕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后，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再拟订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7〕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三段话：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指出了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道路。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由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又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包括三级集体所有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同时，它还保存了农民的家庭副业和少量的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它综合了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的优点，提供了逐步扩大集体经营的可能性。从这个事实出发，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内部个人和集体之间、小集体和大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使农村人民公社巩固起来。

“在人类的历史上，先进的人们很早就提出了公社的问题。现在，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我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已经指出了人民公社发展的具体道路，因而在我们的农村中已经开始把公社的理想变为现实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

〔18〕 见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314页。

〔19〕 见毛泽东《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33页。

〔20〕 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351页。

〔2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关于这段话的表述是："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见该书《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第276页。

〔22〕 指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九五八年五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概述了这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

〔23〕 见毛泽东《十年总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第216页。

〔24〕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两段话：

"在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都是非常重大的。毛泽东同志说，最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只有把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才能更有力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旗帜举得更高。现在我们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在这点上，帝国主义者瞧不起我们，现代修正主义者也瞧不起我们。让他们瞧不起罢。我们一定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冲破一切困难，向前发展。

"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的调整工作的

问题。这些调整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中央规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的跃进，更好地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25〕 毛泽东曾经多次在他的文章、讲话、题词中强调指出这一点，如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864页）；一九四九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441页）；一九五〇年为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271页）。

〔26〕 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给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信。信中所提的六个问题是：一、包产问题；二、密植问题；三、节约粮食问题；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五、机械化问题；六、讲真话问题。

〔27〕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为此，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集训。其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自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

〔28〕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列宁选集》第四卷这段话的译文是：“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

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见该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135—136页。

〔29〕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这段话的译文是：“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这只有无产阶级即在这方面受过工厂和实际生活熏陶的阶级才能实现，只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见该书《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一文，第414页。

〔30〕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三卷这段话的译文是：“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见该书《国家与革命》一文，第201页。

〔31〕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这段话的译文是：“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

政权决不想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想扼杀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见该书《在省苏维埃主席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第18页。

〔32〕 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88、92页。

〔33〕 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528页。

〔34〕 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899页。

〔35〕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36〕 据中发〔62〕77号文件记载，这段话后还有一段话：“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和方式，我们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例如，干部参加劳动，办试验田，竞赛评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是应该肯定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应该采用的。但是，如果抛弃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这些方法和方式就会变成反群众路线的东西。例如办试验田，本来是一种好的领导方法，可是，有些试验田是弄虚作假的，不但对群众毫无示范作用，而且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又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以用来作为发扬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滥用了这种方式，不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不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同等的发言权，只允许一边倒地发表一种意见，甚至用这种方式来压制正确意见，发展错误的过

火的斗争，伤害了群众，伤害了同志。这些，都是同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37〕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247页。

〔38〕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39〕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210页。

〔40〕 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528—529页。

〔41〕 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把“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修改为：“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43〕 这是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规定的县委书记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材料。材

料汇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的有关论述及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摘录，内容包括执政党的地位、按照党章办事、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的团结等六个方面。中央要求通过这个材料的学习，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从而正确地解决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44〕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闭幕词时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1102页。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国际

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运动在继续前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

在此关键时刻，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修正主义，威协〈胁〉了团结，出现了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机。

现代修正主义早就出现了。有南斯拉夫的，意大利的，莫斯科的。从二十大[2]起就影响全世界。

经过两次莫斯科会议，发表了宣言和声明[3]，都不能约束他们。到廿二大[4]发展为比较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四反[5]，对己狠，对敌和，公开暴露分歧。与阿断交[6]，也暴露修正主义的面目。它的地位并未加强。廿二大，和四次国际群众会议[7]的情况就可表明。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关于世界革命运动路线性质的分歧。

1．对帝国主义命运的看法，要不要革命，和平过渡，议会道路。

2．战争与和平。无条件和平共处，苏美解决世界问题，三无世界[8]。

3．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平等地位，大国沙文主义，分裂路线。指挥棒。

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局面。

根源：

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

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投机者。寄生者。

工人贵族影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国际[9]党可以叛变，第三国际[10]党是否也可以叛变？

出现新社会民主主党，也出现更坚强的列宁主义党。目前各国已有分化。不可避免。时间尽可能推迟。

中苏关系可能维持，或恶化。用分裂强加于我时，我应采取的几种态度。对苏联人民的友好工作加强。挑衅者顶回去。列宁故乡，伟大人民，命运由修正主义摆布，资本主义复辟不可能。

世界战争与局部战争。是强了，还是弱了。人民总要革命。革命和马列主义总要前进。国际局势决定于国内局势。

二、国内形势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三年来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减产，1961 年工业减产 40%，1962 年还难于回升。

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对许多同志来说，有点出于意料之外。在二三年前原以为要大跃进，结果未进，反而退了很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型〈形〉。

原因：三年天灾和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何者为主，各地情况不一，应向群众事实〈实事〉求是地说明。如山东惠明〈民〉……总的如文件所说。

各地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有些什么缺点错误？如文。

成绩与缺点何者为主？各地也有不同情况，如实说明。各地讨论判断。总的说成绩为主。三七开。一九开。过了头。再生产。

缺点错误是坏事，大部已经过去，已经停止、改正，或正在改正。也可能变成好事。条件是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某些方面跌了跤子，自己爬起来。

错误的性质，

错误的责任，

错误的原因，主观主义，不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无

经验。

改正的办法，

全党全民都有切身经验，以后比较好办事。现在总仍困难，是暂时的，经验的取得是长期起作用的。是强了，不是弱了。经验十六条[11]，是初步的，以后还要总结。

三面红旗：

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中有偏向，只注意多快。以后要在品种质量上跃进。英国人懂得。

大跃进——廿一年后超过一千八百万 T[12] 钢，从历史上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得更明显，目前也有一些作用。

吸收了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

供给制——社会保险作用。

公共食堂——自愿结合。吃饭不要钱。

公社办早了，不办较好。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好。开始就以小队核算为基础可能更好。

五年十年以后再总结三面红旗。

若干口号的清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反条件论。反客观主义，否定主观能动性，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成熟决定一切。时间、地点、条件决定。

“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以具体指标高低来决定左和右。我们左派。但不是“左”派。

有什么反什么。

一轰而起，大轰大嗡。

朝气勃勃，典型试验，逐步推广，有准备有秩序有区别分期分批。不打无准备之仗。报纸、电话会、现场会控制。

水利建设蓄小群，再调查研究。

口号的清理：各省办、中央办。

任务：

指标是否高了或低了？只是初步设想。

指标与干劲，有关系，但无决定作用。

留有余地，以便超过。不是睡觉也能完成的。

有可能达到，有可能达不到，差得远。以后研究。

工、农、商、学、党、政、军六二年走上轨道。

赶英超英。

农业纲要四十条[13]。

城市人民公社。

关于集中统一

是不是目前的关键问题，主要矛盾统一的国家计划与各自为政。

几年来的主要经验，主观主义。分散主义。

加强中央集中统一与发挥地方积极性。

国家计划与地方计划、部门计划统一。互相促进，而不促退。留有机动。决不允许把地方部门计划置于国家计

划之上。不允许独立的地方部门计划。

必须如实报告产品数量库存……。

必须一心一德通力合作做好国家计划，也做好地方计划。

加强计划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主持。不许任何破坏计划。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的供销一律交由国家整理。由国家和地方统一办。

合理的保留，不合理的不搞，不要引起青黄不接，但不允拖延、抵抗。

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正确建立。

地方国营企业产品的分配。利润上交。如此是否打击了地方积极性。如好的都收上来是不妥的。

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苗头，应警惕。

分级管理——要管好，全局〔全〕民观点。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的企业。

其他事业亦当如此，不许暗积私房。但应有合理的“流动资金和合理库存”。

如何反分散主义

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计划的统一，实事求是地检查，不一棍子打下去。过去的只要如实报告，改正不加追究。只对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严肃处理。今后按党纪国法处理。在党员和不脱产干部中不

反。报数字，以后态度，是对党员的考验。是否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关于党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

要调查研究，

要从实际出发去拟定政策和计划、措施。

有勇气实事求是。不怕承认错误。……

了解情况也不说实话，不敢说，就说假话。

被迫说假话，心里不以为然。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张。封锁，扣信，打击。

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少给的事更多。

老实人吃亏。聪明人占便宜。说假话的人占便宜。

不怕吃点亏当老实人。最后占大便宜。

怕吃小亏聪明人，最后吃大亏。

党和人民信任谁？

为了坚持真理，说实话，五不怕：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杀头。被迫说假话是软弱、害人的。

不了解真相，进行调查。

不违反党纪，在会议说，上报，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不允许打击。

有些党组织重犯了过火斗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过来。再不允许进行过火斗争。

任务与政策矛盾如何办？

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超过实际的可能，又要求过急。在发现后应减少任务。延长时间。

除此以外，又要完成任务，又要执行政策。二者皆要，不可偏废。

以粮食为例：国家的需要同农民愿意担负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工作好，农民觉悟提高的条件下，农民可以多拿出一些。对工农业有利。

完成必要的任务也是政策。两个政策矛盾时，要求得统一的解决。这就为难。共产党人就要解决这种为难的任务。

同志们！十二年来，特别四年来，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发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是更聪明了，更谨慎了，更强大了，我们在总结经验，取得一致认识之后，全党同心同德，做好统一的计划，集中全国力量，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

勤俭建国，反对特殊化。特殊化可耻。内宾招待。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提纲。这个讲话是对书

面报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所作的补充说明，讲话稿后经整理，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

〔2〕 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3〕 这里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全文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全文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 指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5〕 在刘少奇讲话中对“四反”是这样表述的：“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内一些同志大反阿尔巴尼亚，大反斯大林，实际上也间接地大反中国，同时，他们还大反他们党内的‘反党集团’。这个四反，实际上是二十二大的主要内容。”

〔6〕 一九六一年十一、十二月间，苏联政府以口头通知、照会和正式公报等形式，通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政府决定从阿尔巴尼亚撤走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全体人员，要求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大使和使馆全体人员及商务参赞离开苏联。

〔7〕 指一九六〇年十月八日至十九日在巴格达举行的国际学生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在万隆

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8〕 在刘少奇讲话中对“‘三无’世界”是这样表述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苏共内的一些修正主义者主张只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解决世界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面，提出可以实现无军队、无武器、无战争的‘三无’世界的口号。”

〔9〕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七月在法国巴黎成立，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破产。

〔10〕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1〕指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讲的十六条“基本经验”。见本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12〕质量或重量单位“吨”的符号，英文“Ton”的缩写。

〔13〕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

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

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2]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

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

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

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

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3]。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

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4]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

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

“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

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

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

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

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5]

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很多。在这里，我只说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的相互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

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

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末，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末，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第二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减少而是要更加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使这两个方

面统一起来。就是说，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促退的。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如果统一得不好，是会互相促退的。有些地方计划就冲击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起促退的作用；有的时候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对地方计划也起促退的作用。必须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成为统一的国家计划，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更不允许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必须如实地报告自己的产品的品种、数量和库存的物资，决不允许作假报告。这应该作为一条法律。这几年，在这一点上，法律废弛。今后，一切有关的党员必须用党性和党籍来保证不作假报告，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作假报告的法律。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生产了多少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有多少库存物资，是什么样的物资，都要如实报告，不许少报，也不许多报。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的一切同志，必须一心一德，通力合作，把国家计划制订好，也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制订好。大家要一条心，而不是两条心或者半条心；要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现在，有些同志就是有点三心二意，有点两条心、半条心。因此，全国一盘棋就搞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一盘棋去了。当然，这几年中央的一盘棋也摆得不好，指标过高，只给任务，不给或者少给材料，这些都是不对的。今后，中央改正错误。如果中央以后还发生这种错误，你们可以反对，可以批评。但是，

大家必须一心一德，必须如实地报告数字，必须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大家一致遵守的统一的国家计划，也才能制定出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切实可行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地方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以后，中央可以照顾地方。但是，不容许在国家计划以外，在自己的荷包里再装一个计划。不容许在执行计划的时候，首先执行自己的计划，不管国家计划，不完成国家计划。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企业，这几年是有这样一些错误做法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错误，也必须改正。中央的错误，中央要改正。地方的错误、部门的错误、企业的错误，也都要改正。只有大家一心一德，共同努力，首先制定好计划，然后执行好计划，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任何一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就是说，他究竟是在真正地、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假心假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各级的计划委员会应该加强。各级党委应该由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有一些供销机构，做一些供销业务。这些供销业务，有些是需要的、合理的，以后也还要继续做。但是，这些供销业务中有很多超出了国家计划，损害了国家计划，今后应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清理，统一调整。[6]

我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调整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现在全民所有制受到了一些损害和破坏，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

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甚至变为小集团所有制。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有的还把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了。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全心全意地维护全民所有制，不应该允许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集团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7]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县，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盖了几个工厂，现在开始赚钱了，这几个工厂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是归这个县所有呢，还是属于全民所有呢？我们说，应该属于全民所有。它的财产属于全民，产品归国家支配，利润应该上缴。这样是不是打击了地方积极性呢？我们说，这个县辛辛苦苦建立了几个工厂，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有贡献的，是应该受奖励的。但是，这些工厂的产品还是要由国家分配，利润还是要上缴，不能因为工厂是谁建立的就归谁所有，不能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地方企业只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国家委托地方管理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毛泽东：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当然，国家在分配产品的时候，在处理上缴利润的时候，对于地方的利益、地方的需要，都应该适当照顾。如果同过去有一个时期那样，地方上刚刚办起一个工厂，稍许赚了一点钱，中央都拿走了，地方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样也不行。还是应该分级管理。分级管理要管好，各地方必须从全局观点、全民观点出发，而不能从

地方观点出发。企业的管理应该如此，其他文教、卫生、科学等事业的管理，都应该如此。[8]

地方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但是，地方积极性必须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统一起来。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有些同志担心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上已经写了，就是要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统一。检查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大家担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在党内斗争中，一棍子打下去的方法，这一次不要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对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分子，还是要进行斗争。在党内来说，正常地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批评——团结。除了极少数的贪污盗窃的违法乱纪分子以外，所有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一律不加追究。以前隐瞒了数目字，现在报告出来就行了。但是，今后再发现隐瞒物资、有意作假等行为，就要按照党纪国法，从严处理。

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

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以后还闹分散主义，还想藏一手，还不老老实实，还作假报告，那就证明，这

个人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坚决地搞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9]。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

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毛泽东：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

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10]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再说一说任务和政策矛盾的问题。

假使上级机关提出的任务同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发生矛盾，怎么办？有的同志说，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

是很好的，但是，沉重的任务一来，这些好的政策都吹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正确地加以解决。

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确实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不可能完成，而且要求又过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应该减少任务，要求也不要过急。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任务和政策应该统一起来，又要完成任务，又要执行政策，两者都要，不可偏废。即使两者有某些矛盾，任务也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谁执行群众路线好，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谁执行群众路线不好，谁的工作做得不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不好，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有的同志说，凡是任务和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只执行政策，不必完成任务。这是不行的。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也是不行的。两者都要，这就为难了。同志们，是为难呀，谁要你做共产党员呢？做了共产党员，就有这些为难的事情。哪有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困难的呢？

举征购粮食的例子来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

能搞了。当然，过去我们的工业办得过多，工人招得过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过多，要下决心精减。去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其中有近一千万职工，今年上半年还要减七百万人，其中职工五百万人。但是，即使如此，国家每年还需要征购八百多亿斤粮食。（周恩来：需要八百八十亿到八百九十亿斤。）怎么办？到外国买，吃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大家是不高兴的，但现在还得吃一点，今年还准备进口四百万吨即八十亿斤粮食。需要是八百八十亿斤，除了进口八十亿斤，势必还得征购八百亿斤。八百亿斤，农民是不愿意拿出这么多的。这里就有矛盾：八百亿斤的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这就要做好工作，好好向农民说清楚，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是可以多拿出一些的。要告诉农民，如果不拿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因此，农民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出来。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征购八百亿斤左右粮食的任务本身，也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些矛盾，两个政策有矛盾，但必须统一起来，求得统一的解决。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想些其他办法，（毛泽东：增加生产，多种蔬菜，实行瓜菜代。）使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

不只粮食问题如此，其他任务也都有这种情形。凡是确实超过实际可能的，要修改任务。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完

成的任务，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应该尽力完成任务，并且要执行政策。这里是有很多困难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就是要学会完成这种困难任务。就是说，既完成了任务，又执行了政策。大家不是都说要力争上游吗？这就是上游。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那不叫上游。（毛泽东：中游。）只执行政策，完成不了任务，也不叫上游，只能是中游或者下游。政策执行得好，任务又完成得好，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群众觉悟提高，情绪也好，这才叫做上游，这才叫做有干劲。以后，在工作中不是没有上游可争了，还是有很多上游可争的，而且比过去争上游要困难得多。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

同志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也四年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有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取得了这些经验之后，我们是更聪明了，不是更愚蠢了；我们是更谨慎了，或者可以说应该更谨慎了，不是更不谨慎了；我们是更强大了，不是更软弱了。我们在总结经验、取得一致的认识之后，全党的干部，全党的

同志，应该同心同德。我们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

根据《刘少奇选集》（下卷）刊印。

（有刘少奇修改件）

注　释

〔1〕 这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对刘少奇主持起草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见本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补充说明，当时由中共中央以中发〔62〕76号文件下发，并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在下发时略去了第一部分“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全本只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讲话后经整理，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

〔2〕 见本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3〕 指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九五八年五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在阐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时，概述了这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

〔4〕 据中发〔62〕76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九个段落：

“总路线问题。我们过去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是说它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实行这条总路线。但是，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注意得不够。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

质量上面跃进。我们要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要单纯地追求数量。今后数量不一定要增加很多，要更多地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能够自力更生。这件事的重要性，英国人懂得，日本人也懂得。我和我们驻英国的代办宦乡同志谈过话，他说：‘英国人怕我们怕得厉害，对中国很恐慌，说我们发展得惊人的快。’我说：‘现在我们停下来了，他们该不怕了吧？’他说：‘我们停下来，他们更怕。’为什么英国人更怕了呢？因为他们懂得，单靠数量不行，品种、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们怕我们把品种、质量搞上去。一个日本人跑到鞍钢看了一次，也提出了要重视品种、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完整地说，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总路线，难道是不正确的吗？难道全国人民不要团结起来，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要鼓足干劲，不要力争上游，不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绝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说，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同志执行总路线的时候，没有注意使全国人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不是由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去力争上游；而只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是在执行总路线的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我们只要纠正这些偏差，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就会是很好的。

“大跃进问题。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

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毛主席说过：苏联从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这二十一年的时间中，他们的钢产量，从沙皇时代原有的四百二十万吨的底子，增长到一千八百二十万吨。也就是说，在布尔塞维克执政的二十一年中，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一年的时间，使我国的钢产量的增加，比一千四百万吨更多一些呢？比如，增加一千五百万吨、一千六百万吨、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一千九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如果可以，我们的发展就不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一些，而且也比苏联快一些。（毛主席插话：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还是达不到，因为我们的底子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能增加这么多，不能增加一千八百万吨，或者两千万吨。（周恩来同志插话：我们讲二十一年，是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一九七〇年。刚才主席说，我们的底子薄，所以，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有两种可能性。）（毛主席插话：我们原来的底子只有九十万吨。）也许我们只能增加一千四百万吨，或者还少于一千四百万吨，那我们就没有大跃进。毛主席在几年以前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比较快一点，好一点。用那种方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比较慢一点、差一点。我们是不是可能实行一种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呢？（毛主席插话：现在还没有证明。）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是不是可以争取呢？我们说，是可以争取的，可以试一试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争取到了，就是大跃进。当然，如果争取不到，那就证明，没有大跃进。因此，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

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我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人民公社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一大二公’的特点，从现在的人民公社来看，就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因此，有人就问：这个‘一大二公’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口号用不着取消，还是留一下，过若干年再看。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一方面，它可以自办一些企业来增加积累，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抽取一些公积金。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人民公社有一点‘一大二公’，兴修了许多已经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有一些社办企业，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作用不很大，‘一大二公’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所以，人民公社要继续办。‘一大二公’的口号也要保存，将来再看。

“书面报告上说，人民公社吸收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优点，这句话怎样解释？吸收了初级社的什么优点呢？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小队，即生产队，大体上就是以前的初级社的规模。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实行评工记分，土地没有报酬，对五保户、困难户有补助等等，从这些方面说，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能搞多少优点就搞多少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也搞不成。

“我们吸收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本身的优点，来建立和发展现在的人民公社。这样做，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

取这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现在一般不搞了。原来我们也说，供给制起一种社会保险的作用。现在对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也就是一点社会保险。这个还保留。我们曾经普遍办过公共食堂，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不办了。但是，自愿结合的农忙食堂，是可以办、应该办的。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它，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该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

“还有的同志说：如果人民公社一开始就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不是更好吗？是的，那会更好，但是做不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那时就没有这样的聪明，那时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并且不断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5〕 据中发〔62〕76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四个段落：

“下面，还有几个问题要说一说。

“我们过去提过十五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在这次的书面报告上没有写。因为根据我们提出的十年指标，到一九七二年可能还赶不上英国。这个口号没有写上去，不等于取消。十五年可能赶上英国，也可能赶不上。十五年赶不上也不要紧，再多两年就是了，总要赶上的。原来我们也是说：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

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十五年不行，就实行‘更多一点时间’那一条。（毛主席插话：有一年说过更少一点时间。）现在看来，更少一点时间是不行的。（毛主席插话：更多一点时间是可以的。）总之，这个口号我们不取消，但现在可以不写在书面报告上。

“还有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这个问题，书面报告上也没有写。是不是取消了呢？也不取消，我们还要努力奋斗。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有些指标，如果十二年办不到，再多几年总要办到。有些指标就是二十四年办到，我们也可以，天也塌不下来。开始调查研究不够，认为只要十二年就能达到，以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要二十四年才能达到，那就二十四年罢。这也是实事求是。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个问题，书面报告上也没有写。关于城市人民公社，中央还没有调查研究，情况还不了解。这次会议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可以进行一次调查，然后再对城市人民公社作出分析。这个问题现在不讨论，经过调查以后，再来讨论。”

〔6〕 据中发〔62〕76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三个段落：

“在小组会上，福建的同志讲了这样一个例子：福建的连江县出产海带，这个县就组织了一个机构，同十几个省发生了经济关系，推销海带，交换其他物资。连江县的这种商业，是什么性质的商业呢？说它是国营商业，可是它又不归商业部管。商业部过问不了。当然，这个县需要的一些东西，不能从国家得到供应，所以要自己去交换。这种情况，不只连江县有，全国其它的县恐怕都有。有些公社也有，有些大队也有。前几天在小组会上还听到这样一件事：河南临颍县有个公社的一个大队，派了一个人，到广州买了二百辆架子车，要用火车运回来。但是火车不给运，

他没有办法，七找，八找，找到了空军部门的一个科长，用飞机把这二百辆架子车运到武汉，再由武汉运回来了。（邓小平同志插话：真是神通广大！）

“各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城市，各企业，各公社，各大队，有许多在做生意，有采购员在全国满天飞。满天飞的理由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不能从国家得到供应。但是，这种商业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商业呢？在这中间埋伏着很大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为。新的资产阶级就从这里产生。全国满天飞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估计，如果不是几百万人的话，至少也有一百万人。有的同志说不到一百万人。我也没有确实的调查统计。总之，人数不少，单在北京就有五万多人。

“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满天飞的商业，有这样的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满天飞的人。这些人，也叫商业人员，或者叫采购人员。但是这种商业人员是没有上书的，他们也不归商业部管。这种商业的性质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的呢，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呢？是全民所有制的呢，集体所有制的呢，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呢？很值得大家研究一下。这种商业要加以整顿，要纳入国家计划。凡是合理的，都应该保留。不合理的，不应该再搞。在整顿过程中，应该注意不要引起青黄不接，使工农业生产发生困难。但是，决不允许拖延或者抵抗整顿。有的人是要抵抗的，因为他贪污了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搞了盗窃集团，如果被揭发出来，要受处分、坐班房、开除党籍。不要以为这件事很容易整顿。许多县、许多公社、许多企业和一些部门，都有这个问题。共产党员应该加强党性，把这些事情如实地报告出来。好的党员，会报告出来，使我们可以进行整顿。不好的党员，就会抵抗，不让我们整顿。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抵抗，该处理的必须处理。”

〔7〕 据中发〔62〕76号文件记载，本段落还有以下文字："连江县的那种商业，应该由国家统一办理。它所需要的物资要加以照顾。这个县不必派很多人到全国十几个省去跑。这样乱跑是一种浪费。"

〔8〕 据中发〔62〕76号文件记载，此处以下还有一个段落："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问题。请同志们注意，南斯拉夫就是不要全民所有制的，那里的企业独立搞供、产、销，各地方也独立搞供、产、销，企业与企业之间自由竞争。（毛主席插话：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对外贸易上都是这样。）企业自己可以作对外贸易，并且可以自由竞争。南斯拉夫的这种经济制度，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现在也露出了一些类似的苗头。这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

〔9〕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第297—317页。

〔10〕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中央关于已安排的协作、加工定货、物资分配、三类物资收购等处理问题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贯彻执行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方针，是依靠制订许多具体制度和具体办法来实现的。在中央未制发这些规定以前，凡是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协作、加工定货、物资分配和三类物资的收购等，各地区已安排者，仍照旧进行，不能中断；但应将已安排者，如实地分别报告国家经委、五办[2]或者国家计委，不得多报少报或隐瞒不报。

至于利用“协作”收购之名，去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走后门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也必须如实地报告国家经委、五办或者国家计委，不得多报少报或隐瞒不报，并在以后严格取缔，不许再搞。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刘少奇并在上面批示：“邓、彭、富春再阅。”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个通知中共中央以中发〔62〕40号文件下发。

〔2〕　五办，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九五九年六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定撤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设立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设立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协助总理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

祝贺尼泊尔民主日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

欣逢贵国民主日[1]十一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人民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尼泊尔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邻居，一向和睦相处。近几年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特别令人鼓舞的是，不久前陛下和王后陛下对我国的友好访问[4]和中尼边界条约的签订[5]，使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支持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在平等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友谊的政策。中国人民愿意同尼泊尔人民继续密切合作，为促进亚非各国友好团结、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亚

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陛下在领导尼泊尔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祝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万古长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2月16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尼泊尔的国庆日。一九五〇年十月，英国与尼泊尔签订条约，放弃在尼泊尔的特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尼泊尔大会党联合国王势力，推翻拉纳家族一百零五年的统治。二月十八日，尼泊尔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这一天成为尼泊尔国庆日，称“国家民主日”。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五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访问中国。其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联合公报》。

〔5〕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刘少奇和马亨德拉在北京分别代表中、尼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上签字。该条约共五条，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条约全文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小平、吴冷西[2]同志：

此件我在几处地方又作了一些修改。请阅。如果你们同意，即送印刷所付印。[3]

刘少奇

二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上。这个讲话，中共中央以中发〔62〕76号文件下发，见本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3〕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记录稿上批示：“无意见，可即付印。”

对财政部关于《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彭真、刘仁[2]同志阅处。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刘少奇

二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财政部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关于《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的报告上。报告反映财政部派工作组了解到：北京市冶金局布置的一九六二年钢铁生产计划大大超过国家下达的计划，使得钢厂今年仍然要大量亏损，并造成燃料紧张、产销脱节、资金周转不灵等一系列问题。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祝贺摩洛哥王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拉巴特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

在摩洛哥王国国庆[1]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向摩洛哥人民和摩洛哥王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摩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的指导下，正在不断发展和加强。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有助于增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

祝陛下和摩洛哥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摩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3月2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法国同摩洛哥在巴黎签署联合声

明，宣布“承认摩洛哥的独立”。这一天被定为摩洛哥国庆日。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对《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材料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

小平、彭真[2]阅后，交谢富治[3]同志办。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海公安机构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

刘少奇

三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编印的《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增第3号）上。该期刊载的《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一文反映了青海省公安系统破坏法制，违反政策，组织不纯，贪污盗窃等情况极其惊人，说上述问题主要是该省有关领导一意孤行，“左”倾蛮干所致。省委对公安机关的问题正在着手处理，但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中央政法部门派工作组前去帮助。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

对《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材料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

总理，先念，姚依林[2]同志：

关于群众的烧柴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商业机构是不能不管的。否则，要破坏生产。但如何管法？要研究。[3]

刘少奇

三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商业部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编印的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商业工作简报》（特刊）上。该期刊载的《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中说：最近各地反映的农村煤炭供应情况，很值得注意。一些农村特别是灾区，由于燃料缺乏，较普遍地出现了砍树、拆房和烧旧家具等现象；不少地方的农民到城市抢购、套购煤炭；河北、陕西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出现煤炭黑市，甚至发生群众抢煤事件；不少地方因燃料困难而烧了饲草，造成牲口瘦弱、死亡。

〔2〕 总理，指周恩来。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

主任、商业部部长。

〔3〕 周恩来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财经小组正在开会，会毕即将向常委和书记处报告。这件事也在讨论中。”

对陈云等关于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二年三月）

一

尚昆[2]同志：

此三件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同志，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在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3]

刘少奇

三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我过去管粮食工作的期间，黑龙江的同志来谈粮食生产情况的时候，总是要着重说到霜期来得早还是来得晚的问题。因为这是影响那里粮食产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霜期来得早，日照时间短，粮食产量就会减少；霜期来得晚，日照时间长，粮食产量就会增加。去年黑龙江和

吉林的雨水条件很好，霜期又推迟了半个月，收成应该比前年好。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材料，说明去年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究竟比前年增加多少。河北省的同志来谈粮食生产情况的时候，总是要谈到所谓“七下八上”的自然条件问题。就是说，如果七月下旬、八月上旬下大雨，就要淹掉几千万亩地，造成灾荒；如果这二十天不下大雨，就能够使这几千万亩地保收。去年除了沧州专区淹掉一些耕地以外，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在“七下八上”期间，雨水都是调和的。但是，现在也还没有具体材料，说明这个省的粮食产量究竟比前年增加多少。把这几个省去年粮食增产的情况调查清楚，掌握几个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最好的年景下农业增产的典型材料，这对于我们研究今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是会有帮助的。如果这几个省在去年最好的气候条件下增产也不多，或者不增产，那就是一个证明，今后农业恢复的速度不能够很快。

三

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否如此？是否说得太严重？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个很大部分的黄金、白银储备，在对外贸易上欠了债，还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证明是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主要是

开支工资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四

少奇同志提出三年到五年时间，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我们要力争这个上游。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在国务院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二版，第191—206页），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会后，这三个讲话的记录稿送刘少奇审阅。本篇一是刘少奇在陈云讲话记录稿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刘少奇对陈云讲话记录稿中两段文字的修改，本篇四是刘少奇对李富春讲话记录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本篇二、三、四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等文件。三月十六日，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

况。毛泽东同意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112号文件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发至省、军级党委），指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开会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指示还指出："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同志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也基本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两同志的讲话。现在把他们的讲话发给你们。克服目前困难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措施，中央将分别作出决定，陆续通知你们。""中央希望你们接到陈云等同志的讲话以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认真讨论。""在讨论以后，请你们遵照中央已做的决定和将要下达的决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和讨论陈云等同志的讲话范围的通知》，决定陈云等讲话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

给段树成等人的信[1]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

段树成、袁东生、李言孝、彭炳秋同志：

你们在1961年9月13日写来的信，早已收到，谢谢你们把天华大队的一些情况告诉我。知道你们大队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有进步，我很高兴。你们信中提的关于生产队规模、三包一奖和分配中的其他问题，在贯彻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是否得到解决？还有些什么问题？希望常常写信来，成绩缺点都可以讲。

我原来准备今年春夏再到天华大队来看看[2]，现在看来，恐怕做不到了，等以后有可能时，再来看看你们大家。

握手！

刘

1962年3月10日

根据审定件刊印。

注　释

〔1〕 这封信是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代为起草，经刘少奇修

改过的。段树成等当时是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的社员。

〔2〕 刘少奇曾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至三十日在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

接受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易卜拉欣·扈利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

刘主席在答词中表示，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地站在叙利亚人民以及阿拉伯各国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团结反帝的斗争，坚决支持他们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所作的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指导下，同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接受叙利亚新任驻华大使易卜拉欣·扈利递交国书时致答词的新闻报道。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

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一九六二年三月）

讨论这次二届三次人大[2]应当怎样开法，国家当前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政策？毛主席说不要等他开会。

两年来才开这次人大的原因。情况不明。现在有些情况已经明了，有些还不十分明了，还无确切把握。今年计划和预算还不能提出。

会议是要估计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总结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四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最近中共中央开了一次七千多人工作会议[3]。（它的参加者），讨论了上述议程。发扬民主，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批评中共中央，其次批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国内形势：

在经济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人民的吃、穿、用都感不足。为什么不足？1959 年以来三年农业减产相当大。一九六一年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二年工业也难于回升，还可能再有若干减产。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出乎我们许多人

的意料的。原来以为会有跃进，现在不独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情况。从经济上说，目前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严重困难的形势。这是基础。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党内、各民主党派是团结的，是大好形势。

出现这种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天灾；二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何者为主？各地情况不一。湖南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各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工作中有些什么缺点错误？

一、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使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比例，发生严重不协调现象。农业高估产，高征购。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大办。瞎指挥。农业上乱改耕作制度，建设一些无益有害的水利工程。工业上任意废除规章制度，推行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设备损坏，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在集体所有制内部进行了不适当地过多过急的变动。就违反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急于过渡的错误。

三、建立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分散主义倾向有了滋长。发生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

现象。经济生活中集中领导受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现象严重。党政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滋长。

我们有这许多缺点和错误，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有成绩。不应当忽视当前的困难，不应当隐瞒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尤其不应当否认工作中的成绩，抹煞成绩。事实上我们在十二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十二年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两种所有制，先进经济制度已确立。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建立重工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新型民族关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各阶层各族人民在国际、国内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考验。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了。朋友经过考验，困难时看朋友。国际地位根本改变，作用加大。

变化很大，改造和建设工作很不错。建设是长期事业。

一九五八年以来，三面红旗，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干劲，进行了巨大努力，建设取得一系列新成就。

1. 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

2. 基本工业——煤、电、石油、钢、有色、化学、建材、机械、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很大的增长。

3. 机械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提高。

4. 工业地区分布进一步改善，各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5. 地质工作广泛开展，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更多了解。

6. 农业集体化到了更高水平，人民公社抗灾能力加大。

7. 农田水利建设有很大成绩，农业机械增多。

8. 工程技术人员大增，技术水平提高，能独立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

9. 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世界水平。

10.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大学毕业生生每年超过十万人。

11. 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政法工作，外事工作，有成绩，取得了很多经验。

12. 国防建设，解放军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及其他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人民能够发挥的潜力，极为巨大。

成绩和缺点，那样是主要的？

总的说来，1958 年以来，成绩还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但各地情况不一。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适用于一部分地区，不能到处这样套。也不适用于总的情况。有些地区，信阳、天水、酒泉、张液〈掖〉、青海、蚌埠、阜阳，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各地可以自己作出初步判断。以后再作。

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不要忘记了。有成绩，好事；有缺点错误，坏事。但缺点错误大部已停止，已改正，或正在改正。大部已经过去。病已基本好了。食堂供给制不搞了，高指标不搞了，许多大办停了，基建战线缩短了，水利不搞很多了。缺点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学习，总结经验。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用不着悲观丧气。

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的错误，而是在执行路线的具体工作中的错误。

缺点错误的责任，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只有很少责任。在中共内部，又首先是中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市区党委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中央决定的某些政策、文件、指示等。

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某些长期不能改正。一方面是由于经验不够。有人说，第一个五年也无经验为什么未

犯严重错误？

另一方面，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调查研究不够，只听会〈汇〉报，轻信孚〈浮〉夸会〈汇〉报，未很好同群众商量。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为高指标等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到群众〔中〕去又没有充分听取意见，发现和改正错误。后来，有些地方完全依命令办事，用电话瞎指挥。群众性大会也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严重地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上下不能通气。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能发现，改正。党内不纯，坏分子兴风作浪，加重了错误的恶果。

改正错误的办法。我们的特点是老实犯错误，老实改正错误。自己揭露缺点，不掩盖。让人家批评缺点。有人不让，不对。坚持真理，检讨，修正错误。郑重的党的标志。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和党。我党过去犯过错误。如日月之蚀。过而能改。

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经验，正面的，反面的，以后就好办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经验是要长期起作用的。是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4]，是初步总结，以后看得更清楚，再总结。

任务：总理[5]要说。增产节约，精兵简政。大力增加

农业生产，增加日用品生产，缩短基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渡过困难，调整工业内部关系。

三面红旗问题。

总路线。继续实行。执行中有偏差，只注多快，未注好省。以后要注意好省，注意品种质量的跃进。配套。更生。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执行中许多同志没有注意使人民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切实力争上游，而只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主观主义地蛮干。又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所以是执行中的问题，只要纠正这些偏差，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就会是很好的。

大跃进。过去解释有片面性。不是每年番〈翻〉一番，增加百分之几十。要从一个历史时期看。资本主义已是一个跃进。社会主义苏联又是一个跃进。我们是否可能更快一点。苏联廿一年增产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七〇年是否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或者更多。应继续为人民奋斗目标。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再过若干年可能看得清楚。它可增加积累。实行机械化。口号不取消。

人民公社吸收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优点。规模、评工计分，土地无报酬，对五保户、困难户有补助。优点都有。人民公社是旗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供给制社会保险作用。农忙食堂。

人民公社办早了。

一开始就以小队核算。

应办，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应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有步骤、有秩序、有区别，分期分批，逐步推广。主要教训在此。许多群众运动也应如此。城市公社。

三面红旗都不取消，继续保持，继续为之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再过五年、十年，再来总结经验，就可进一步作出结论。

十五年赶上英国。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6]。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政治局面，而努力。进一步密切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党内重新教育干部。恢复优良传统作风。

加强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团结，克服困难，继续胜利前进。我们经验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办法多了，不是少了。当前困难还是严重的，有信心克服。只要几十年就先进了。立大志。

定息是否延长三年？

国际形势。总理要说。人民革命继续前进，是好的。出现和发展修正主义，威协〈胁〉团结，造成分裂危机，是不好的。

但是天也踢〈塌〉不下来。中苏关系如可能，应加改善；如不能，也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这块地方还是归我们管。别人管不了。我们不去管别人事。努力团结全世界的人民，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此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方针，听取刘少奇和周恩来关于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的讲话。

〔2〕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3〕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

〔4〕 指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讲的十六条“基本经验”。参见本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5〕 指周恩来。

〔6〕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稿的修改[1]

（一九六二年三月）

一

一九六一年各地方、各部门动用了三十亿元的上年结余，但是国家财政没有拨钱给银行弥补，欠了银行三十亿元的信贷拨款，所以产生了三十亿元的赤字。

一九六一年银行信贷的资金来源（财政拨款、企业存款、利息收入）比上年增加六十亿元，各项贷款比上年增加九十亿元。逆差三十亿元，这是靠发三十亿元的票子弥补的。一九六一年年初市场货币流通量是九十五亿元，年底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亿元。这些情况同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时的估计是相同的。在生产和流通缩小的情况下增发了票子，实际上是财政发行，是财政收支有赤字的反映，是商品和购买力之间有逆差的反映，是一种通货膨胀。

二

过去几年所谓“财政无问题，问题只是物资不足”，是一种假象，财政赤字就在这种假象掩盖下面没有揭露出来，问题就在这里。

三

必须按照中央加强集中统一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物资，物价等方面的管理权限，切实地认真地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才能真正做到货币发行集中于中央。在这些方面绝对不能再闹分散主义。

从一九六二年的实际情况看来，要做到不再增发票子，保证预算和信贷指标不被突破，要按照计划的规定，坚决守住以下八条界线：

（一）工资总额，控制在二百二十四亿元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

（二）农村人民公社投资，控制在四亿元以内，全部用于拖拉机站，实行货到转账，不发现款；

（三）农业贷款，指标不加，控制投放，收多少贷多少，争取多收一些，少贷一些（由银行发出控制指标），合理使用，支援生产，不得用于生活救济；

（四）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在三十七亿元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要规定各单位的用钱限额，并且逐笔

核批，事业、行政单位要抓紧，企业更要抓紧；

（五）小型冶炼企业亏损补贴，包括这些企业精简职工的处理费用，控制在三亿二千万元以内；

（六）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和贷款，除了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确实需要增加的部分以外，只许减少，不许增加（新开工企业要从严核拨），严格按计划控制，动用银行的预备贷款必须经中央批准；

（七）继续冻结一九六〇年冻结的存款，并且冻结一九六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结余。如果必须动用，应当按照规定，分别报经中央或者中央局批准。

（八）基本建设拨款控制在五十八亿元以内，大区结转水利投资控制在三亿元以内，预算外投资控制在二亿元以内，只许减少，不许超过。严格禁止企业乱挤生产成本、挪用流动资金和原料材料去扩大基本建设，严格禁止在国家计划以外用任何名义增加基本建设工作量。

四

为了改变目前工商企业大量亏损的现象，必须迅速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除了国家批准的计划亏损的企业以外，所有企业必须由各级党委和主管部门分别规定期限，改变亏损状况。到期不能改变严重亏损状况的，必须下决心关掉，遣散职工。使企业由亏变盈，是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和商业条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五

目前整个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中央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克服当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号召，将给今后工作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我们积累了在有利的和不利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正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各项工作的秩序正在日益趋于正常。农村形势初步好转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九六二年各方面的工作将获得新的胜利。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修正草稿中五段内容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报告分三大部分：一是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和四年来财政的简单回顾；二是一九六二年财政信贷指标的安排；三是执行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的几点意见。

对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

一

邓力群[2]同志：

此件明天下午中央开会讨论。我有一些修改[3]，请你找财贸同志[4]再修改一次，明天带至会场。

刘少奇

三月卅日

二

退李先念[5]同志。已阅，可以用了。重印，送主席批准后即可发出。[6]

刘少奇

四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刘少奇在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九六二

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报告稿的批语草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刘少奇在李先念办公室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为送审上述中央批语和财贸办公室报告修正稿给刘少奇办公室报告上的批语。

〔2〕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3〕 见本书《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稿的修改》（一九六二年三月）。

〔4〕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同志。

〔5〕 李先念，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6〕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在李先念办公室给刘少奇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已阅。”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154号文件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

祝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1]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尊敬的总统阁下：

值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2]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的缔结不仅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友好树立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年来两国的友好关系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两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和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方面的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友好往来更加密切。不久以前，两国政府又顺利地完成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工作[3]，这是两国友好合作的又一次重大成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直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

坚定不移地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为收复西伊里安〔4〕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直到你们取得完全胜利。

我深信，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6〕的基础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从而为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繁荣，人民幸福。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2 年 3 月 31 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复电刘少奇，复电全文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副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四月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批准友好条约。五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友好条约。六月十四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北京互换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在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条约随即生效。六月十五日，条约全文（共八条）在《人民日报》发表。

〔3〕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就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在北京举行

初步谈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十日，双方代表在雅加达和万隆继续进行谈判，一致同意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四月二十二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纳约在万隆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上签字。该条约共十四条，于四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日，双方在北京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根据条约的规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十二月十五日，双方在雅加达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并规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十二月十九日，国务院举行第一零七次全体会议，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十二月二十四日，该办法分别在北京和雅加达同时公布生效。该办法共四章十三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6〕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

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印发刘少奇谈话要点请示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四月四日）

谢富治、徐子荣同志：

这个记录不要印。过去，你们已经印得有些过多了，将来会出毛病的。四年来，公安政法工作方面的确有不少新的经验需要总结，如果你们搜集了材料，我可以参加，和你们一道，认真地系统地进行总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这样草率零星地印发东西。

刘 少 奇

四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刘少奇在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谈话中，就公安工作的一些问题指出：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要认真总结。三月十八日，谢富治将这次谈话追记整理成“少奇同志的指示要点”材料。四月二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送

审这份材料时在上面写道："少奇同志：此件是根据富治同志追记整理的。公安部党组作了讨论，觉得很需要抄发给各省市公安负责同志阅。我曾送彭真、尚昆同志阅过。彭真同志同意发，要我向您请示。可否抄发？请示。"本篇为刘少奇在徐子荣送审材料上的批示。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阅发陈云有关经济工作意见摘要问题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1]找陈云[2]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3]，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刘少奇

四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2〕 陈云，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陈云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见《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二版，第207—215页。

关于任命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命令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任命蔡廷锴[1]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2 年 4 月 16 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蔡廷锴，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

大马士革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纳齐姆·库德西阁下：

值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叙利亚人民表示热忱的祝贺。祝中国和叙利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增进。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2 年 4 月 16 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等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

自从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并且指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以后，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都很重视，认真组织了传达和执行，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

二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只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进行，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要进行，只检查干部是否有多占多吃等行为。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

地，分期分批地进行。运动的时间，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三

印发西楼会议[2]各同志。

刘少奇

四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反映财贸部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情况：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是健康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试点中个别地方虽然发生过斗争面偏宽的现象，但很快得到制止。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若干具体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各地要求进一步加以解决。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对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重大意义仍然认识不足；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个别地方对运动的领导不够有力，有些松劲。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1）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2）反对商品“走后门”，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规定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比例，按照实际情况办事。（3）要把一般性“走后门”与严重“走后门”区别开来。（4）关于划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界线和处理的问题，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5）关于追退赃款赃物问题。赃款赃物，原则上应当退回。能一次退清的一次退清，一次退不清的可以分期退，确实无力退的可以酌情减免。

(6）关于检查“走后门”的时间，以限制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以后为适宜，不要再往前追算了。(7）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一般要同职工一起参加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8）在厨师、理发工人、加工企业生产工人和财贸学校的学生中，不要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9）反对商品“走后门”必须同改进制度密切结合。本篇一、二是刘少奇对这篇报告中两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刘少奇对该报告的批语。

〔2〕 西楼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形势问题，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经济，要全党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印发西楼会议的文件是：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草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的报告。

对谢富治关于甘肃省公安工作中几个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主席[2]：

此件值得一看。

刘少奇

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甘肃省公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给公安部党组并报刘少奇等的报告上。这个报告反映甘肃省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是：省里在一九五八年反右派补课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内部搞了一批反革命集团假案，执行了错误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对劳动教养分子采取不妥当措施，调到边远地区，丧失社会同情。

〔2〕 主席，指毛泽东。

对关于部分军事部门违规修建计划外工程材料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请尚昆[2]同志电话通知萧华[3]和云南省委，采取切实的办法停止这些基本建设。[4]

刘少奇

四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三十八期）上。该期刊载的《巧计对中央》材料说：长春第五坦克技术学校用“走后门”的办法搞来大批建筑材料盖大礼堂，接到中央停止修建非生产性建筑的指示后，又巧立名目修建大礼堂，并布置对内、对外实行保密；另据群众来信反映，部分军事部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后，违抗中央指示，继续修建大楼等情况。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认为我们的解放军是有优良传统的部队，不应该做出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萧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4〕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报送刘少奇、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的关于执行中央严禁计划外工程施工和刘少奇主席指示的决定中说：中央关于不许再建楼、馆、堂、院、所的决定公布后，军委极为重视，但仍存在一些缺点，一是检查不够，二是决心不大，没有及时停下来，这是要作检讨的。自接到中央五月三日的决定和刘主席四月二十九日的批示后，军委即决定，凡未完工的楼、馆、堂、所，均一律停止施工；凡不属楼、馆、堂、所的建筑，重新进行审查；并即电话通知各军区和各军兵种，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长春第五坦克技术学校的礼堂是计划外的工程，一九六〇年开工，去年底已停建，并责成检讨。

接受摩洛哥首任驻华大使兹尼贝尔递交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

大使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摩洛哥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1]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转达哈桑二世陛下和摩洛哥人民对我国人民、毛泽东主席和我本人的友好祝愿。我愿趁此机会通过大使阁下，向贵国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和摩洛哥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诚挚敬意。

中国人民和摩洛哥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早就把中摩两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自摩洛哥独立和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2]以来，中摩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4]的基础上，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摩洛哥人民、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谊。我们一向认为，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就一定能够取得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亚洲

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摩洛哥是高举着反帝旗帜的卡萨布兰卡宪章[5]的国家之一，奉行不结盟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且为争取撤除在摩洛哥的外国军事基地而进行斗争。中国人民衷心支持摩洛哥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并且希望摩洛哥人民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大使阁下：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摩洛哥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阁下为发展和巩固中摩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将会得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的充分协助。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和巩固！

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祝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健康！

根据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摩洛哥王国首任驻中国大使为阿卜杜勒·拉赫曼·兹尼贝尔。

〔2〕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法国同摩洛哥在巴黎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中国和摩洛哥王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建立两国外交关系。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

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4〕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5〕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至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几内亚共和国、加纳共和国、马里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的国家首脑和利比亚联合王国的代表，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卡萨布兰卡非洲宪章》。宪章说：“为了巩固非洲的自由和加强非洲的团结一致和安全，决定：

（一）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快地建立一个由一切非洲国家的代表组成的非洲协商议会，这个机构将有一个常设的会址，并定期举行会议；（二）建立以下四个委员会：（甲）由国家首脑或他们正式委派的代表组成的非洲政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协调和统一各个非洲国家的总政策。（乙）由非洲独立国家经济事务部长组成的非洲经济委员会，它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作出关于非洲经济合作方面的决定。这个委员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将是在非洲各国的首都之间建立邮电联系。（丙）由非洲独立国家的教育部长组成的文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以维护和发展非洲文化和文明、加强非洲的文化合作和协助。（丁）由非洲独立国家的参谋长组成的非洲联合最高司令部，它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在非洲大陆任何地方一旦遭受侵略时确保非洲的共同防御，以便保障非洲国家的独立。（三）设立一个联络局，以便在上述各个组织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尤其要在三个月内举行专家会议，负责确定关于上述组织行使职能的切实程序。”

对无锡市机电工业产品大量积压问题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

请富春、谷牧[2]同志迅速处理。[3]

刘少奇

3/5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无锡工作组董晨、王愈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为送阅《机电工业产品大量积压宜速处理》（无锡工作组调查材料之二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刘少奇的报告上。报告说：无锡市的机电工业产品大量积压，大量机器长期露天存放任其生锈，浪费了材料，占用了资金，已经很不合理，奇怪的是明明知道生产出来的机器不符急用，却还在大量投料继续生产，扩大这种不合理。这种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制止，对克服当前严重困难是不利的。因此，材料中提出对生产那些不符急需的产品的工厂、车间，采取急刹车的办法。我们想，不再继续扩大这种积压，是可以办到的；至于今后机电工业生产计划的合理调整，可根据需要从长计议，也可按门类一批一批地安排。随报告所附的该工作组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撰写的《机电产品大量积压宜速处理》说：无锡市重工业局所属四十个机电工厂和中央一机部直属企业所生产的机电产品，大量积压。一部分虽经主管分配部门收购付款，但仍在企业存放；另一部分尚未分配，大量占用企业资金。积压产品几乎全部露天存放，如不迅速处理，将损失更多，而且新的积压现象仍在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早解决。（一）工作组准备会同市委和有关部门商量，能在当地解决的问题，力争迅速解决，并督促工厂企业妥善保存积压产品，尽量减少损失。（二）请中央考虑是否指示各地计委（经委）会同银行等单位，通过清仓核资工作，严格检查各生产企业，对目前仍在继续生产没有销路的大量积压的机电产品，应该立即“刹车”，停止制造。（三）请国家经委物资管理总局通知所属上海、江苏机电设备一级站和农机部上海、江苏农机站，迅速将收购的积压产品，分配调拨，不能马上调拨的，也应负责督促，妥善保管。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3〕 李富春在董晨、王愈明的报告上批示：“谷牧同志：请与各大区经委主任和黎玉同志即商呈：（一）凡是未列入国家计划的产品一律停止生产。（二）已生产已收购的，即调运到仓库保存。”黎玉，当时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对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

我说过，以后给中央管理干部以撤职以上处分者，要由省委建议，中监委决定，中央批准。没有说，目前取消处分，也要由中央批准。目前甄别，主要是取消处分人数太多，应放宽，安徽办法是可取的。此件如要发给各地，应写得更全面一些。

邓[2]、中监委再阅。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请示报告上。报告送审了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的通知稿，并附有安徽省委同年四月十三日批转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同月五日关于甄别案件审批手续的请示报告。参见本书《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的通知》（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关于党内处分干部审批手续问题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报告收悉。关于甄别案件的审批手续，如果经过甄别，仍予维持原来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者，凡属于中央管理干部的案件，均应由省委讨论决定、经过中央监委审核报中央批准；属于省委管理干部的案件，要经过省委监委审核报省委批准。凡是取消原来处分，或者只维持撤消职务以下的处分者，可按甄别领导小组四月五日的请示报告办理。今后党内处分干部也应照此办理，过去那些不符合上述手续的作法应改正过来。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中共安徽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六二年四月五日就

甄别案件审批手续问题给省委的请示报告中说：我省甄别案件数量较大，如都集中到省委常委讨论，将影响当前工作和案件及时审批。为此，特对甄别案件审批手续提出如下意见：（一）属于中央管理的需报中央审批的干部案件同中央委托省委管理需报中央备案的干部案件，一律报送省委常委讨论决定。省委主管干部中的重大案件以及各有关方面有分歧意见的案件，也需报送省委常委讨论决定。（二）属于省委管理的干部案件，省委委托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代表省委和省委监委审查决定，并定期将审批情况向省委常委汇报。（三）省委各部委和厅（局）副处长以及相当这一级干部的案件，由省委各口甄别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报省委（送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四）甄别案件批准后，要按干部管理范围，分别由有关单位办理行政手续和法律手续。同年四月十三日，安徽省委将上述报告批转所属各地市委、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党组、各大专学校党委、省直属党委并报中央、华东局，批语说："省委同意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甄别案件审批手续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今后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案件的甄别审批，即按报告中所提审批手续办理。如有不妥，请中央、华东局指示。"五月五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请示报告中说："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甄别案件审批手续的请示报告'，经我们研究，认为第二、三条都有些问题。据了解类似安徽的作法，其他地区也是存在的。因此，根据恩来同志转达少奇同志的指示原则，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电报稿，拟除复安徽外，并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现送上，请审阅。"五月七日，杨尚昆在中央监委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小平同志阅批。"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该报告上批示：“刘、彭核发。”刘，指刘少奇。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本篇是刘少奇对中央监委起草的中央通知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

对《内部资料》第八期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此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2]各同志参考。已发文件八[3]收回。

刘 少 奇

五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五月四日编印的《内部资料》第八期上。该期刊登的六篇文章是：《社队办的企业亟需整顿》、《农村减少国家粮食供应的潜力大》、《和县基层供销社赊销现象严重》、《税务人员少税款收不足》、《不少来信要求领导上帮助解决耕牛问题》、《古田县溪水水库移民结队请愿》。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将该期《内部资料》送刘少奇阅看，并请示："此件反映了农村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与巩固集体经济和调整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关系问题有关的。是否可以印发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作参考。"该材料印发时的标题改为："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和调整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关系问题的有关材料。"

〔2〕 指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3〕 指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的《农村减少国家粮食供应的潜力大》一文。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提纲[1]

（一九六二年五月）

同意财经小组报告[2]，修改后发出。发至哪一级？

一九六二年计划调整，有个别指标可能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来每年调整计划指标，都是调低的。一九六〇年调高一次，没有完成。现在还是调低。以后是否可以不再调低了，而让执行结果超过计划。这就再不要搞高标。尾巴去掉。

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在经济上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困难形势。一部分地区形势较好，但总的是困难的。

最困难的时期是否已经过去？有些地区还没有过去。城市和工业的困难时期未过去。有些地区已有好转，但还有不少困难。但一般来讲，政治形势还是好的，团结的。但也要提高警惕，可能出乱子。

对当前困难是否估计够了？可能够了，但对某些具体困难，还可能估计不够。还可能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

是否对困难有估计过分的危险？现在还没有。估计不够有危险。应当充分估计当前以及我们还估计不到〔的〕困难。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克服困难的准备不够，是危险的。

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二千万。以后每年减少城市人口二三百万。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有许多人要求回乡，但组织上不准，应让他们回去，由城里人补充。

决心要大，行动要快，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安置。

减少学校学生，要注意方式，可能由〈有〉学生闹事。事情闹大了如何办？保证大城市不闹大事。要准备宣布戒严，维持秩序。要事先作好动员解释工作。负责人出台〈面〉。干部领导下乡。

十年不回来不要讲。也不要答应几年回来。解释，首先干部、党内，群众，乡村。一律不登报，作口头解释。要作自我批评。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为了克服困难，调整和改组国民经济，所有各工作部门，都必需紧张地工作，特别工业交通各部门更应如此。不能说农业是重点，工业指标降低了，就可以休息了。不能休息，要比大跃进时更紧张的工作。否则，不能调整和克服困难。

迅速通消息，迅速处理。废品收购，贷贷款购水果。

精简小组负不了责。

今天工作比大跃进更困难，更有本事才能做好。

在调整工作中必需加强纪律性。不能在这种非常时期消极怠工。不顾大局。

调整，减少城市人口，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经济情况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它是当前最积极的措施。

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粮产区生产。生产资料，工业品，留粮，及其他。

商业问题：供销社速办，进城。价格调整以后办。姚[3]历来乐观。当年平衡还要努力。以后由中央决定。废品收购。价格低，不收购，可收购以后清算。

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邓子恢讲的中央再讨论。养猪饲料地也要再讨论。[4]

要派得力的人到农村加强生产队领导。已瓦解的，动摇的，巩固的。

公社、大队原则上不办企业。

要分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两方面安排工作人员。

干部下放，加强领导。

各部总结经验。明年做好。成绩、缺点。

加强法院和检察署。独立审判。[5]无人到会。矿工井下工加强。

前途光明。天就黑了吗？黑漆一团。[6]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讨论中央

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这个讲话后经整理，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版，第444—449页。

〔2〕 指中央财经小组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作出分析，如实指明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提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三）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这三项决策的具体措施。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在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在县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中，口头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方针；地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到省委和中央各部委去阅读中央财经小组的书面报告。军队中传达和阅读的范围，由总政治部比照这个规定办理。"

〔3〕 姚，指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4〕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总结讲话中说："邓子恢同志还讲了一篇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再来讨论。陈伯达同志写了一个养猪饲料地的稿子，还要再讨论。"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就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权、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

解决。他还说：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阶级分化，危险在那个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百分之十，二至四亩的百分之七，四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政权是我们的，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广西龙胜县的山地有十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百分之六十。原因有各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让它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有什么不好？会议对邓子恢的讲话没有做出决定。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社总编辑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养猪饲料地问题的指示（草稿）》，也没有做出决定。

〔5〕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总结讲话中说：“要加强法院跟检察院。法院审案子还是要独立审判。不要把他们减掉。现在已经精简得差不多了，几乎没有了。现在不是去精简他们的问题。当然，某些地方还可以减，但总的来说是加强的问题。”

〔6〕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总结讲话中说：“总而言之，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黑漆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这并不是说，承认我们有困难，承认我们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成绩没有那么多，天下就黑

了，就再白不起来了，不会的。整个来讲，调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战役。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战役，第三个五年计划又是一个战役。战役上要重视困难，但是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同当前在工作中、在战役上重视困难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我想，我们共产党员，革命者，多少年来，更大的困难都克服了，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当前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克服。”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8—449页。

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问题给广州市政府的信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广州市政府负责同志：

现将陈功武等同志来信[1]一封转上，请你们酌情办理。

陈功武等同志所说的历史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五月一日成立，当时会址是临时的。那时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处。在解除许崇智部队的武装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入许崇智司令部办公，全国总工会才迁入惠州会馆办公。此时，是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至一九二六年冬，全总迁至汉口友益街办公，但全总广州办事处仍驻惠州会馆，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叛变时止。当时全总是在惠州会馆二楼办公，一楼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等办公处。

广州工人代表会何时成立，我记不清了。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以后改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由汉冶萍总工会、中国铁路

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团体发起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这是我所能记忆的当时的情况。

敬礼！

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前广东全省油业总工会兼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秘书陈功武等人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给刘少奇的信。信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广东工人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并说：广州市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的二楼，当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地点，而一楼是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广州工人自卫队的办公旧址。现在该馆复原，内部仍照原来布置，但只称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就不能反映原来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这三个组织的木质招牌在该会馆门首统统照旧复原，并在二楼悬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布质旗帜。这样才是合理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更富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遇刺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亲爱的总统阁下：

惊悉阁下再次突遭帝国主义指使的歹徒袭击[1]，庆幸无恙，谨致亲切的慰问，并对不幸被刺伤的蔡努尔·阿里芬、伊达姆·哈利德等先生表示真挚的关切和良好的祝愿。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这一卑鄙行为，将更激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同仇敌忾。我们深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阁下的领导下，为捍卫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为争取西伊里安[2]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而坚决斗争到底。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5月15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与内阁部长、其他著名人士以及雅加达居民代表，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古尔邦节仪式时，遭到印尼叛乱集团卡托苏维约武装成员的突然开枪袭击。苏加诺无恙，印尼合作国会议长蔡努尔·阿里芬、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伊达姆·哈利德等五人受轻伤。此前，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晚，苏加诺曾遭遇手榴弹袭击，见本书《关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遇袭的慰问电》（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注释〔1〕。

〔2〕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对《大豆怎样吃法更好?》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

吴冷西[2]同志：

此件请同国家科委联系，用科学研究机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3]

刘 少 奇

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室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编印的《科学研究试验动态》第232号上。该期刊登的《大豆怎样吃法更好?》一文，分析了大豆的营养价值，认为有必要注意讲究大豆的食用方法，提出：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半生半熟的大豆粉、干炒豆或煮大豆，大力提倡吃豆浆、豆腐和各种发酵过的豆制品，增加发酵酱油的生产等；同时还须注意与其他蛋白质食物（谷类粮食）合理搭配食用，如把熟大豆粉掺入谷类面粉中作主食。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3〕《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以《大豆怎样吃好?》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室”。

关于楼堂馆所收归国有统一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

一

李先念[2]同志阅后送总理[3]一阅。

是否可以考虑，将县以上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所建楼、堂、馆、所，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组织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使用者一律按标准付给租金。这样，可以制止盲目建设楼、堂、馆、所，也可限制盲目占用房屋。

刘少奇

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件可以一看。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九期目录页上。本篇二写在该期刊载的

《安徽将宾馆饭店划归商业部门经营》一文上。该文说：据安徽省商业厅调查，目前宾馆、招待所、旅馆、饭店因经营管理有问题，以致减少了国家收入，增加了计划外开支。该厅党组建议：全省只保留有招待外宾任务的宾馆五处，实行企业核算，盈余上交，亏损由财政补贴；各地市县机关只保留一个简单的招待所（不能占用旅馆）；其余各地的宾馆、招待所，各地各部门办的和公私合营的旅馆饭店，一律划归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管理，实行企业核算，利润收入归商业部门解缴国库，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不能动用。合作旅馆、饭店也一律划归商业部门领导管理。社队办的旅馆、饭店，所得税应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征收。安徽省委原则上同意商业厅党组的意见，并在四月二十六日指示各级党委迅速制定移交方案，教育有关单位职工，做好交接工作和今后的经营管理工作。

〔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总理，指周恩来。

对中央批发国家经委党组两个文件的指示稿的修改[1]

（一九六二年五月）

目前，市场商品严重不足，工业部门应当根据市场需要，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近来，某些轻工业企业出现产品积压，这是一种暂时的不正常现象。工商双方应当同心协力，改进工商关系，及时签订产、供、销合同。工业部门应当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积极增加市场需要的花色品种；商业部门应当按合同积极收购适用的产品，努力扩大货源，增加市场供应。对目前工厂积压的产品，凡是市场需要的、质量合格的，商业部门都应当收购起来。质量有些不合格，但是仍可使用，市场上仍可销售的，应该降价收购。有出厂价格的，按出厂价格收购；没有出厂价格的，由当地人民委员会规定出厂价格，予以收购。对于出产大量废品的企业，必须给以严厉处分，或者停产关厂，或者停工一个时期，待提高质量后再行开工，在停工期间，干部和工人工资一律减成发给。少数分散、零星的手工业产品，如果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可以收购的，应该收购；如果难于收购，可以允许手工业部门和企业，通

过传统的合理销售关系进行销售。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对中央批发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指示稿部分内容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238号文件下发这个指示。指示转发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的两个文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一个文件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汇报了国家经委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一日召开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基本情况，以及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即：当前工业生产的基本形势，关于工业调整和精减职工问题，关于第二季度的生产安排，关于清仓核资工作，关于加强物资管理问题等。另一个文件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该方案分析了物资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物资管理工作改革的方针和当前要积极抓好的几项工作。

对中央批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报告》指示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

我加了几句，请总理、谷牧[2]再阅。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送审的中央批发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同年五月三日《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报告》和五月一日《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的请示上。参见本书《对中央批发国家经委党组两个文件的指示稿的修改》（一九六二年五月）。

〔2〕 总理，指周恩来。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接受加纳新任驻华大使默塞尔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刘少奇主席在答词中说："中、加两国人民早已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自从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2]，特别是恩克鲁玛总统访问我国[3]以来，中加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地获得发展和巩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为基础的中加友好条约[5]是中加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事业的可靠保证。我深信，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是具有光辉的前景的，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

刘主席还说："加纳是高举团结反帝旗帜的非洲国家联盟和卡萨布兰卡宪章[6]国家的成员国。在恩克鲁玛总统的领导下，加纳一贯奉行不结盟的和平中立政策，积极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加纳人民在实现干部非洲化，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对此，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钦佩，并且预祝加纳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

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根据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接受加纳新任驻华大使詹姆斯·默塞尔递交国书时致答词的新闻报道。

〔2〕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加纳脱离英联邦，正式宣告成立“加纳共和国”。同年七月五日，中国、加纳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加纳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克瓦米·恩克鲁玛访问中国。

〔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5〕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恩克鲁玛分别代表中、加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加两国政府代表在阿克拉

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条约立即生效。

〔6〕 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至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几内亚共和国、加纳共和国、马里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的国家首脑和利比亚联合王国的代表，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卡萨布兰卡非洲宪章》。宪章说："为了巩固非洲的自由和加强非洲的团结一致和安全，决定：（一）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快地建立一个由一切非洲国家的代表组成的非洲协商议会，这个机构将有一个常设的会址，并定期举行会议；（二）建立以下四个委员会：（甲）由国家首脑或他们正式委派的代表组成的非洲政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协调和统一各个非洲国家的总政策。（乙）由非洲独立国家经济事务部长组成的非洲经济委员会，它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作出关于非洲经济合作方面的决定。这个委员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将是在非洲各国的首都之间建立邮电联系。（丙）由非洲独立国家的教育部长组成的文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以维护和发展非洲文化和文明、加强非洲的文化合作和协助。（丁）由非洲独立国家的参谋长组成的非洲联合最高司令部，它将定期举行会议，以便在非洲大陆任何地方一旦遭受侵略时确保非洲的共同防御，以便保障非洲国家的独立。（三）设立一个联络局，以便在上述各个组织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尤其要在三个月内举行专家会议，负责确定关于上述组织行使职能的切实程序。"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稿的修改[1]

（一九六二年五月）

城镇居民，农村有亲朋帮助而又愿意到农村落户的，可以下乡。来自农村的保姆，除了无家可归的以外，应当动员回乡。必须雇请保姆的家庭和托儿所，可以雇请精减下来的城里人充当。农村来的黑人黑户，应当动员他们回乡。在城市工厂劳动的劳改犯，能够调到农场或农村去参加生产的，都应当调到农村去。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稿作了修改，并批示：“特急件。送上两个精简文件，请尚昆同志阅正后，即送小平同志审批传阅。”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决定稿上批示：“刘、彭核发。发后将安置办法一件送定一同志阅，其中规

定的粮食等办法是可行的。”刘，指刘少奇。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在决定稿上加写的文字。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261号文件发出这个决定。

对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全国各地货币回笼情况资料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二年五月）

一

能否完成秋后农产品的收购，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必须努力增加生产，继续严格控制财政信贷投放，积蓄商品力量，做好准备，保证在秋后打好收购农产品这一仗。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二

邓、彭[2]阅后发。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刘少奇对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关于全国各地货币回笼情况资料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

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刘少奇写在该资料上的批语。同年五月三十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2〕266号文件下发这份资料。资料说：今年二月以来，全国各地由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财政信贷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货币发行量已逐渐减少。最近几个月货币大量回笼，是经济调整中出现的一个好现象，有助于稳定市场物价。但从地区看，目前全国各地的货币流通情况仍很不平衡，最近几个月的回笼情况也不平衡。另外，货币大量回笼的同时，商品库存也显著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品的后备力量，使下半年没有足够的主要商品去突击完成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这些问题，应当引起中央和各地有关同志注意，并考虑采取适当措施逐步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在今后工作中，除继续研究全国粮食、棉花、食油等农产品的合理分配外，还应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轻重工业、手工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及其产品的合理分配问题；研究各地区农轻重各种产品的调出量同调入量、商品供应量同工资总额是否大体适应。准备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轻重工业产品的集中统一管理问题，除重要生产资料已决定由物资供应总局统一分配外，重要消费资料也应逐步做到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分配，次要部分则由供销合作社稳妥地有步骤地组织各地之间的交流。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机关生产的弊病很多》材料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

仲勋、尚昆[2]同志：

此件值得注意，请你们研究一下，以采取什么办法进行整理为好。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四十九期上。该期刊载的《机关生产的弊病很多》一文说：据各地群众给中央的来信反映，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机关生产有很大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大量农副产品，改善了机关职工的生活，另一方面产生了很多弊病。这些弊病主要是：一，分散了国家的财力，损害了全民所有制，因为机关生产所用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由国家经费中支出的，但劳动果实却全部归机关人员所有。二，不完粮、不纳税，不交统购，减少了国家收入。三，成本高，产量低，国家赔钱太多。四，有些机关生产占地太多，甚至无偿平调农民土地，引起

农民不满。五，浪费汽油，增加了运输的紧张。六，举办机关农场，就要维持庞大的编制，机关不能很好实行“精兵简政”，又因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没有专业分工，劳动效率很低。七，失去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政治意义。八，打乱了机关秩序，妨碍了日常工作。九，在劳动果实的分配上，苦乐不均，矛盾很多，而且容易使干部只顾小集体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十，有人利用机关生产之名，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许多来信建议中央采取措施，对机关生产进行整顿。

〔2〕 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发表霍查演讲摘要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

同意。退吴冷西同志办。如果来得及，即在明日见报。[2]

刘少奇

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1059期上。该期材料刊登了《霍查在地拉那向选民发表演说（摘要）》一文。六月七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在材料上批示："小平同志：定一、康生同志都认为霍查演讲摘要可以发表。影射的地方已用红笔划出。请审阅。"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霍查，指恩维尔·霍查，当时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在材料上批示："请少奇同志核定。我看发表一下有好处。"

〔2〕 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霍查在地拉那会见选民时发表的讲话（摘要）》。

对《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对外贸易收购工作的通知》稿的修改[1]

（一九六二年六月）

各地在调整工业生产、压缩城市人口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保证外贸物资的生产，不得有任何缩减。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对外贸易收购工作的通知》稿上加写的文字。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295号文件下发这个通知。

对《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六月）

一

只有一个头到农村去收购。禁止各地方、机关、企业经营商业。协作一律经过商业部、物资局。[2]

二

地方的商业机构，供销社，有全国领导。[3]

三

分散主义主要表现在经济措施与经济政策上。[4]

四

制止通货继续膨胀，并略有好转。有利与投机商斗争。[5]

五

农业生产资料纳入换购。[6]

六

农村高价出售工业品的价格可以控制。[7]

七

困难时的某种平均主义。[8]

八

不受中央领导的地方商业部？[9]

九

按工资发购货券？[10]

十

市场价格同通货流通量是适应的。

社会主义商业一定要去占领农村和城市的自由市场。部分地高对高，以平衡通货通流〈流通〉量。要分出一部分工业品到农村高价出售。在市城〈城市〉提高一部分小商品价格。实际压低工农生活，但避免了投机商剥削，有东西买，还是保障了工农生活。国务院命令加党内提示，

规定商业体制，加强经济纪律。

党委加强对商业领导，团、工会等参加。准备下乡收购农产品。加强商业干部。

粮产区现金少，如何办？

高对高价格——农产品、工业品。

大队为虚级。

学习做生意办工厂。[11]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上的批语。《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反映了近两年全国市场物价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克服市场物价混乱情况的几种设想以及在商业工作上采取的几项重要措施，强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并认为目前的经济情况不可能立即出现胜利的转折点，必须谨慎小心，逐步充实商品库存，回笼多余货币，通过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有力措施，加速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该文件后经修改，形成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草稿）。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392号文件下发关于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报告（草稿）”的通知，并在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准备提交在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立即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并将你们的意见随时报告中央，以便中央在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

〔2〕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许多地区为着避免亏损，自订地方工业产品的'临时价格'，比国营工业的同类产品高得很多。有些企业把不合格的产品自己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甚至为着避免亏损，故意少生产合格产品，使产品的质量显著下降。有些企业把国家统一调配的产品，私自拿出去同其它企业（或者农村人民公社）搞'协作'，变相地进行自产自销。这些情况，必然造成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许多纠纷，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混乱现象。"

〔3〕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比价格混乱更加严重的是，各地区'划地为牢'，互相封锁，阻碍各种物资的正常的交流。最近几年，任何一个省、县都可以禁止各种农产品、轻工业品、手工业品出境，可以各自规定农产品的换购办法，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办法，并各自发行只能在本地使用的各种票证，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事实上已被分割，历史上的地区间的协作关系已被切断。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商品的合理分配。这是目前经济上的分散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事实告诉我们，为着彻底克服经济上的分散主义，仅仅加强财政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不够的，今后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全国商业工作和物资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

〔4〕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下方。这段话见本篇注释〔3〕所引的文字。

〔5〕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目前我们的价格政策，需要（1）有利于生产的发展；（2）有利于安定人民的生活，并在条件可能时候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有利于消灭社会购买

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逆差，并争取有一定数量的顺差，以保证实现财政信贷‘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因此，在今后一二年国民经济的大幅度调整中，物价不宜有过分大的波动，否则就将加剧经济生活的混乱现象，特别是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安定人民生活也将有不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物价完全冻结起来。所以，从现状出发逐步进行调整，可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6〕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为着全面展开换购工作，今年准备从单项换购（奖售）逐步地向综合换购过渡。推行综合换购制度会遇到两个困难，一个是我们可能用于换购的商品量，小于我们对第一二类农产品的必要的收购量。据商业部估计，我们必须收购的第一二类农产品有150亿元，而我们可能用于换购的商品大约只有100—120亿元，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等）要用作定量供应。定量供应的数量愈大，可以用于换购的数量就愈小。为着缩小收购产品同换购产品之间的差额，一方面必须适当缩小第一二类农产品的范围，对第三类农产品一律由供销合作社议价收购，不准用实物去换购；另一方面，有必要压缩定量供应商品的供应面，一般农民和自销产品的其它小生产者原则上都只能取消定量供应，改用换货的办法来适当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对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在扩大换购以后，也可以取消或减少粮食的定量供应。”

〔7〕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控制自由市场的比较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供销合作社在自由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制止商人和农民的投机活动。供销合作社一方面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第三类农产品和派购部分以外的第二类农产品，另一方面以较高的价格向农

村销售定量供应和配售部分以外的工业品，原则上也是等价交换，这样就可以防止更多的货币通过不等价交换而流向农村。为着进一步压缩农村货币流通量，除严格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外，在货币特别多的农村，还可以增加一些高价商品，以增加货币的回笼。供销合作社在用高价收购第三类农产品的时候，必须防止因此而妨碍第一二类农产品的低价收购。”

〔8〕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为着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最近许多城市开始试行按工资比例发购货券的办法。凭购货券供应和高价敞开供应的商品，可以自由选购，而且可以防止抢购和脱销，看来是比较好的办法。当然，在供应的具体方法上，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改进。在购货券制度行有成效以后，可以考虑逐步减少凭票证供应的商品，改凭购货券来供应。这样我们就可以适当扩大自由选购的范围，市场供应的手续也可以比较简单一点。”

〔9〕 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在中央商业部门和地方商业部门的关系方面，应当加强集中统一，大体上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情况。我们初步设想，国营商业所掌握的商品，应当有80%以上由中央商业部门掌握，在全国范围有计划地进行统筹调配。在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央掌握的比例应当更大一点。”

〔10〕这个批语写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中的一段话旁。这段话是：“为着保证全国商品的统一分配，可以考虑有步骤地发行全国统一的、城乡通用的购货券，取消各地区自己发行购货券的权力。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购货券，农民按出售第一二类农产品的一定的比例发给购货券。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出售的重要商品，除按价收取人民币外，并按统一

规定收取一定数量的购货券；粮食、棉布、食油等特别重要的商品，仍须凭票定量供应；一般商品只收人民币，不收购货券。”

〔11〕这个批语写在另一空白页上，附在《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初步研究（草稿）》后。

对反映农民搞单干问题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六月）

伯达[2]同志：

此件不知何人所写？可添上名字，印发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一阅。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各地书面材料摘录的《一些农民群众要搞单干的一个重要原因：队的干部太多，工分补贴太多》的材料上。材料说：干部多，工分补贴多，已经成为一些群众要搞单干的重要原因之一。干部太多，有的队合两户多补贴一人；补贴量大，许多地区干部补贴工分大大超过规定，有的竟达工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许多大、小队干部除了多拿工分报酬和补贴外，还要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克扣国家发给社员的救济和奖售物资；上级机关和业务部门把许多不应当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繁琐事务都要大、小队干部去办，许多生产队也设立各种业务组织，组织机构多，需要的干部就多。这么多干部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弄数字，办杂事，甚至一个生产队长兼管杂事多达三十二项。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接受蒙古新任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递交国书时的答词[1]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刘少奇主席在致答词时感谢大使的祝贺，并赞扬了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刘主席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主席说，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一向友好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谊。1960 年 5 月签订的中蒙友好互助条约[2]是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中蒙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敦道格·策伯格米德递交国书时致答词的新闻报道。

〔2〕　周恩来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一日应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的邀请，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中、蒙两国政府于乌兰巴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上签字。十月十二日，中蒙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条约即日起生效。该条约共五条，全文于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祝贺加纳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先生阁下：

欣逢加纳共和国国庆[1]，我们谨向阁下、加纳人民和加纳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阁下去年8月对我国的友好访问[2]和中国加纳友好条约的签订[3]，是中加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深信：中加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各自的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起，互相支持，携手共进。

祝加纳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6月29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加纳脱离英联邦，正式宣告成立

“加纳共和国”。

〔2〕 恩克鲁玛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

〔3〕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恩克鲁玛分别代表中国、加纳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加两国政府代表在阿克拉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条约立即生效。

对石家庄市委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几点意见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

恩来、尚昆[2]同志：

这是中央办公厅派到石家庄工作组和石市委拟出的办法。我看是好的。请中央精减小组加以讨论，是否可以酌加修改后发给其他各地参考。

刘少奇

七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石家庄市委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几点意见上。意见规定：精简职工本着既能节约国家开支，又尽量满足职工合理要求的精神，采取广开门路的办法，积极妥善地安置。初步意见是：（一）精简对象的重点，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的职工（包括干部和工人），除矿山井下工人、石油采掘工人、有色金属工人、部分林业工人等以外，原则上一律精简回农村。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的干部和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参加工作的职工，凡有条件还乡的，尽量动员还乡参加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采取多种办法安置。一九四

九年建国以前的干部和一九五一年以前参加工作连续工龄十年以上的职工，原则上不列为精简对象，本人自愿申请退职还乡的，一律批准。（二）对被精简工人的安置办法。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被精简者若农村无家可归或久居城市，采取投亲靠友、有组织有领导地参加农业生产、从事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等三种办法安置。一九五七年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还可采取以下办法：一是“保留厂籍”，定期发放生活补助费，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二是停发工资，保持工龄，长期放假，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三是有组织有领导地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三）对被精简干部的安置，总的精神应从加强农业战线和压缩城市人口出发，有条件的尽量动员还乡，处理办法可以多种多样，主要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停薪留职，还乡生产；二是保持工龄，长期放假，还乡生产；三是调剂顶替，就地安置；四是下放农场、畜牧场参加劳动；五是就地下放，储备一批干部；六是选拔一批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有一定工作能力、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根据本人具体情况，作为骨干充实到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和财贸部门工作。（四）关于退职还乡问题。凡是自愿申请退职还乡的职工，不论参加工作年限长短，不论职务、级别高低，应一律批准，并按照国务院关于退职办法的规定，发给本人退职补助费。

〔2〕 恩来，即周恩来。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祝贺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本·优素福·本·赫达先生阁下：

在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庄严宣告独立[1]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阁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当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事件。这一事件证明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非洲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是可以击败的。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所树立的光辉典范必将推动非洲的民族独立斗争进一步高涨。

祝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以及继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胜利。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3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自决公民投票结束。七月三日，投票结果全部揭晓，99.73%的有效选票赞成独立。同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发表一项特别文告，宣布："法兰西庄严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阿尔及利亚第一届制宪国民议会宣布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关于约请刘建勋等来京谈农村工作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二年七月）

七月九号下午三时半

请刘建勋、耿其昌[1]来京谈农村工作问题。[2]

七月十号下午三时半

请谭启龙[3]来京谈农村工作问题。[4]

七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

请江西管农村工作同志刘俊秀[5]来京谈农村工作问题。

以上请杨尚昆[6]同志通知。谈话时请周总理和小平[7]同志参加。周邓如要单独谈，也可以。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建勋，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当时任中共新乡地委书记。

〔2〕 参见本书《对刘建勋等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七月）。

〔3〕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

第一书记兼省长。

〔4〕 参见本书《对谭启龙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七月）。

〔5〕 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6〕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7〕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刘建勋等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七月）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向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农村情况时的谈话摘要上。刘少奇对这个摘要做了修改。在听取汇报时，刘少奇多次插话。在谈到口粮分配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但存在对困难户照顾不够的问题时，刘少奇说：“同时也要向劳动力强的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在合作化以前，困难户有几亩地也可以过得去，生产队对他们加以照顾，是完全应该的。要两面说服。”在谈到恢复田间管理地段责任制问题时，刘少奇说：“这个制度是好的。是否可以再改进一下，如何提高社员经营大田的积极性，家肥也肯用到大田里。要使社员对经营大田和经营自留地差不多，就需要使社员得到好处，肥料下在大田里比下到自留地里合算。不然，大田不使劲，光在坏地、荒地上下工夫，对集体经济是不

利的。能否研究一个办法，超产奖励联系产量，包产以内的集体分配，超产部分，大活多分些，小活少分些，这不叫包产到户，也不叫单干。可以进一步试验如何超产奖励联系产量，而又能巩固集体经济的办法。”

对谭启龙汇报农村情况谈话摘要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七月）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谭启龙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向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农村情况时的谈话摘要上。刘少奇对这个摘要做了修改。在听取汇报时，刘少奇多次插话。在谈到生产队的一类物资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进入自由市场，国家可由供销社同生产队议价，收购一部分，实行两个市场、三种价格的问题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提出了意见，认为：两种价格距离那么大，议价怎么个议法，与其他产品的价格有什么联系，问题很复杂。国家靠议价收购一百亿斤粮食，就要增发一百亿元的票子，是个大问题。看来，议价不能搞；粮食征购任务需要减少一些，但不能太少；供销社要参加粮食市场，要派得力干部把供销社工作搞好；出口的猪、禽、蛋、茶叶等靠商品基地的办法解决，内销靠供销社去搞。在谈到养猪办法问题时，

谭启龙说：办法主要靠三条，一靠户养；二是每养一头猪，给两三分饲料地；三是国家收购时，给留全部油和一半肉。刘少奇说："给了饲料地，收购猪肉等于交税，问题在于税的轻重，是三分之一，还是一半？税轻了农民高兴养；税重了，农民就不养了。"在谈到单干、包产到户问题时，刘少奇说："对这些困难地区要有个态度。像河南提出的，在这类地区实行自由结合组成小规模的生产队，是个好方式。包产到户的，是否也可以留下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集体部分，大家凭政治觉悟把它经营好？"

对中央政法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小平[2]同志：

此件我看过一遍，觉得还可以，请书记处审核处理。[3]

刘少奇

七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一日为送审中央政法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三稿）给刘少奇的请示上。该报告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四年工作的估计；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处理方法；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政策；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令，逐步制订迫切需要的法律，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确实保证社会的治安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二日在中央政法小组总结报告（三稿）上批示：“尚昆同志：请印提书记处会议，并告彭真同志好好看看。”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中央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若干地委的负责同志参加。在会议上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现在就这四个主要议程提出一批问题，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找若干重要地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加以讨论，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意见，以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

（发至部委党组，省市区党委）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

附一批问题如下：

（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你们认为，在实行六十条[3]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中还有些什么

问题？

二、你们认为，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巩固集体经济，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快一些？

你们认为，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办法，是否可以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将引起何种后果？

三、按照各地方的土地情况，经过集体讨论，发给农民适当数量的饲料地，以便发展养猪业，使集体经济能够得到肥料，城乡居民都有肉吃，农民本身也有利益。你们认为，这种措施能否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

在淮河以北地区，发给耕畜适当数量的饲料地，将耕畜包给农户饲养，你们认为，这种措施是否可以保护和发展耕畜？

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再增加农民一部分自留地？农民自留地和大牲畜饲料地合起来，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几比较合适？

四、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在长时间内固定在一定的数额上，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有很重大的作用。你们认为，定在哪个数额上比较好？

五、在集体经济中，要采取什么办法加强责任制，把评工记分搞好，既照顾出工的数量，又照顾农活的质量，鼓励精耕细作，使工作质量好的得到较高的报酬，例如超产奖励，等等？

六、公社干部只留三、五个人，大队一级只留一个人，由国家发给工资或必要的补贴，不要由生产队补贴工

分；公社和大队目前都不要经营任何企业；你们认为，这些办法，是否妥当？

七、公社、大队都不要搞机动粮。你们以为如何？

八、采取什么办法，保证实行民主办社，实行财政公开（工分、粮食、资金公开），实行勤俭办社，克服干部多吃多占、特殊化和独断专行的作风？

九、采取什么措施，使粮食和经济作物能够同时按比例恢复和发展？

十、山林的所有权，如何确定为好？

十一、生产队的口粮分配，采取哪种办法比较合适？

十二、困难户有哪几种情况？你们认为，应当在生产上、分配上采取什么办法，照顾困难户，保障困难户最必需的生活？如何发挥困难户在生产上的积极性，例如养猪？

十三、在那些现在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单干的地方，你们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你们那里，有没有因为破坏严重、干部作风不好、集体经济搞得不好、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你们认为，对这类生产队应当采取什么对策？

（二）粮食问题

一、粮食征购，是否少购一点，少销一点，收（包括进口）大于支？

二、是否适当减少购粮，增加公粮征收？

三、自留地可否征收农业税，只征不购？

四、除开城市减人以外，农村是否可以大大减少吃商

品粮的人口？对农村一般缺粮户是否可以基本不销售粮食，对灾区适当救济？

五、如何根据可能，逐步增加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使经济作物不再下降，并且逐步恢复和发展？

六、是否开放粮食自由市场，调剂余缺？

七、对国家征购得来的粮食，是否可以实行从上到下的统一集中管理，而不由各级地方包干？

（三）市场物价和商业中的工作问题

一、是否可以适当缩小对农产品统购和派购的范围？

二、是否可以适当增加对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换购物资？

三、是否可以分门别类，在农村提高一部分工业品的价格？是否恢复工业品和农业品的地区差价，恢复农产品的季节差价？

四、供销合作社如何开展经营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自营业务？

五、是否承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两个市场，两个价格，高对高，低对低？

六、如何打破目前各地严重存在的地区间的“划地为牢”，层层封锁，使我国有社会主义的统一国内市场？

七、如何进一步加强商业工作中的集中统一管理？

1. 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商品的统一调拨和统一分配？

2. 是否全国统一规定城市主要消费品的定量供应标准，统一规定农产品的换购标准？

3. 如何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商品分配合理，改

变目前某些苦乐不均的现象？

4. 产地集中的出口物资是否可以划定出口物资基地，由对外贸易部协同有关商业部门进行收购，换购标准可以适当从高？

5. 是否可以改变目前实行的各地区间的工业品差额调拨制度（只定调出调入指标），实行工业品的统一调拨？

6. 供销合作社是否按集镇建社，不按公社建社？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是否按经济区划设立批发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批发机构？城市商业是否以市为单位按行业建立专业公司，分行业管理，改变目前分区管理的办法（分散的零星的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小菜铺、小饭铺、夫妻老婆店等等，仍分区管理）？

7. 是否把目前中央各部分管的市场商品（如水产品、中药材、木材等），除了粮、油、书、报、杂志等商品以外，都分别划归中央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统一管理？

8. 是否对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产品，一律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产品，可否大部分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一部分自产自销？

9. 可否考虑大中城市有领导地开放集市贸易？

10. 可否考虑恢复耕畜的市场交易？

（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

一、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根据当前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你们认为，国家应当采取哪些在当地切实有效的、为农民所欢迎

的措施，来支援农业？

二、中央认为，计划工作部门，经济工作部门，各重工业部门，各轻工业部门，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还有文教、科学部门，这一切部门制定的计划和采取的措施，都要肯定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集中全力，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你们觉得应当怎样做？

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应当怎样适应农业的需要，改变那种重工业为重工业的状态，在生产上实行必要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打算怎样做？

三、化肥工业的建设，化肥的生产、分配、使用，你们认为怎样才最有效？

四、你们认为，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迅速地解决农村需要的车、船和其他竹、木农具？你们自己能够解决什么？

五、在你们那个地区，最迫切需要哪种农业机械？你们现在能够解决什么？在使用和维修现有的农业机械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六、你们认为，从全国看，拖拉机怎样合理的集中的使用，怎样解决管理的问题？

在你们那个地区，你们认为今后生产哪种型号的拖拉机和机引农具比较合适？

七、在你们那里，发展什么样的水利最为农民所欢迎，见效最快？在打井、排灌等方面，需要哪一类的水利机械？你们自己能够制造什么？

八、在你们那里，你们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才能够有效地、较快地治理盐碱地？在这方面，你们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以外，还要求国家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九、在你们那里，农民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是些什么？你们自己能够供应什么，需要国家供应的是什么？

为适应农民在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各轻工业部门准备怎样安排生产？各重工业部门准备怎样为轻工业多提供原料、材料？

十、地方工业现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情况怎样？今后准备怎样办？

十一、为了使手工业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各地方的手工业合作社需要国家什么帮助？

十二、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国家物资分配部门和商业部门应当怎样改进目前物资供应和商品供应的办法？各地方认为，采取什么办法比较好？

十三、财政、金融部门，在政策上、办法上，应当怎样合理地、有效地支援农业？

供应农业的生产资料，不采取赚钱的办法，一般地应当低价销售，在必要时，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你们认为怎样？

十四、由国家经营的拖拉机站和排灌机械站，如何搞好经营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轻农民负担？

十五、各地方对于文教、科学部门，在发展农业技术方面，有些什么要求？文教、科学部门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打算？

十六、各地方对于中央农业部门有些什么要求？农业部门为促进农业的发展要做些什么事情？

十七、在你们那里，从城市能够动员多少车马回农村？

十八、各地方在清仓中，有哪些生产资料可以供应农村，有哪些生活资料可以换购农副产品？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仿宋体字排印的是周恩来加写的文字。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379号文件下发这个通知。

〔2〕 指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开始十多天分小组讨论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会议期间，毛泽东着重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强调我们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这次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

〔3〕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并对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社员、干部、监察组织、党组织的组成、职责、权利等做了明确规定。

对无锡市传达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宣传要点情况报告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七月）

小平[2]同志：

此事请中央书记处加以督促。[3]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无锡工作组董晨、王愈明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就无锡市传达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宣传要点的情况给李富春、杨尚昆并刘少奇的报告上。报告反映：无锡市在传达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央文件迟迟未与群众见面；二是除三个市委负责同志和某厂党委外，再无其他市委负责同志和其他单位向群众做报告进行宣传；三是在布置宣传工作时遇到不少阻力，思想顾虑很多，怕引起群众思想混乱，不想也不敢原原本本向群众讲解宣传要点。造成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值得重视的是，江苏除三个城市外，大多数城市都和无锡情况一样，至今未将宣

传要点和群众见面。我们建议中央：（一）指示各地一定要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向群众讲解宣传要点；（二）重申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向群众讲解，同群众座谈，并解答群众的问题；（三）及时转发一些向群众讲解宣传要点的好经验。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七月十日，李富春在报告上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值得注意，是否向各省打招呼？"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在董晨、王愈明报告上批示："请尚昆据此报告，拟通知加以督促。"

中央关于讨论《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现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并找若干地委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应该让各同志敞开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可以提出赞成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望你们在七月廿五日以前将你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　　央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通知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印发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

案)》上。中央通知和决定（草案）由中共中央以中发〔62〕389号文件下发。这个草案后经修改，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经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哈瓦那

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总统同志，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总理同志：

欣逢古巴人民武装起义[1]九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古巴人民和古巴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具有深刻的、伟大的世界意义。它不仅为古巴人民赢得了独立、民主和自由，而且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树立了革命斗争的光辉榜样，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今年2月古巴第二次全国人民大会庄严通过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2]，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战斗、争取解放指出了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干涉政策继续进行坚决

的斗争，胜利地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并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古巴人民又进一步把古巴革命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伟大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相互支持、并肩前进。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节节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25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武装起义，袭击位于古巴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的蒙卡达兵营。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一天，被定为古巴“七·二六”全国起义纪念日。

〔2〕 这个宣言由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提出，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二次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宣言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剥削和侵略，号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直到取得真正的独立。

关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袭的慰问电

（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先生阁下：

惊悉阁下突遭歹徒袭击[1]，庆幸无恙，谨致以亲切的慰问。

我们深信，在阁下的领导下，加纳人民将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斗争到底。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4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晚，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乘车经过加纳北部库伦古古村时，遭遇炸弹袭击。

关于暂不付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日）

康生、定一、伯达、邓力群[2]同志：

此件[3]暂时不要印单行本，因为读者还可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待再次修改后付印。[4]

退中宣部。

刘少奇

10/8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给中央并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已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现将这本书的出版和翻译问题报告于后：（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版本分普及本、平装本两种，准备一共先印五十万册，以后如有需要再适当增印，其中绝大部分印普及本。（二）翻译文本拟先出英、法、西班牙和阿拉伯文四种。请外事办公室负责会同有关单位办理此事。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

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3〕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4〕 一九六二年九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刘少奇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兼总理苏加诺阁下：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1]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贵国人民和贵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和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种友谊，并且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日益发展和加强，从而对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亚非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为收复自己的领土西伊里安[4]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在总统阁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加强团

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5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苏加诺和哈达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担任第一任总统。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

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祝贺中国加纳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阁下：

在此中加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时候[1]，我们谨向加纳共和国政府和加纳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加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是中加友好关系的里程碑，而且标志着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友谊的重大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我们深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的指导下，中加两国的团结友好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从而为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祝加纳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加友谊万古长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7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加纳共和国总统兼政府首脑克瓦米·恩克鲁玛访问中国。八月十八日，周恩来与恩克鲁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加两国政府代表在阿克拉互换友好条约批准书，条约立即生效。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

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对中办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桥西公社社办工业调查报告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此件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加发华北局、河北省委、全总各一份。

刘少奇

八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石家庄市桥西人民公社社办工业调查报告上。该报告说：石家庄市桥西公社是该市的老区，至一九六一年底共有社（区）属工业企业四十一个，占全市公社工业企业的百分之五十；公社下属十个街道分社，共有工业企业六十个，占全市分社工业企业的百分之五十二；另有一九六一年由区属企业转回手工业合作社的企业十三个。这些社办工业是有一定成绩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一）盲目大办，没有明确方针。（二）化大公为小公，分散、浪费国家资金；粗制滥造产品，向国家赚取利润；又因滥行开支，再一次浪费国家资材。（三）技术低劣，设备落后，生产效率很低，产品质次价高。（四）把分散生产的手工业合

作社、组转为集中生产的公社工厂后，产品品种减少，管理人员增多，管理费用增加。（五）一些公社企业进行投机倒把与自由市场结合，分社办的企业尤其突出。（六）工厂建得过多过快，管理干部很乱很弱。工作组对这些社办工业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社办工业已成为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助长分散主义；分散国家财产，浪费社会物资；腐蚀干部，隐藏坏人的场所。因此，不应再办下去。经过彻底调整、整顿，好的可以保留，将之转为市营企业、合作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分社不再经营工业。（二）今后城市人民公社，可以举办和经营一些社会服务事业。把适合于家庭和个人进行的或集体经营的社会服务事业，在有利于人民生活、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原则下，加以适当的组织领导。（三）在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应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事情应办、能办，什么事情不应办、不能办；什么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应该发扬什么，反对什么。通过整顿，使广大干部受到应有的教益。至于那些个别的严重贪污、违法分子，则应予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理。

对国家经委、计委关于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大力开展木材节约代用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二年九月）

一

谭[2]再阅。有一点增改。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抚育和间伐次生林。全国国有次生林区林地面积约有两亿亩，交通比较方便可能进行抚育的林场约三百多个。应当进行调查设计，设立机构管理，对这些条件较好的林场，必须组织抚育和间伐，这样不仅能大大加速林木的生长，而且还可以回收一部分木材和烧柴。这项工作，请林业部召集各省研究后提出具体规划。

三

要严格控制木制家具的生产。从现在起，将关、并的楼、堂、馆、所和机关清仓多余的家具，凡适合城乡人民需要的，均可拿出供应市场，由各级木材公司和各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规划，并由木材公司负责经营。以后制造家具，应尽可能用玻璃、石板、塑料及钢材等代替木材，节约木材使用。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刘少奇对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关于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大力开展木材节约代用工作报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刘少奇对该报告两段内容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同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62〕477号文件转发上述报告，并在转发批语中指出："解决木材的供需矛盾，这是要扎扎实实地长期地一项一项抓的'笨'工作"，"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和节约代用木材的工作不能看作是临时的措施，应该当作长期的经常的工作去做。各有关部门、各地方都应该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有限的木材发挥更大的效用，办更多的事。""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认真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完成这一工作。"

〔2〕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者决心进一步同美帝勾结》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九月）

同意发表。邓、彭[2]阅后退吴冷西同志。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者决心进一步同美帝勾结》上。这篇社论后经修改，以《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何等地步》为题，于同年九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

（一九六二年九月）

赞成主席24日[2]和以前几次讲话。

赞成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决定，六十条，商业工作决定。主要干部交流、加强监察委员会决定。[3]

个别文字修改意见另提。

我们党在革命胜利前，是经过许多困难时期的。但是在革命后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发展的，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困难。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由于天灾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受到比较大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苏联在胜利后所遇到的几次困难，要小得多。战后的困难，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困难、第二次大战的困难。他们坚持社会主义。

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要花代价的；取得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胜利，也是要花一些代价的。一般是合规律的，虽然力求少花些代价。

在困难面前：

一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大

多数。

一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

一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

只有第一种态度才是正确的。

第二种态度是错误的。单干没有出路。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过关。

六条政治标准[4]，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宣传单干优越，违背这两条。香花毒草标准。党去领导单干，党就变质。

困难多大？只有这样大，已经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已有好转。不要说得太好。工人下乡。

今年五月会议[5]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

如我们采取第一种态度，对困难多估计一点，害处不大。如采取第二第三种态度，对困难估计过多，就有很大害处。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光明前途。

农村集体经济绝大多数可以巩固下来。单干是风大，实际上除个别地区外是不多的。可以再组织起来。煞下这股风，为巩固集体经济多做些实际工作。按照决定，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种态度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党的困难幸灾乐祸。

翻案风，应煞下去，但是对那些应该平反的人，还是要平反。不该平反的，一定不能平反。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

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还要一个长时间才能解决。由于南、苏、东欧各国的经验，应吸取教训，提高警惕。以后还会有。要在党内加强教育，加强思想准备。

赫[6]的地位是不巩固的，不会有前途的。东欧各国不会完全一致。

各国党内左派正在形成。

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压不下亚非拉的革命，那里革命继续高涨。

世界形势很好，前途光明。我们担负重大的国际任务。

无条件地解散宗派。列宁说：公开的反对派解散。秘密的反党集团更不能容许，必须无条件解散。否则开除。[7]

与宗派决裂。揭露，不要怕见不得人。洗手不干，就好了。就信任。不揭露，不能信任。

马上准备明年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水利。

不对路的，质量不好的。

设计师、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

打井机、抽水机配套备份，综合利用。汽车、拖拉机生产。

马上搞明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九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见本

书《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本篇是刘少奇为此次讲话所写的提纲，内容略有删节。

〔2〕 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

〔3〕 这些文件分别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4〕 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第234页。

〔5〕 指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6〕 赫，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当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7〕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中这样表述："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见该书《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一文，第471—472页。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赞成主席二十四日在全会上的讲话[2]和以前的几次讲话；赞成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3]

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前，是经过许多困难时期的，在座的同志都经过了的。那个困难，真是困难得厉害。一个时候发展得很大，一个时候又垮下来，几乎要灭亡的样子。但是，那样的困难，我们都经受住了。那样困难的时期，我们留在党内的同志，都坚持了革命的方针。毛主席经常讲，在我们共产党里面，即使剩下一个人，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剩下一个人，发展一个人，不就变成两个人了吗？）再发展一个，就是三个。

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事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发展的。虽然遇到许多困难问题，但是，都顺利地克服了，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抗美援朝，打美国帝国主义要算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但是，我们也不大感觉困难。到了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由于天灾，也由

于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我们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比起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所遇到的几次困难，我看还是要小得多。我就是见证人之一。柯庆施[4]同志当时是当作外国代表招待的，看是看到了，可能还感觉不那末深。我们现在招待的国际代表，他们也不太感觉到我们的困难，例如，来我国参加乒乓球赛的人就不太感觉得到。

我看，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大体上是经过三次大困难。

第一次，是革命战争以后的困难。这是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

第二次，是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中间的困难。这是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这一次我赶上了，在那里住了一年。[5]那个时候，正是通货膨胀，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我是当国际代表去开职工国际五次大会的，所以，还有几包好烟。一到莫斯科，瞿秋白[6]同志看到了，他问我：你这个烟哪里来的呀？可不可以送我一包呀？送了他一些，简直是如获至宝。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的通货膨胀，吃、穿、用不够，比我们严重得多。见过这一次困难的人比较多，比如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那一批人就都见到了。我是个要抽烟的人，那时每次买烟，都要到他那个房屋管理处（房屋管理处的发音和“国民党”差不多，我们就叫它“国民党”）去签一个字。不是好烟，就是那个不好的烟，也要签一个字；买几包抽完了，又要去签字。我的俄国话不大好，每

次都要带翻译去，麻烦得很。那个时候我没有说句抱怨的话，但是跟我去的中国翻译却抱怨起来了，等到要找“国民党”去签字的时候，他就骂起来了。那个时候，到处讲闲话，人的脾气很大，马路上你碰我一下，就骂，就打，就动起脸色来。有一次两个中央委员跟我一道到索契去休养，我那个时候抽烟已经不困难了，拿个票可以到特殊商店去买。和我同去的一个中央委员，叫涅·克拉西维伊·包罗契，没有这种票，只好从集体农庄走后门买了两斤土烟叶子。我知道了，他说，可不要讲呀，让人家知道，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呀。那个时候农民自由出卖主要农产品是非法的。索契那个地方出葡萄，葡萄是不准自由卖的。给私人卖烟叶子也是非法的。此外，他们的工业化也是投资过多，战线过长，票子发得过多，通货膨胀。一个时候，因为通货膨胀，大家都把硬币收起来了，几天之内硬币哥比忽然没有了。有几个教主收集那个硬币，收集了很多，结果报纸上宣布枪毙。枪毙是枪毙，硬币还是没有。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业有很大的减产，牲口很大的降低，牛马杀了很多。农业生产是很长时期不能恢复，而且一九三二年再加上天灾，发生饥荒。他们也有不少人害浮肿病，死了不少人。

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次我没有碰到。我一九四九年才去，那个时候已经是恢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很困难，到百货商店一看，有东西卖，但是抢购。

革命胜利以前，他们经过的困难可以说没有我们这么多；胜利以后，他们经过的困难比我们多，比我们大，时

间比较长。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没有动摇。

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要花一些代价的。因为要打仗，就难免牺牲一些人，生产就要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要降低。取得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也是要花一些代价的。一般地说，这是合乎规律的。虽然我们力求少花一些代价，但是要花一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生产要有一些降低，要有一些破坏，人民吃些苦，吃、穿、用不那么够，甚至会死一些人，这是合乎规律的。在外国，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也要降低，苏联是这样，东欧各国也是这样，而我们的土地改革却没有降低生产。

我们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我们革命胜利以后头一次遇到的困难。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种困难面前采取什么态度。我看，有这么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这也是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也是我们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态度，是我们多次确定了的态度。

第二种态度，就是在困难面前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回倒退，回到单干。他们在困难面前，对社会主义道路动摇了，甚至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了。还有一些同志，包括个别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向中央写信，正式提出建议，要求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主张

单干。

第三种态度，就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领导。

我看，第二种态度跟第三种态度要区别一下。第二种态度是一种动摇，他们在困难面前丧失前途，丧失信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所遇到的困难小，但是他们在困难面前动摇了。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敌对性的态度，是敌对阶级的态度。这是一种最坏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高兴我们有这些困难，甚至认为困难太小了，希望困难更大一点才好。他们要利用我们的困难，以便于向党发起进攻。

在这次困难面前，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对我们所有的党员，对广大群众，对民主党派，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中，我们必须坚持第一种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即使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深刻了解：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才能使农业过关。我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就向农民宣传过这样的道理。那时我们向农民说，现在你们分了土地，但是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你们还不能免于贫困，要最后免于贫困，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农业来说，就是要搞集体化的农业，要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是我们不能采取、不可以采取的。

毛主席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六条政治标准[7]，并且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党的领导。宣传单干的优越性，就是违背了六条政治标准中间最重要的这两条。宣传单干的优越性，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呢？应该说不是香花，而是毒草。如果党去领导单干，如果中央委员会去领导单干，我看，我们党就要变质，就不是共产党了。

现在我们受到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我看就是这样大，大家都经过了，如此而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情况已经有好转。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在宣传上，特别是向工人宣传，以致向农民宣传，也不要说得太好了。如果宣传得太好了，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很快改善生活，这在目前条件下还是做不到的。我们还要向他们讲，现在还是有困难的，改善生活要慢慢来。公报[8]对于形势的估计也要注意这一点。要使大家了解，还是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到下面宣传的时候，特别是向工人宣传的时候，不能讲得太好了，只是说，有好转。一股风，好了，精减也不精减了，下乡也不下乡了，有点东西都把它吃掉，要普遍增加工资，这就不好了，不要走到那个偏向。

今年五月会议[9]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如果我们对困难是采取第一种态度，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坏处是不大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在精神上对困

难准备得多一些，可以使我们更有准备地去克服困难。但是，采取第二种态度、第三种态度，对困难估计得过多了，那就有很大的害处，就要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光明前途，以致乘机向党发起进攻。

现在看来，农村集体经济绝大多数可以巩固下来。单干的风大，但是实际上单干的并不多。就是单干比较多的个别地区，四川也有个专区，那些地方还是可以再组织起来。首先是组织那些愿意组织起来的，不愿意组织起来的，就不要去勉强。不要一股风又来了，一股风又散了。放手让他们考虑一下有好处。把那个愿意组织起来的人，下决心组织起来的人，先组织起来。可能现在这些散得很多的地方，将来组织起来比别的地方更巩固。对有一些人，时间还可以更长一点。单干的风要杀下去。为了巩固集体经济，要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按照我们这一次的决定，是有很多实际工作要做的。各个地方应该抓紧这些工作，去做好。没有散的一定要抓紧这些工作，好好地做好，这样才可以巩固下来。

利用党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那一种态度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他们不是我们犯了错误不好过，而是我们犯了错误才舒服。他们认为，我们的错误犯小了，最好犯得更大一点。他们对于党的困难是幸灾乐祸的。

我们的工作不要受他们干扰，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们只组织两个委员会，用少数人去对付他们就够了。是不是对付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也组织少数人去对付

他们？大多数人，我看还是我行我素，去搞工作，搞社会主义，搞多快好省，努力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至于讲要全党干部进行教育，讨论一下，花点时间，那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全党卷入这个斗争。全党卷进来，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划不来。

毛主席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文章上，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毛主席是这样讲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0]在我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是最后真正解决了？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他就说，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在国内，已经最后解决了，只是国际范围内还没有解决。我看，那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不是证明不正确吗？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在上面引的这段话后面又讲：“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1]

恐怕这个“相当”，就很长了。在这里，毛主席讲的跟斯大林讲的也不一样。哪一个对呢？现在证明，毛主席这个讲法对，斯大林讲的是不对的，他这种讲法，麻痹了自己。在政治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在经济工作方面，无产阶级最后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问题的最后解决，我看那是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证明这一点。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的经验，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

鉴于南斯拉夫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党应该很好地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性，经常记住，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恢复资本主义这种事情以后还会有。所以，要在党内加强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以便于抵制那些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各种各色的思想。我们得准备资产阶级复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来最后解决这个谁胜谁负的问题。那是国际和国内都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

在二次大战以后我们曾经估计，帝国主义可以腾出手来，压迫各国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非、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现在看来，压不下去。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在继续高涨。有许多国家取得胜利。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前途光明。六亿五千万人，在东方革命胜利了，这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国际修正主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慢慢地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复辟。所以，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重大的国际任务。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自觉。如果中国又来搞修正主义，那末资本主义世界就有可能相对稳定了。

关于党内的派别活动问题，列宁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党内的反对派要无条件地解散，不能继续活动，否则开除党籍。[12]列宁讲的那个时期的反对派，是公开的反对派，有纲领的，那个纲领不是假的，但是不守纪律，列宁说要无条件地解散，不然就要开除党籍。对于公开的反对派都是如此，那么，对于秘密的反对派、反党集团，我看是更加不允许。毛主席也讲过，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就是怕秘密的反对派。[13]当着面，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的纲领不拿出来的，拿出来的一套是假的。对这种反党集团，应该比列宁采取的那个政策还要更严格，决不能允许，这种反党集团应该是无条件地解散，否则开除党籍。参加这种反党集团的人要改正错误，就是要与这个派别绝〈决〉裂，首先要自己起来揭露，不要怕揭露自己干了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不要怕见不得人，面子不好看。揭露反党派别，把反党集团这些内幕揭露出来，跟他绝〈决〉裂，而且以后洗手不干了，那就好了，党也可以信任。因为他揭露了，绝〈决〉裂了，他洗手不干了，应该信任嘛。如果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揭露出来，跟反党集团绝〈决〉裂，洗手不干了，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工作，这样做，对党有帮助，我们就信任他。犯了错误不要紧，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要紧，讲出来就放下了，以后就好做人了。和反党集团不绝〈决〉裂，不揭露，是不能信任的。我们

大家都是有经验的，到底是真心是假心，那是骗不了人的。

关于工作问题，我不讲了，一波[14]同志讲了，富春[15]同志也讲了，其他许多同志也讲了。我想现在马上应该准备明年所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应该现在就着手布置生产。如果现在不布置，就迟了。去年有个经验，有些东西不对路，有些质量不好。以后，不对路的要搞对路，质量不好的要搞好。今年搞不好就没有理由了。我想，在这一方面应该花点力量。比如说打把锄头吧，手工业工人凭他的经验打出来的锄头质量很好，那么，我们的工程师、大机器工厂的设计师设计锄头，就应该吸收手工业的经验，使它的质量搞得更好。要教育这些设计师，不要把打一把锄头、镰刀那样的事情看轻了。设计师、工程师要亲自检查，认真吸收手工业的好经验，看手工业工人怎么搞的，用什么铁，用什么钢，什么型号，用一点心是可以搞好的。至于讲其他的农业机器，那就更需要了。我看设计师、工程师应该在这方面去做些工作。农村里面现在只有很少的机器，坏了就没有办法，不能修理，毛病又看不出，一下就坏了，就不会使用，要动员一些高级技术工人下乡去帮助。淮河以北的平原需要打井，应该有一种打井机。现在是用钻探机来打井，是不是可以专门搞一种打井机，比钻探机还好一点，或者还简单一点？是不是更可以改进？因为要打几百万个井，要几年。井打好以后，要安抽水机。一个机器不行，要有备份，要有两个机器，以便这个坏了，那个能够开动。既然有备份，就要综合利用，

既能抽水，又能发电，搞农产品加工，例如磨面等等。那个地方，有个机井，有机器，有备份，就可以成为一个农产品加工的中心。我们的汽车厂、拖拉机厂盖起来了，也能够制造汽车和拖拉机了，就是材料不够，生产得很少，长春汽车厂也不能发挥生产能力，洛阳拖拉机厂也不能发挥生产能力。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花本钱去搞，就是没有多搞它那个材料。应该使这些厂充分发挥作用。长春汽车厂是三万辆的能力，洛阳拖拉机厂是一万五千辆的能力，现在吃不饱。这些问题，我想不多讲。总而言之，有许多事情现在就要安排。在这个会议之后，马上就要搞明年的计划，以及第三个五年的计划，要抓紧这些工作。审查反党活动、反党派别，那些事情，由少数人去搞，我们相信这些人会搞好的。我们大家去搞工作，只要努力用心，也是会搞好的。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本篇是刘少奇九月二十六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略有删节。

〔2〕　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

〔3〕　这些文件分别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4〕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5〕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秋，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6〕 瞿秋白，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一九三〇年刘少奇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

〔7〕 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第234页。

〔8〕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全文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9〕 指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10〕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第230页。

〔11〕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第231页。

〔12〕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一文指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见该书第471—472页。

〔13〕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第307页。

〔14〕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15〕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祝贺本·贝拉就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

艾哈迈德·本·贝拉先生阁下：

欣闻阁下就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1]，请接受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以及我们个人对你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烈的、亲切的祝贺。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建立了伟大的业绩，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非洲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之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将会团结一致地在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建设祖国，继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侵略以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神圣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阿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兄弟友谊，必将在新的基础

上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祝阿尔及利亚国家富强，阿尔及利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9月29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府在阿尔及尔组成。制宪国民议会任命艾哈迈德·本·贝拉为政府总理。

关于合理开发西双版纳问题的批示[1]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

谭震林[2]同志：

此件请告有关机关和云南省委处理。

刘少奇

12/10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国家科委研究室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编印的《科学研究试验动态》增刊第7号上。该期动态刊载的《合理开发西双版纳》一文，摘录自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朱济凡的调查报告。文章说：西双版纳在发展橡胶生产上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自一九五六年在这个地区建立国营农场、发展橡胶以来，定植面积逐年扩大，割胶棵树日益增多，但在建场植胶时将成片森林砍光，为了粮食自给又大面积毁林开荒，破坏了森林环境，导致气候变热、变干，温差增加，土壤肥力下降。优越的自然条件遭到破坏，对橡胶树的生产已开始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这个地区需要对林地、农地和植胶地作出全面规划，把种植橡胶与保持热带森林环境的措施统一起来。植胶面积与森林面积，一般应维持十与三的比例。需要保留的森林，可根据防护效益和今后利用木材方便的原则来确定。尤其要注意保护水源林、护路林、

护岸林和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为解决粮食问题，可考虑利用平坝区荒地经营基本农田，专搞粮食，建立生产谷物的专业队或农场。西双版纳各县荒地面积不少，有可能利用现有人力，分区域实行粮食自给。胶粮间作要因地制宜，注意水土保持，避免与橡胶树争水夺肥。

〔2〕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给刘允若、刘涛的信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

毛毛、涛涛[1]：

最近报纸上有两篇文章[2]，你们可以看看。看后送允斌、爱琴、李妙秀[3]一阅，阅后退王光美[4]同志。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它的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剥削阶级以为善者，被剥削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你们发现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善恶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人们中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对于一切社会、政治现象，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

刘 少 奇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毛，指刘允若，刘少奇的儿子。涛涛，指刘涛，刘少

奇的女儿。

〔2〕 指《光明日报》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刊载的《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文汇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刊载的《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两篇文章。

〔3〕 允斌，即刘允斌，刘少奇的儿子。爱琴，即刘爱琴，刘少奇的女儿。李妙秀，刘允斌的妻子。

〔4〕 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

对《一家国营商店和一家合作商店的比较》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十月）

先念、依林[2]同志：

此篇可以看看。

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3422期上。该期刊登的《一家国营商店和一家合作商店的比较》一文说：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组最近在哈尔滨市国营集市副食品商店和合作第二商店进行调查，发现这两家商店卖钱总额差不多，但盈利却差一半多。国营商店的经营条件比合作商店要好得多，享受各方面的优待，但却没有合作商店办得好、营利多，原因是：（一）两店店员的技术熟练程度有很大不同。国营商店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占百分之二十九，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店员占百分之三十，而合作商店分别占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四十三。国营商店一类店员五名、二类四十八名、三类二十二名，而合作商店一类四十五名、二类七十名、三类四十三名。（二）两店拥有的脱产干部和服务人员数量有很大差别。国营

商店脱产干部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服务人员占百分之十二，而合作商店分别占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二点四。这同国营商店会议、表报多和分工细、角色多有关。（三）两店的商品损耗情况相差悬殊。国营商店商品损耗占销货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五、运费支出占卖钱总额的百分之十三，而合作商店仅分别占百分之零点二二和百分之四点三。（四）适当调整现行工资制度也很重要。合作商店从六月份起实行超额奖励办法，所有分店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店员服务态度也大有改善，最近又想改行超额利润分成的办法。国营商店也想搞，但因上级没批下来而未搞。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依林，即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中央批转石家庄市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问题报告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全总党组：

石家庄市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问题的报告[2]，反映了社办工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城市的区、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中，也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很值得注意。石家庄市委对于区、社办工业不宜继续办下去的分析，是正确的；提出的整顿意见，也是可行的。城市人民公社举办生产事业和街道工业，应当主要是搞好简单加工和各种修配服务事业，这类事业是有可靠市场的。至于有些社办工业，基础确实很好，产品也十分需要的，可以保留下来，适合于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个别的也可以由公社继续去办。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并请你们对各城市

区、社办工业和街道工业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切实加以整顿和处理。

中　　央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这个通知由中共中央以中发〔62〕539号文件下发，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刘少奇并在通知稿上批示："周、朱、邓、彭阅后发。"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中共石家庄市委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社办工业问题的报告说：在两三年内，石家庄城市人民公社迅速办起了很多社办工业，有相当成绩，但存在以下几个根本问题：（一）公社工业存在盲目性，不能或极不易纳入国家计划，不少单位与自由市场结合进行投机倒把，冲击计划经济。（二）化"大公"为"小公"，分散、浪费国家财力物力。（三）社办工业易于使某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受到腐蚀，任意挥霍，滋长特殊化作风。（四）盲目由社转厂，搬用国营工业大生产的一套管理办法去管理手工业，不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城市人民公社不宜继续办工业，现正按照中央和省、地委有关调整国民经济、缩短工业战线的指示精神，对公社工业进行全面调整和整顿工作：（一）调整公社工业的基本原则，应是根

据“全国一盘棋”和地方工业为农业、为人民生活、为国营大工业、为出口服务的方针。生产条件好、经济指标比较先进、产供销问题能解决的企业，改为地方国营，按产品归口，交由市主管工业局直接经营管理；原是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公社工业或者是公社新办企业，其产品为社会需要而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企业，均可转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合作工厂；对那些社会很需要且是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不需要或需要很少原材料供应，技术不高，从事简单加工、修配和服务事业，可以保留，改为实行事业企业单位集体所有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仍试由公社组织领导。除以上三种情况外，其他单位一律关闭。（二）在调整中，财产处理应该“谁的财产归谁所有”，并结合调整公社工业进行彻底清算。原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来的社员个人投资等均为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财产，应清理退还；停关的公社企业的财产，因国家投资占主要部分，所以应由国家财政接管。（三）在调整后，城市人民公社仍应继续试办。（四）在调整中，应继续总结经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同时对那些混进干部队伍为非作歹的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给予必要处理。

对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决定稿的修改[1]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一

拖拉机站的建立，要按照基本建设的程序办事，建站的设计任务书由省批准，报农业部审核备案。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配备拖拉机、作业机械、机棚、修理设备、运输设备和储油设备，成套配备，建成一个是一个，力求实效。并且要配备农产品加工机械，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配备排灌机械，力求综合利用。拖拉机站如果不能做到综合利用，不能进行多种作业和加工，就很难避免亏损。

二

拖拉机站应该力求做到综合利用，做到不赔钱。由于工农产品的价格关系，由于机械化过程中，必须是机马牛相结合，生产队负担不起牲畜和机耕的两套费用，拖拉机代耕的报酬，只能按当地人力、畜力的耕作费用收，不能

过高，如果出现亏损，这种亏损，由国家财政给以定额补贴。

三

在制定国家计划的时候，对于拖拉机、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排灌机械、零配件、修理设备、运输设备、储油设备和油料供应，以及修理工、驾驶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等等，一定要全面规划，统一安排，保证农业机械能够充分发挥实际效益。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和改进拖拉机站工作的决定稿中三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627号文件下发这个决定。决定规定：（一）前两三年，一度把拖拉机站下放给人民公社，实行社有社营。现决定一般收回，实行国有国营，办国营拖拉机站。（二）拖拉机的分配原则，应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能零星分散。（三）国营拖拉机站以县为单位设立，县以下分片设立若干机耕队。（四）拖拉机站的建立，要按照基本建设的程序办事，建站的设计任务书由省批准，报农业部审核备案。（五）拖拉机的使用、修理，以及零配件和油料的供应，应该统一起来。（六）为改善拖拉机站的经营管理，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必须抓紧进行拖拉机站的清产核资工作。（七）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认真建立拖拉机站的各种管理制度，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成本。（八）加强拖拉机站的领导，下决心为其配备群众观

点强、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九）要在两三年内，把修理厂和修理设备、以及零配件制造的缺口补齐，今后应随拖拉机拥有量的逐年增加，相应增加零配件的供应以及修理厂和修理设备。

致胡志明的感谢电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我高兴地读了你11月24日的来电。我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和最近为停止中印边境冲突、争取重开和平谈判所主动采取的措施，得到越南人民和越南政府的一再支持，特向你致以衷心的感谢。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2年12月1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发电原件刊印。

对《列宁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允斌、爱琴、李妙秀、允若、涛涛[2]：

这篇文章你们有必要看一看。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六日刊载的《列宁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文上。

〔2〕 允斌，即刘允斌，刘少奇的儿子。爱琴，即刘爱琴，刘少奇的女儿。李妙秀，刘允斌的妻子。允若，即刘允若，刘少奇的儿子。涛涛，指刘涛，刘少奇的女儿。

祝贺坦噶尼喀共和国成立及尼雷尔就任总统的电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

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姆瓦利穆、朱利叶斯·克·尼雷尔阁下：

欣闻坦噶尼喀宣布成立共和国[1]和阁下荣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坦噶尼喀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祝坦噶尼喀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2 年 12 月 8 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坦噶尼喀组成自治政府，同年十二月九日正式宣布独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任第一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成立共和国，首都为达累斯萨拉姆，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就任第一任总统。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坦噶尼喀共和国

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成立一个主权共和国，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都仍为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继续担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中央转发关于加强水产科学技术和畜牧兽医工作两个建议材料的通知[1]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阅读，并在以后讨论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时加以讨论。

中　　央

1962 年十二月十日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通知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向中央报送关于水产、畜牧的两个材料的报告上。这两个材料是：一、国家科委水产组会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关于加强水产科学技术工作大力发展水产事业的若干紧急建议给国家科委等的报告；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一九六二年学术年会全体代表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加强畜牧兽医工作促进畜牧生产的若干紧急建议给中国农学会等的报告。前一个报告所提建议涉及以下六个方面：加强水产资源的调查和繁殖保护工作；

改进现有装备，扩大捕捞海区；大力开展浅海、滩涂和港湾养殖和增殖事业；提高池塘养鱼质量，扩大湖泊养殖和增殖面积；加强鱼货管理，提高鱼品质量；为保证各项水产事业的迅速发展，必须大力改变目前水产科学研究工作落后的情况。后一个报告所提建议涉及以下八个方面：大力增产饲料；加强草原管理；迅速恢复和发展大家畜；积极开展育种工作，加强种畜管理；加强防治畜禽主要疫病；积极防治主要人畜共患疫病；解决兽用药械生产、供应和研究问题；大力加强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工作。刘少奇在上面批示："周、朱、邓、彭阅后发。"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3〕9号文件发出这个通知。

对中办工作组关于石家庄市工商关系问题和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

先念、一波、子华[2]同志：

此件对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工商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处理办法，并且使争执很久、妨碍生产的许多问题，很快（只三个星期）就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请你们注意讨论研究，并立即规定几条办法，迅速解决各地发生的工商关系问题。或者加一批语，规定办法，把此件转发各地。

刘少奇

10/12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一九六二年关于石家庄市工商关系问题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上。中办工作组的报告说：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工商业工作的整顿，工商关系逐步趋于正常，但近一个时期，工商之间的矛盾日渐显露，争议增多，

大致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合同的执行问题；处理积压产品；产销计划的衔接；产品的包销与自销；产品检验与产品包装等，其中突出问题是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对中央转发关于组织农民冬闲劳力清理采伐迹地报告通知的批语[1]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东北、内蒙，有大面积次生林，是封山育林后生长的，至今不让老百姓上山，伐木，也无机构管理，如现在要农民上山抚育间伐，又不设机构管理，很可能引起破坏。今年以暂不多办，个别试点为宜。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办工作人员石山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写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报告的通知上。石山报告中说：一九六一年冬，黑龙江省东风林业局与望奎县订立合同，由该县组织农民冬闲劳力和马匹，到该局清理采伐迹地，议定：（一）上山人员的口粮、衣服、棉鞋、蔬菜和马匹草料，完全由县负责，局里只调剂一部分住房；（二）有的迹地清出的木材全部归县，每立方米交局育林费十元；有的迹地清出的木材对半分，不出育林费；由双方到现场根据具体情况协商划定；（三）人马工均不计工资；（四）县所得木材外运时，由县向省申请车皮。经过一年实践，这是个好办法。对群众来说，找到

了很好的冬季副业生产，解决了一部分农村用材，有利于农业生产；对国家来说，不花钱和粮，增产了木材，清理了迹地，为更新创造了条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每年有十多万公顷采伐迹地，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不仅给国家增产木材和有力地推动更新，对三省区的农业也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要这样做，除加强领导外，国家只要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以方便，保证人、马及时上山下山和及时调运群众应得的木材。这个办法可以推广，也可以用于经营次生林。九月四日，谭震林在中央批转石山报告的通知稿上批示："富春同志审阅后，送小平同志批发。"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这个通知稿上批示："刘、周、彭核发。"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对中央转发通知的打印稿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被我压了，因在东北木材会议上已谈过。退中央办公厅办。"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转发通知稿说：利用冬闲时间，组织群众上山参加采伐迹地的清场工作，是各方面都有好处的一件大事。它可以减少林区用于清场更新的劳动力，减少用于抚育间伐的劳动力，这就减少了国家在林区的固定工人的人数。同时，对农民也有很大一批收入，对农业生产增加了一批木材，国家也可以得到一批木材。因此，请你们在今年冬季普遍组织这一工作，凡是愿意自己带粮草衣服鞋子上山的公社，只要在国家经营的林区有采伐迹地，就应当通过合同制的办法，组织农民上山。有些国营农场也应当参加这件工作，以便取得更全面的经验，为今后全面开展这个工作打下基础。清理出来的木材，可以规定为对半分，或四六开，或倒四六开；必要时还可发工资。铁道部应当把运输农民上山和公社得到的木材，列入运输计划内，作为支援农业的一个项目。刘少奇对中央转发通知打印稿作了少量修改。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控制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等问题通知草稿的修改和批注[1]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一

最近发现，有些地区和部门打算在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之外，自行增加开支；还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挪用商业、银行、税收资金和打赤字预算的情况。非法、盲目抢购物资。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今年第四季度以来，货币投放增加很快，对于明年的基本建设和支援农业投资，如果不加以严格地控制，各方面一拥而上，造成混乱，又可能中途被迫削减支出，造成很大的被动。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二

已经办的立即停止，抢购的立即退货。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关于控制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和支援农业投资等几个问题的通知（草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本篇二是刘少奇写在通知草稿（一）项旁的批注，这项内容是：各地区、各部门安排一九六三年的基本建设，一律不许层层加码。各级财政结余除了用于批准结转的工程外，不得用来扩大基本建设工作量。各级财政预备费，上半年不要安排支出，更不要用来扩大基本建设工作量。各地区的自筹资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使用。用自筹资金安排基本建设，只限于个别急需的项目，并且必须在资金、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确已落实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规定的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办理；其中属于大、中项目，必须经国家计委批准后才能办。这部分自筹资金来源，只限于当年的收入，不得动用上年结余或者解冻已经冻结的存款。

关于会见日共袴田里见等人给杨尚昆的批示[1]

（一九六三年一月）

定四日下午三时在西楼谈话并吃饭。日方何人参加谈话由袴田决定。退杨尚昆。[2]

刘少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来信的批示。来信中说：“主席已同意于本月四、五日在杭州接见以袴田同志为首的几位日本同志。袴田同志明（三）日由朝鲜回北京。准备于五日同修权、毅敏、承志等三人一起专机飞杭州。因此，袴田同志在北京只有四号一天，小平同志意见，请你四号接见他并请他吃饭。陪同你接见的，拟定为：小平、彭真、康生、宁一等同志。是否可行，定在何时，请你决定后告宁一或我都可以。”主席，指毛泽东。袴田，指袴田里见，当时为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修权，即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毅敏，即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承志，即廖承志，当时任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宁一，即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廖承志、刘宁一、伍修权等在中南海西楼会见并宴请袴田里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冈正芳。刘少奇在谈话中讲了几个问题：1. 我们主张召开会议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问题。苏共想用召开《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编辑部会议来代替兄弟党会议，故我们不参加。2. 公开争论有坏处，在敌人面前暴露分歧；但也有好处，这就是把问题弄清楚。3. 开会有两种可能：一为增进团结，解决问题；另一为促进分裂。我们一方面要尽量防止分裂；另一方面如别人把分裂强加于我们，我们要有准备，不要惊惶失措。4. 目前的中心问题是中苏两党、两国的问题。只要中苏两党、两国不分裂，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对日共同志保证，我们对苏共的关系，一定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我们方面决不主动采取分裂步骤，一定尽量保持团结，即使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也好；即使被迫采取步骤，也采取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方式。5. 为什么列宁组织的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会放弃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高薪阶层；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的发展比过去更快，资产阶级采取的改良主义政策和对共产党的收买也比过去更高明。6. 对某些党来说，分裂不一定都是坏事，或者还可能是好事。

关于木材加工、利用等问题给薄一波等的信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波、谷牧、富春、震林、李哲人、袁宝华[1]同志：

东北林产工业局写的这个意见[2]，很值得一看。请你们考虑并且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意见。以后木材供应，是否统一由木材公司管理，各城市的木材加工厂，都拨归木材公司，原木运到各城市（原木运输较为便利），由木材公司统一计划加工，按质量、规格供应各需材单位以成品、半成品、成材或者原木。加工剩余物也集中起来，全部加以利用（小的用作冰棍杆、牙签、医院用棉签等，其余作纤维板、纸浆等）。除有特殊情况外，一律不供应各用材单位以原木。这样可大量节约木材，因材利用，并可满足需要。但这须加强木材公司和木材加工厂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木材加工厂也要增加一些技术措施，才能按照需要单位提出的数量、质量、规格进行加工。如此，林区的木材加工和全国各地的木材加工，应有

统一计划，统一安排，并由林业部和木材公司统一管理。以上意见如何？请你们加以考虑。

刘少奇

1963年一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李哲人，当时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袁宝华，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东北林业总局林产工业局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合理利用木材、节约木材的几点意见。报告中说，少奇同志最近提出要克服木材分配上浪费原木的现象，指出："在木材分配上，必须按需要品种规格分配，货要对路，必须用原木的，才分配给原木，不必用原木的，绝不能随便分给原木。过去拿上大原木去做手榴弹把、铅笔、冰棍杆、门窗、造纸等是大材小用，是很大的浪费，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大少爷作风，不用思想看不出问题，如能加强增产节约、综合利用和合理分配，目前木材是可以够用的。"这段指示是非常正确的，抓住了"节骨眼"。东北林业总局林产工业局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应当在用材部门和森工企业广大职工群众中开展一次系统的发展方向的远景教育和当前节约木材的教育。第二，应该改变木材生产部门

或木材分配部门的产品结构。制定一个国定标准的产品目录，并相应制定木材产品分配制度。第三，有关木材生产的计划部门应按照国定标准的产品目录，在供、产、销平衡上促进木材节约。第四，在利用小规格材问题上，除在汽车运材伐区利用汽车进行简易加工外，森铁运输伐区应在每条森铁线上搞几个流动加工厂进行简易加工。应当支持木材干燥问题，并考虑实行产销双方自由议价办法和定点供应；利用加工剩余物生产一些代用大材的又不够木材规格的小材小料，应当看成是正当的，这样才能鼓励有些部门愿用小材。第五，在发展人造板的同时，应当重视和适当发展纸浆生产。第六，希望国家核定森林工业总投资额中应指出用于木材工业、林产化学工业方面的投资是多少？以便在这个范围内有计划的进行工作。第七，加强领导，改革体制，专业化经营。建议对东北、内蒙古林业系统木材厂的领导体制作如下改革：林业局的木材厂由林业管理局木材工业局和林业局双重领导，实行企业内部的独立经济核算。把林业管理局的木材处与林产工业处合并，改为木材工业局，负责安排林业局木材厂、城镇小型厂的计划、生产、技术、设备、财务、成本、劳动管理、物资供应、基本建设等工作。把林业总局的林产工业局改为木材工业管理局，负责安排各林业管理局木材工业局和城镇大型木材厂的有关计划、生产、技术、设备、财务、成本、劳动管理、物资供应和木材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平衡工作。全国的木材厂都要归口，统一供应。在最近召开的东北、内蒙古林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我们与各木材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座谈了今后的领导体制问题。大家一致迫切的意见是最好成立全能的管理机构，如果不能成立也不要下放。

接受老挝首任驻华大使苏万拉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尊敬的大使阁下：

我十分高兴地接受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任命你为老挝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你所转达的国王陛下的良好祝愿。

老挝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老挝人民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老挝人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老挝人民所进行的爱国正义斗争。现在，老挝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这是老挝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不仅使老挝人民有可能沿着和平、中立、统一和繁荣的道路前进，并且对于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洲的和平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衷心地祝贺老挝人民所取得的这一胜利。

中老两国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自从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以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现在我们两国互相派遣

了大使，必将进一步增进中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大使阁下，我热烈地欢迎你作为我们友好邻邦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来到我国。在你执行这一崇高的使命过程中，将得到我和我国政府的充分协助。

我愿趁此机会，向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祝大使阁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应周恩来的邀请，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访问中国，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联合声明》，声明称：两国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级外交使团。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王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两国政府同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关于必须综合利用农村动力机械问题的批语[1]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

尚昆[2]同志：

此件[3]请印发给工作会议[4]各同志参考。农村动力机械必须综合利用。所有拖拉机站、排灌站等，都必须配备粮食加工机械、饲料加工机械以及其他农产品加工机械。今年制造多少农产品加工机械，望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列入计划。以后每年的计划都应有农产品加工机械的生产指标。

刘少奇

二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转报东北局、中央的省委农工部一月十五日关于农业机械站在农闲期间开展服务活动报告的批语上。批语说：“农业机械站（拖拉机站）是当前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主要据点。农机站实行以田间作业为主的综合经营的方针，对于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便利农民，减少本身冬闲窝工亏损有实际意义。我省冬闲时间很长，实行以田间作业为主的综合经营就显得更为重要。对此，我们拟进

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逐步开展。”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黑龙江省委农工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关于农业机械站在农闲期间开展服务活动报告的报告。报告说：去年秋天，省农业机械厅曾要求一些县的农业机械站在农闲季节进行服务活动的试点。入冬以后，这些农机站开展制米、磨面、运输等服务项目，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公社干部、社员、农机站职工一致反映，这些服务活动促进农业生产，便利农民生活，可以使农机站经营合理，可以加速实现非田间作业机械化。大家讨论认为，农机站开展这一业务，应当遵守以下原则：（1）服务项目开始时不宜太多，应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最需要的问题做起，由少到多。目前可进行锄草、制米、磨面、运输、榨油等项作业，其他项目暂时不宜开展。（2）一般应在农闲期间进行，**在农闲期间准备好全年用的饲草和米面等，以便在**农忙期间集中力量为田间耕作服务。（3）只能为集体、社员和当地机关企业的伙食单位加工，不许搞自营业务，不许为投机倒把借以盈利的分子加工。加工的成品和副产品全部归原主所有，只收合理的加工费，不要收实物。（4）除增加一些新增服务项目所需的专用设备外，一律利用农机站的人员和设备，不许另外增加人员和非专用设备。（5）凡是社、队已经举办或计划举办的项目，均不许开展。（6）根据便利群众的原则和具体条件，可以采取流动服务和固定服务两种方式。报告中用黑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

〔4〕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

在北京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时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尊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尊敬的柬埔寨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应邀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1]，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亲王殿下再一次光临我国，是中柬两国互相信任和深厚友谊不断加深的重要标志。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并且以我个人和夫人的名义，向亲王殿下和夫人以及一同前来的柬埔寨贵宾们，表示亲切的、热烈的欢迎。

柬埔寨王国是我们的好邻居。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是我们的好朋友。柬埔寨政府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在奉行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方面，在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方面，都继续取得新的成就。柬埔寨王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本人，为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为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团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亲王殿下在科伦坡会议[2]上，为促进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所做的真诚努力和采取的正义立场，我们表示欣赏和感谢。

中柬两国人民有着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牢固基础。我们两国领导人，都为加强这种友好合作而不断努力。我们很高兴，自从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上次访问我国[3]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有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这一次，我们两国领导人又有机会就两国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地、坦率地交换意见。我们相信，亲王殿下和夫人以及所有柬埔寨贵宾们的这次访问，必将为中柬友好带来新的光彩。

中柬友好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

〔2〕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3〕 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访问中国。

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尊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尊敬的柬埔寨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柬埔寨王国是我们的亲密邻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是我们尊敬的朋友。现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再次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1]，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同时前来访问的，还有尊贵的公主、亲王殿下的忠实助手宾努阁下、松山阁下和其他柬埔寨贵宾们。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柬埔寨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个洋溢着中柬友好的宴会上，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和我夫人的名义，向亲王殿下和夫人以及随同前来的全体柬埔寨贵宾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柬埔寨人民是珍视独立和自尊的人民。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着自己的国家；同时，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同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干涉和颠覆阴谋，进行了不断的

斗争。柬埔寨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柬埔寨王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作为柬埔寨王国的友好邻邦，我们真诚地希望，柬埔寨人民在争取国家繁荣富强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人民同柬埔寨人民一直是友好相处的。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这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双方都能够抱着互相信任、互相谅解的精神，来处理相互关系和共同有关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中柬两国不论在各自的建设事业中，还是在维护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总是能够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互相支持和合作。这种友谊是十分可贵的。

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柬埔寨政府，对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我国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给予可贵的支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亲王殿下采取了公正的态度，为促进中印和解和两国的直接谈判，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对于这一切，我们深为感谢。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尊重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切努力。大家知道，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4]，就是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倡议和推动下召开的。中国政府积极地响应了这一倡议，并且同柬埔寨政府一道，为争取就老挝的独立和中立问题达成国际协议，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不久以前，柬埔寨政府提出由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在“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和“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两个文件上签字，以保证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支持柬埔寨王国的这项措施，并且准备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我们认为，这项措施不仅符合柬埔寨的利益，而且对于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相处，同亚洲邻国通过谈判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争取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政府历来的真诚愿望。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们的努力也是很有成效的。

很遗憾，只有中印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所有尊重事实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印边界争端和军事冲突，完全是印度方面挑起的。中国方面在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并且在军事上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形下，立即提出重开谈判的三项建议[5]，采取停火后撤的主动措施，释放被俘的伤病人员，送回大批缴获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中国方面还积极地响应了科伦坡会议[6]的呼吁，原则上同意把六国建议作为中印直接谈判的初步基础。中国方面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为中印和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印度方面还在继续毒化中印关系，煽动战争气氛；不仅不对中国方面的和解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反而企图利用科伦坡会议的建议来堵塞直接谈判的道路，把六个友好国家放到仲裁者的困难地位。这是违反中印

两国人民的愿望的，也是违反所有关心中印和解的各国朋友们的愿望的。

不管怎么样，中印边境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停火的状态。中国边防部队即将完成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只要印度方面不进行挑衅，不进入停火安排中的争议地区，已经缓和了的中印边境局势就不会重新紧张起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们愿意尽快地举行谈判，我们也可以耐心地等待。我们希望，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其他亚非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努力，推动中印直接谈判，不要因为遇到一些困难而失望。可以相信，这种努力将始终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合作。

尊敬的贵宾们，中柬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树立了良好的范例。我们相信，亲王殿下这一次的访问，对于进一步加强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定将作出新的贡献。祝亲王殿下和柬埔寨贵宾们访问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中柬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

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全体柬埔寨贵宾的健康，

为各国驻华使节和他们的夫人的健康，
为出席宴会的各国来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全体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访问中国。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

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5〕 指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声明提出的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中国政府呼吁印度政府对上述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呼吁亚非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推动上述

三项建议的实现；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祝贺尼泊尔民主日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加德满都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

值此贵国民主日[1]十二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人民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致热忱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尼泊尔王国在陛下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同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得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赞扬。

中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都是和睦相处的。近几年来，中尼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3]的基础上，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最近中尼边界议定书[4]的签订，又一次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各国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中国人民愿意继续同尼泊尔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加强亚非团

结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尼泊尔王国繁荣，人民幸福。祝中尼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万古长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尼泊尔的国庆日。一九五〇年十月，英国与尼泊尔签订条约，放弃在尼泊尔的特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尼泊尔大会党联合国王势力，推翻拉纳家族一百零五年的统治。二月十八日，尼泊尔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这一天成为尼泊尔国庆日，称“国家民主日”。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4〕 指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该议定书是中尼边界条约的附件，也是双方最后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的文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在北京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时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

尊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
尊敬的柬埔寨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的好朋友、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们，现在就要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其他地方进行访问了。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这次的访问，对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双方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对于进一步增强中柬两国在经济建设和国际事务中的互助合作，都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祝贺亲王殿下这次访问的成功。

中柬两国都需要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两国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侵略和干涉方面，以及在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方面，进行着共同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在我们两国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外来势力所制造的各种困难和威胁。但是，

任何困难和威胁只会使我们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亲王殿下说得好，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经得起考验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亲戚般的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

最后，我还要感谢西哈努克亲王殿下邀请我访问柬埔寨王国的盛情厚意。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在金边同亲王殿下相会，重叙旧谊。[1]

祝亲王殿下和夫人以及全体柬埔寨贵宾身体健康，旅途愉快。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刘少奇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应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访问柬埔寨。

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问题的批示[1]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是一个长期计划，不能适应目前国际上激烈的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紧急任务。外文出版发行工作，应当立即制定一个为当前国际反修正主义斗争服务的紧急计划，以此为中心，去带动我们外文出版发行工作的加强，而不要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目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一切已经有的可能条件和很快可以创造的可能条件，去加强我们的外文出版发行工作，而不要作任何等待。目前以出版发行反修正主义的书刊或有助于反修正主义的书刊材料为重点。为此，我们的期刊应有选择地转载左派各兄弟党的反修正主义的文章。我们过去和以后反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以及各左派兄弟党的这类著作，都应再版，利用一切可能向世界各地发行，而以西欧为重点，北非、拉丁美洲也应作为重点。望外办和联络部、中宣部对这个问题再作一次讨论。

刘 少 奇

二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示写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关于加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上。

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1]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现在，占据一些党的统治地位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不能改变的。这一点估计必须肯定。坚决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数并不很多，但是他们在许多党内暂时还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他们党内党员群众和一部分干部的不满，已经引起他们党内的分化。就目前情况来说，在这些党内，坚定的左派还是占少数，多数的党员暂时还处在被蒙蔽、彷徨、动摇的中间状态。应当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我们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说，我们的策略步骤，应当照顾到中间分子的觉悟水平，应当使中间分子看到，我们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而修正主义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的方针，概括地说来，有这么几句话：

第一，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第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第三，坚持革命，反对投降。

第四，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我们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原则，应当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是以退让求团结。当然，不是说，任何必要的让步也不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不革命的、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者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在分化之中。两者在一个党内不可能和平共处，也不可能长期共处，从发展前途看，两者的分裂包括组织上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范围内，两者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个党公开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裂。当然，这四十几个党，也有属于仅仅是表态而不是坚决走修正主义道路的。赫鲁晓夫[2]等骂我们是“教条主义”呀，“宗派主义”呀，“冒险主义”呀，“民族主义”呀，“托洛茨基主义”呀，“分裂主义”呀，他们这样胡说，这样荒唐地给我们戴上许多帽子，还能够说不是某种程度的分裂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和坚持现代修正主义的人，现在在原则观点上是已经分裂了。为了划清界限，这种原则观点上的分裂是必须的。从发展前途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难免走向分裂。在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党内，左派如果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并独立地进行活动，就有被开除的可能。左派被开除了，就势必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继续进行活动。巴西党就是这

样分裂了。印度党也正在这样走向分裂。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党内，例如，日本党内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有一些已经分裂出去。

这里还要指出，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对那些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的人，才是可能的。而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否认阶级斗争的学说、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是不可能的。现在，为了争取多数，团结多数，孤立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还讲要同那些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占统治地位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真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没有可能的。实质上，同这些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3]基础上的团结，也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还是讲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且一定要那么讲，这是作为同他们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是讲给他们的党员群众和干部听的，是讲给他们国家的人民听的。也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向他们施加压力。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不能把世界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领导集团的身上，而只能寄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的身上。目前，包括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占统治地位的党在内的国际团结，实际上只是某种非党性质的统一战线式的团结，而不是党内性质的团结，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讲团结，实际上只能讲这种团结。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清醒，不要那么糊里糊涂。如果以为我们同他们还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是会吃亏的。

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占统治地位的党保持某种统一战线性质的团结和合作，是不是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同帝国主义者还有矛盾，同反动派还有矛盾。这种矛盾，虽然在某个时候、某种问题上，可以缓和一下，但是，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这种矛盾，小部分可能消除，大部分是不可能消除的。要完全消除或者大部分消除这种矛盾，只有他们向帝国主义者彻底投降，向各国反动派彻底投降。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就在政治上把自己消除了。印度党内的丹吉[4]派完全跟着尼赫鲁[5]走，同尼赫鲁一个鼻孔出气，实际上帮助尼赫鲁逮捕印度的左派共产党人，不就是这样在政治上把自己消除了吗？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赫鲁晓夫集团要使苏联完全向帝国主义投降，是不可能的。他们同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的反帝斗争中，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基础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利害关系

上，我们同他们是有可能实行某种团结和合作的。不同他们公开地完全地破裂，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和合作，实际上各干各的，这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也有利，双方都需要，我们应当力求做到这一点。

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在国际上已经有人提出立即分裂的问题。他们认为立即分裂有利，并且说，列宁就是这样同第二国际[6]划清界线，坚决分裂的。实际上，列宁同第二国际的分裂，特别是公开分裂，是经过长期斗争才实行的。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问题，是有关世界全局的问题，必须慎重处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现在说，他们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反对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事实上已经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事实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存在两种对立的路线，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已经有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共产党。这种形势的发展，威胁着他们，动摇着他们统治的宝座。

中心问题是中苏两党、两国是不是公开分裂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不渝地高举团结的旗帜，决不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但是，赫鲁晓夫是否采取同我们分裂的步骤呢？这一点，我们没有把握。因为赫鲁晓夫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又是一个冒险主义者。拿过去的事实来说，他在苏共二十大[7]突然地进行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反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在波兰事件中，他把军队开向华沙，准备用武力解决哥穆尔卡[8]的问题。在匈牙利事件中，他准备从匈牙利撤退苏军，把匈牙利送给法西斯。对中国，他一下子撤退几千个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他对阿尔巴尼亚断绝援助，撤退专家，撤退海军舰队，撤消军事基地，把阿尔巴尼亚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而且事实上断绝了苏阿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些不都是冒险主义的行动吗？在古巴，他开始是不顾后果地在那里建立核导弹基地，后来又吓得要死，屁滚尿流。他是个投降主义者，又是个冒险主义者。因此，他是否突然地采取同中国分裂的冒险步骤，我们没有把握。

如果赫鲁晓夫集团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认为，这样也没有什么，我们照样可以过活。中苏两党、两国如果公开分裂了，对我们当然有些困难，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可以设想一下，赫鲁晓夫如果要同我们公开分裂，无非是采取这样一些行动：片面撕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9]；断绝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停止中苏两国的贸易往来；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如果他敢于毁约，敢于断绝外交关系，对我们来说，不会比现在发生更多的困难，但是，他在国内和国际上遇到的困难，将会比我们大得多。至于说到中苏贸易往来的问题，做生意，他们需要，我们也有需要，现在估计他们还不能完全断绝贸易关系。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即使完全断绝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可以同别人做生意。所以，如果有人硬要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对我们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

题。他们是不是会挑起反对中国的战争呢？现在还看不到这种可能。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公开的长期的法西斯专政，要动员苏联人民进行反对中国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苏联实行公开的法西斯专政，苏联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有人害怕中苏战争，我认为这是用不着害怕的。至于他们要制造边境事件，组织我们周围的邻国来反对我们，这些事他们会干的，过去已经干了，现在也还在干。比如新疆的边境事件，他还是要搞的。[10]

中苏两党、两国公开分裂，对我们有些害处，但是也有不少好处。这就是说，如果赫鲁晓夫集团硬要同我们分裂，我们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可以完全放手在全世界进行活动，像列宁一样，召开某种国际会议，可以公开发表我们的宣言，发表我们的声明，可以大写文章，指名批判，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

从目前的情况看，赫鲁晓夫现在不敢同中国破裂。因为他现在同美国的妥协还没有搞好，而且是搞不好的。美国的要求是，你先同中国破裂，然后我再同你妥协。实际上，等到苏联同中国破裂了，美国也不会同苏联妥协了。当然，在局部的问题上，例如在核扩散的问题上，主要为了反对中国，同时也为了限制西德和法国，苏美达成妥协，签订防止核扩散的协定，这是有可能的。

现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愈来愈加深。美国同法国，美国同西德，美国同日本，美国同加拿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剧了，愈来愈公开化了。英美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这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全世界人民正在觉醒起来，他们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总是要革命的，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

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中间派，甚至某些右派，例如英共高兰〔11〕这样的人，都反对中苏分裂，害怕中苏分裂，要求中苏妥协，要求中苏和解。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中苏两党、两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在我们发表了三篇文章〔12〕以后，赫鲁晓夫就被迫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他们现在又来信，要求举行双边会谈，召开兄弟党会议。〔13〕这些事实，证明他是银样镴枪头一根，纸老虎、稻草人一个。

虽然绝大多数人反对分裂，但是，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在一定范围内的干部中间做好应付分裂的思想准备工作，在左派中间也要做好应付这种分裂的思想准备工作，以免大家在他们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感到突然，措手不及。当然，我们要力求不分裂，力求改善关系，关系实在改善不了，也要力求保持表面的形式的团结，力求保持非党性质的统一战线式的团结。

我们要继续发表几篇文章，批判那些积极地带头公开攻击我们的党的领导人，好好地整他们一下，不轻易放过他们，使他们懂得以后要谨慎一点。如果不这样整他们一下，他们以后会更放肆。对于其他公开指名攻击了我们的党，我们这次暂不回答，只是记下一笔账，保留答复的权利。以后，再看情况的发展，决定答复或者不答复。

我们现在同修正主义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党打交道，实际上是在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打交道。那些对手

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共产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是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那些政党打交道，有点类似我们过去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苏共二十大以来，我们同那些党的关系，一九五七年以前类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一九五七年以后类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目前这样的争论可能停止一个时候，但是，双方的争论是不会停止的。现在，我们要进行中苏两党会谈[14]的准备。有可能举行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也要进行准备。再一次取得妥协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需要，特别是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现在的妥协，比以前困难得多了。在几个问题上难于取得妥协。比如：阿尔巴尼亚问题，南斯拉夫问题，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15]要不要写在共同文件上的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要达成妥协，是很困难的。同时也要指出，即使第三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了，双方达成妥协了，不要好久，又可能再紧张。妥协了又紧张，紧张了又妥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情的发展，无非是这样。

不妨设想一下，在许多党内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将来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继续维持表面上的团结，有的时候，双方的关系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将继续存在不同形式的斗争，彼此进行独立活动。在有一些党内，左派同右派组织上实行分裂。

第二种情况，多数的党内左派同右派组织上进行分

裂，但是中苏两党不公开分裂。

第三种情况，真正形成两个执行不同路线的国际工人运动，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家关系还表面上保持着。

第四种情况，左派党同右派党的关系公开分裂，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公开分裂，但是有许多国际群众团体，例如世界和平理事会[16]、世界工联[17]等等，还不分裂。

第五种情况，在一切方面都分裂。

无非是这么几种情况。现在看来，在各方面牵制的情况下，加上我们实行正确的政策，事情不发展到一切方面都分裂这样绝对的地步，是可能的。我们的做法，要考虑到留有余地，要同列宁那个时候对待第二国际各党的做法有所不同。我们讲到分裂问题的时候，也还要讲统一战线。列宁那个时候，同右派的界限划得越清楚，对左派的发展越有利。所以，后来列宁再三说要同机会主义者分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界限不划清，左派就不能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分裂出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就不能成立，列宁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发展。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分裂没有保留余地，所以后来也产生了一种影响，就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滋长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列宁后来虽然写了《“左”派幼稚病》[18]一书，但是，也没有能够纠正那个时期的“左”倾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左”的错误，就大为发展了。所以，当人家把分裂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也要设想，还有那些方面可以不分裂，那些方面可以保留合作关系。即使

我们被迫在一切方面同他们分裂了，我们也还要考虑将来还可能重新建立某种合作关系。

到底共产党有无存在的必要？现在在全世界提出了这个问题。像丹吉集团那样的印度共产党，完全跟着尼赫鲁走，实际上成了国大党[19]的一派，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像陶里亚蒂[20]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同社会党没有多少差别，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人们为什么要加入你那个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而不加入社会党，不加入工党呢？加入你这样的党，同加入社会党、工党究竟有多大差别呢？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革命的共产党，才有存在的必要，才有发展的必要。

我们对现代修正主义要放手斗争，又要讲究策略步骤。我们在同他们斗争的时候，要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反对分裂，同时也不害怕分裂。如果怕也是分裂，不怕也是分裂，那你怕有什么用处呢？你越怕分裂，他们就越要闹分裂。相反，如果你不怕分裂，那些闹分裂的人就要考虑考虑了。

我们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是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关系，如果继续恶化，甚至公开分裂了，让那些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出去，这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对各国人民革命事业，不会是坏事，而会是好事，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不会是黑暗的，而一定会是很光明的。

现在整个世界局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局势，对我们说来，都是好的，比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多了，比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好多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正在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制度，欧美工人运动中正在产生和发展一种新的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命运会怎样？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取得，并且正在取得新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丑态一步一步地被揭露了，他们正在走下坡路，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归根到底，在全世界，在各国兄弟党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总是要发展壮大起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总是要垮台的。结论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胜，现代修正主义必败。

下面讲讲当前的工作。

可能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要召开兄弟党会议。这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文章发表几篇之后，可能要停一停。以后，抓住几个题目，从中央各单位和各省市，集中一批有写作能力的人到北京，分工写几本小册子，系统地全面地说透这些问题。列宁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写了好几本书：《两个策略》、《帝国主义论》、《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21]、《“左”派幼稚病》，等等。我们的这些小册子，每一本写五、六万字，或者七、八万字，充分印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点，充分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详细比较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

彻底地把这些错误观点驳掉。每一本小册子，还附几份材料，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怎么讲这个问题的，一份是老修正主义者怎么讲这个问题的，一份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怎么讲这个问题的，再一份是帝国主义者怎么讲这个问题的。这样的小册子，对我们党的干部学习很需要，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也很需要。在一个短时期内，报刊、广播上的公开争论可以停止，但是我们出书，出小册子，不要停止，要积极搞。

双边会谈的方式，对分歧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讨论，全面展开。中苏两党会谈可能取得妥协，也可能得不到妥协。如果达成协议，可能要发表两党联合公报，也可能两党要为兄弟党会议起草共同文件。这些都要设想，都要准备。

要加强外国文的书刊出版发行工作，加强对外广播工作。

要加强我们对左派的支援工作。如果中苏两党会谈得不到妥协，也可以考虑同某些左派党举行会谈，发表公报。召集左派党的国际会议，现在不适宜，将来有可能。右派党可能公开召开他们的国际会议，我们也可以召开左派党的国际会议。他们发表公开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公开宣言，树立我们的旗帜。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思想发展的问题。在国际上认真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大大地有助于左派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防止修正主义思想的发展，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思

想的发展。现在南斯拉夫以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要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不要随便放过了。

我们国内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只要我们注意，并采取正确的措施，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要采取有效的办法来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蜕化变质。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不蜕化变质，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这个任务，并在实际中实现这种保证，前途是危险的。有保证或者没有保证，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没有保证，就会亡党亡国。

资产阶级思想是会长期存在的。在我国社会里，不但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而且还不断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现在，在我们的个别单位里，已经存在坏分子篡夺领导的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我国社会，产生一些坏人和继续产生一些坏人，是合乎规律的，完全不产生坏人，是不能设想的。

我们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某些当权的人的思想里产生一种脱离群众、自以为特殊的优越心理，是不可免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个支部书记，一个小队长，一个大队长，一个工厂厂长，一个党委书记；再往上说，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以至更高级的干部，当了权，就可能产生某种优越心理。因为他在职位上优越，他就可能觉得在

其他一切方面都比别人优越。这种优越心理，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共产主义的。必须教育我们的干部，认真地去掉这种优越心理。

我们要向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概每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22]整了一次，一九五七年反右派[23]整了一次，现在又要整一次。这样经常整，定期整，毛病就可能少一些，坏人就可能少一些，我们的党就可以更加健全起来。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保持党的纯洁性，经常注意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掌握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忠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共产主义者的手中。

为了保证不蜕化变质，必须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必须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党员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有问题让他们充分讨论，让他们真正发表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作决定。少数人决定问题，不让大多数人知道，不让大多数人酝酿，不让大多数人参与，这是不好的。这种做法，要保证党和国家不蜕化变质，是很困难的。斯大林放弃群众路线，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不真正依靠大多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记取。

我们要在农村中组织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要坚决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上中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

我们要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要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年中间，树立为共产主义在

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的思想，树立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的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有刘少奇修改件）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本篇是刘少奇在会上所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报告的第三部分。这个报告后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修改，于三月二十九日以中发〔63〕231号文件印发。

〔2〕 赫鲁晓夫，指尼基塔·谢尔基耶维奇·赫鲁晓夫，当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4〕 丹吉，指什·阿·丹吉，当时为印度共产党主席。

〔5〕 尼赫鲁，指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时为印度共和国总理。

〔6〕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七月在法国巴黎成立，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破产。

〔7〕 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8〕 哥穆尔卡，指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当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9〕 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0〕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新疆地区不断发生边境事件。一九六〇年八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连续发生居民非法外逃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州政府的暴力事件。从一九六〇年八月到一九六四年十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冲突一千余次。

〔11〕 高兰，指约翰·高兰，当时为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12〕 这三篇文章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同日全文转载）。

〔13〕 指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信中建议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高级会谈。这封信的全文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4〕 指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

〔15〕 指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6〕 世界和平理事会，根据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决议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成立，是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世界和

平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下有常设的执行局，总部设在赫尔辛基。

〔17〕 世界工联，即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五年十月在法国巴黎成立。

〔18〕《“左”派幼稚病》，即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版，第1—95页。

〔19〕 国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简称。一八八五年成立。

〔20〕 陶里亚蒂，指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当时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1〕《两个策略》，即列宁于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第1—124页。

《帝国主义论》，即列宁于一九一六年一至六月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一月版，第323—439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列宁于一九一五年五、六月间写的，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第223—277页。

《社会主义与战争》，即列宁于一九一五年七、八月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第319—363页。

《国家与革命》，即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写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版，第1—116页。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通常译为《无产阶级革命和

叛徒考茨基》，是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间写的，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版，第229—327页。

〔22〕“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23〕 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

刘少奇主席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公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的邀请，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随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访问的还有他的家属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他的家属及柬埔寨其他贵宾们访问了北京、昆明、上海、长沙、桂林、南宁等城市。柬埔寨贵宾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中国人民隆重、热情、亲切和友好的接待。

在访问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阁下接见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他的家属以及柬埔寨其他贵宾们，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和诚挚的谈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就不断加强的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

会谈。参加会谈的中国方面有：姬鹏飞、乔冠华、杨琳、章文晋、周秋野、陈叔亮[1]。柬埔寨方面有：宾努先生阁下、涅·刁龙先生阁下、松山先生阁下、努呼将军先生、胡森巴先生阁下、诺罗敦·富里萨拉亲王、西梳瓦·西里克·马塔克亲王[2]。会谈是在亲切友好和完全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满意地指出，自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来，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在维护各自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两国在保卫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加强亚非团结的事业中密切合作。两国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正在日益发展。文化艺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也日益频繁。会谈中，双方就两国今后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双方认为，中柬两国的这种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友好睦邻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良好范例。这是两国忠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和万隆会议[4]精神的光辉表现。

会谈中，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感谢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为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推动中、印直接谈判所作的真诚努力和采取的公正态度；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对中国主动采取的停火和撤军的措施给予应有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措施反映了中国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

柬埔寨国家元首坚定地希望，尽管目前存在着困难，但是，柬埔寨的两个伟大的友好国家将在不久通过直接谈判，就它们的问题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协议。在这方面，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欢迎和感谢中国对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5]所抱的谅解和合作态度。

会谈中，双方对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主席赞扬了柬埔寨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英勇斗争，并且认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的利益，而且对稳定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加强亚非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方面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柬埔寨主权、独立和中立的侵犯，并且表示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方面认为，柬埔寨王国政府为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措施，即通过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6]的参加国在“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和“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两个文件上签字的方式，给予柬埔寨王国以必要的国际保证，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并且有助于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这一措施，并且准备在柬埔寨王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双方希望其他有关国家也能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

双方认为，老挝联合政府的组成和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促进了老挝的统一和和平的恢复，并且加强了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刘少奇主席对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

示钦佩。双方希望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切实遵守和履行这项国际协议，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

双方重申，它们决心为和缓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万隆原则的胜利，促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的权利而继续进行努力。

柬埔寨国家元首对中国没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示赞扬。他认为，中国终将能够行使对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的主权。

柬埔寨继续反对某些大国拒绝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和大型国际会议中的应有席位。

双方郑重地重申，两国政府将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中国方面认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他的家属以及柬埔寨贵宾们的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加强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杨琳，当时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周秋野，当时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当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2〕 宾努，当时为柬埔寨国家元首私人顾问。涅·刁龙，当时为柬埔寨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松山，当时为柬埔寨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努呼，当时为柬埔寨王位最高委员会委员、皇家空

军司令。胡森巴，当时为柬埔寨外交国务秘书。诺罗敦·富里萨拉亲王，当时为柬埔寨内政国务秘书。西梳瓦·西里克·马塔克亲王，当时为柬埔寨驻中国大使。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4〕 万隆会议，也称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了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

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5〕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6〕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祝贺中国、巴基斯坦签订关于边界问题协定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

拉瓦尔品第
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阁下：

中巴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1]，已由两国外长在北京签订，这是贵我两国友好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

我们相信，这项协定的签订，为中巴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它也是亚非国家间互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切实本着平等合作、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彼此间的问题的一个新范例，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贡献。

我愿表示这样的信念：在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中巴两国关系将不断发展和加强。祝中巴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该协定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陈毅与巴基斯坦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佐勒菲卡·阿里·布托在北京签订。协定共七条，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为学习雷锋题词[1]

（一九六三年三月）

学习雷锋[2]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刘少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题词刊登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登。

〔2〕 雷锋，（一九四〇——一九六二），湖南望城县简家塘（今属长沙市望城区）人。一九六〇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八月因公牺牲。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

在欢迎老挝国王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尊敬的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
尊敬的梭发那·富马首相殿下，
尊敬的老挝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接待来自我们友好邻邦的尊贵客人，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陛下，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国王陛下是首次光临我国[1]。同来的，还有我们所熟悉的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和其他老挝贵宾们。这是一次隆重的、友好的访问。我现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国王陛下和全体老挝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老挝王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爱好和平的国家。老挝人民有着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他们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老挝人民的正义事业，终于出现了光明的前景。老挝的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相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

扩大的日内瓦会议[2]达成了关于老挝问题的协议，与会各国庄严地宣布：承认和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这是老挝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老挝各种爱国力量长期奋斗的结果。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干涉老挝的阴谋，为老挝人民实现国家独立、中立和繁荣的民族愿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认为，一个和平、独立和中立的老挝，不仅符合老挝人民的利益，也是和缓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的各项规定，切实保证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让老挝王国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作为老挝的近邻和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我们一向同情和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事业，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尊重老挝王国的和平中立政策。我们真诚地祝愿，老挝王国在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的领导下，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老两国一直是和睦相处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两国的关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中断。但是，这几年来，中老两国亲戚般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我们两国的经济、文化合作和友好往来，已经密切起来。我们感谢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对于中老两国友谊的珍视，和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为促进中老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老挝王国的贵宾们，中老两国的友谊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4〕的基础之上的，不断发展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的利益。我们相信，你们这次的友好访问，对于增进我们两国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加强中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作出新的、重要的贡献。

现在，我提议：

为中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和世界和平，
为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的健康，
为梭发那·富马首相殿下的健康，
为全体老挝贵宾的健康，
为各国驻华使节和他们的夫人的健康，
为出席宴会的各国来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全体朋友、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老挝王国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应刘少奇邀请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至十日访问中国。

〔2〕 指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

原则。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4〕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在老挝国王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尊敬的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
尊敬的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
尊敬的老挝贵宾们，
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参加这个隆重的宴会。首先，我要对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的友好的讲话，表示感谢。

国王陛下这次来我国访问[1]，受到我国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这表明中国人民对于亲戚般的老挝人民，有着深厚的友情。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我们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有益的意见，增进了我们两国的相互了解。这有助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祝贺国王陛下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

中老两国的关系是和睦友好、令人满意的。自从一九五六年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访问我国[2]以后，我们两国

就确定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几年来，我们双方根据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相待的精神，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我们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深深地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毫无疑问，对于中老友好，帝国主义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对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从来就是极端仇视的。中老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对此都有切身的经验。对付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互助。我们一贯珍视中老友谊，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信守日内瓦协议[4]的各项规定。我们是言行一致，始终如一的。尊敬的老挝贵宾们可以相信，今后老挝人民不论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和中立的斗争中，或者在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始终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中国人民对于老挝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和扩大的日内瓦会议[5]达成的国际协议，为老挝人民实现独立和中立，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当然，在老挝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碍。帝国主义至今没有停止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正在进行挑拨离间，企图破坏老挝内部的团结。但是，我们相信，老挝各种爱国力量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和平、独立和中立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现在，我建议：

为老挝王国的繁荣和昌盛，

为中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西萨旺·瓦达纳国王陛下的健康，

为梭发那·富马亲王殿下的健康，

为全体老挝贵宾们的健康，

为坎京·苏万拉西大使阁下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老挝王国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应刘少奇邀请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至十日访问中国。

〔2〕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应周恩来的邀请，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率领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

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4〕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5〕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二十四日）

一

邓力群[2]同志：

此件看过，作了一些修改。请送康生[3]同志及其他同志再看看。如果你们没有大的修改，就可再打印若干份，送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审阅，请各同志在三天内审阅修改完毕退你，然后定稿。

刘少奇

11/3

二

主席、周、邓、彭、康[4]再阅。

此件根据主席及其他各同志的意见，又修改了一次，最后我又改了几个地方。请你们再加审阅。可只看修改的地方。

393

最后请小平同志定稿，并决定如何印发。我不再看了。

刘少奇

三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修改，于三月二十九日以中发〔63〕231号文件印发。本篇一是写在报告整理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中央拟下发刘少奇这篇报告的批语。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见本书《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2〕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4〕 主席，指毛泽东。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指康生。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拉瓦尔品第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阁下：

值此巴基斯坦国庆[1]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向巴基斯坦人民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祝贺。

中巴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友谊。近年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2]的指导下，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最近，中巴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3]，标志着中巴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这种发展，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共同利益。我们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巴基斯坦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一天，也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2〕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该协定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陈毅与巴基斯坦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佐勒菲卡·阿里·布托在北京签订。协定共七条，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哀悼慰问在印尼阿贡火山爆发中遇难受灾居民给苏加诺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尊敬的总统阁下：

惊悉贵国峇厘阿贡火山爆发[1]，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们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次火山灾害的不幸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对受灾的居民表示同情和深切的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晚九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巴厘岛的阿贡火山突然爆发，一直延续到十八日中午。这次火山爆发至二十二日为止造成一千一百多人死亡。三月二十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宣布这次火山爆发为全国性的灾难。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的命令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第九十一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战争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判处无期徒刑的战争罪犯，服刑时间已满七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

泽等三十五名战争罪犯，其中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三十名，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四名，属于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一名。最高人民法院和有关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还同时宣布二十七名悔改较好而受到减刑宽大处理的战争罪犯。

致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邀请书[1]

（一九六三年三月）

坦噶尼喀共和国[2]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阁下：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邀请阁下在阁下认为方便的时候，前来中国访问。过去，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中坦两国人民就已结成了友谊。自从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3]以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加强亚非团结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我深信，阁下对我国的访问，将不仅对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将推动亚非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维护亚非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如果阁下能够接受邀请，我将感到非常荣幸。至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日程，我愿意尊重阁下的意愿，予以安排[4]。我期待着你的回信。

顺向你，总统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 年　月　日于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外交部关于邀请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访华的请示上批示：“拟同意。即送主席、邓、彭、陈核阅（电告刘主席），退外交部办。”随请示附送的还有外交部起草的“刘主席致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的邀请书”。主席，指毛泽东。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2〕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坦噶尼喀组成自治政府，同年十二月九日正式宣布独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任第一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成立共和国，首都为达累斯萨拉姆，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就任第一任总统。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成立一个主权共和国，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都仍为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继续担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3〕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噶尼喀建立外交关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4〕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和夫人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友好条约》，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合公报》。

关于接受邀请访问越南事给胡志明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亲爱的主席同志：

我收到你邀请我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来信。我谨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你的邀请。

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1〕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

谨向你致以最亲爱的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 年 4 月 4 日于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刘少奇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访问越南，其间举行两党会谈，并于十六日与胡志明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尊敬的苏加诺总统博士阁下，

亲爱的朋友们：

昨天，当我们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的时候[1]，我们受到了苏加诺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极其盛大、极其热情的欢迎。现在，苏加诺总统阁下又为我们举行这样隆重的宴会，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同印度尼西亚的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的朋友们欢聚一堂，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这是总统阁下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极大盛意。这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所表达的深厚友谊。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和我的夫人的名义，向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英雄的人民。“一旦独立，永远独立”的豪迈口号，充分体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把民族独立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印度尼西亚人民经过长期的、英勇

的斗争，推翻了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共和国。[2]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粉碎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苏加诺总统倡导的、以纳沙贡[3]为核心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团结正在日益加强，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继续巩固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印度尼西亚有一句很有名的成语："只有付出代价，才能取得成就"。我们相信，具有这种自尊和自信的人民，一定能够把民族独立的光荣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大家知道，历史性的亚非会议[4]是在苏加诺总统的倡议下，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印度尼西亚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坚持万隆会议十项原则[5]，为亚非各国的团结反帝事业，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努力。苏加诺总统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6]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受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赞扬。苏加诺总统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7]，受到了亚非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苏加诺总统倡议举行新兴国家运动会[8]，反映了亚非人民在国际组织中不受帝国主义摆布的强烈愿望。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的新殖民主义计划和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正义立场，严重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东南亚和整个

亚洲的和平和安全的一个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自从我们两国相继独立以后，我们的友好关系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我们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10]我们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11]。我们开展了经济、技术、文化各方面的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发展是同苏加诺总统的关怀分不开的。中国人民特别不能忘记苏加诺总统对我国的两次友好访问。[12]中国人民都知道，苏加诺总统是建筑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大桥的工程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我们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正如苏加诺总统昨天和今天一再着重指出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不是普通的友谊，而是战友之间的友谊。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我国人民解放台湾和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这里，我愿意再一次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印度尼西亚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收复西伊里安[13]的爱国正义斗争。我们感觉到，这样做是我们的国际义务。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和胜利，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可靠的战友。现在，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坚持斗争，殖民主义者已经被迫同意把西伊里安的行政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的国旗

将是飘扬在西伊里安上空唯一的旗帜。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的重大胜利。这是苏加诺总统英明领导的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不管新老殖民主义者继续玩弄什么阴谋，都不能阻止西伊里安最后地、完全地回到印度尼西亚的怀抱。印度尼西亚人民建立一个从沙璜到马老奇的伟大共和国的民族愿望是一定要实现的。

亲爱的朋友们！当前的国际形势对实现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以及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非常有利的。自从第一次万隆会议以来，已经有了三十三个国家取得了独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只要保持警惕、坚持团结、坚持斗争，这些困难和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两个大国。我们两国共有七亿五千万人口。加强七亿五千万人民的战斗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促进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使这种战斗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现在，我提议：

为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永恒友谊，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

为亚洲和世界和平，

为苏加诺总统阁下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位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刘少奇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日访问印度尼西亚。

〔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3〕 “纳沙贡”，印度尼西亚名词，是印度尼西亚文中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和共产主义者三字的缩写（反映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为自己主要任务的民族主义、宗教界和共产主义三种政治力量的广泛合作）。一九五七年二月，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即苏加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和合作内阁。民族委员会由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成。合作内阁是一个包括各党派在内的内阁，把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吸收入阁，以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独立，建设祖国。“纳沙贡”就是在这种要求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提出的。

〔4〕 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5〕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

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6〕 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五个国家。会议通过并发表《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

〔7〕 根据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的情况下，考虑下次会议召开问题的建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

〔8〕 新兴国家运动会，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根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倡议，同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七百多名运动员参加。

〔9〕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

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10〕 为合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举行初步谈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二十日，双方代表在雅加达和万隆继续进行谈判，一致同意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四月二十二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纳约在万隆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上签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日，双方在北京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根据条约的规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十二月十五日，双方在雅加达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并规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十二月十九日，国务院举行第一零七次全体会议，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十二月二十四日，该办法分别在北京和雅加达同时公布生效。

〔1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该条约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代

表中国政府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副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签订。四月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批准友好条约。五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友好条约。六月十四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北京互换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在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条约随即生效。六月十五日，条约全文（共八条）在《人民日报》发表。

〔12〕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四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第一次访问中国。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邀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第二次访问中国。

〔13〕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首府巴塘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

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博士阁下和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尊敬的省长先生，
亲爱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

今天，我们看到了巴厘人民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及艺术的游行表演。省长先生刚才又宣布巴厘人民已经完成扫盲工作。这是巴厘人民在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新的重大成就。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我这次有机会来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1]，同苏加诺总统重叙旧谊，并且会见印度尼西亚各位领导人和各界人民，感到十分荣幸、十分愉快。几天以来，我们在雅加达、茂物、万隆和日惹，到处都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极其隆重的接待和极其盛大的欢迎。现在，巴厘人民又为我们举行这个热烈的欢迎大会，使我们更加感动。我们在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知道，阿贡火山爆发[2]给巴厘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非常关怀。我愿意借这个机会

代表中国人民向巴厘灾区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巴厘人民和爪哇各地人民对我们热烈的欢迎，是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的表现。在这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再一次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印度尼西亚民族是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现代史，是充满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主义诗篇的历史。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对殖民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新兴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终于在斗争的烈火中诞生了[3]。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来将近十八年的历史，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继续进行激烈斗争的历史。老殖民主义者力图保持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阵地和殖民利益。新殖民主义者又企图乘虚而入。他们勾结在一起，使用了一切卑鄙毒辣的手段，从霸占印度尼西亚领土，发动武装进攻，煽动武装叛乱，制造分裂，直到进行恐怖暗害活动等等，妄图扼杀印度尼西亚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独立。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坚决斗争，印度尼西亚神圣的领土西伊里安[4]回到祖国怀抱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我代表中国人民热烈祝贺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这个重大胜利。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胜利斗争，为亚非新独立的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赢得

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是当代两个伟大的历史潮流。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有上五十个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同程度地赢得了民族独立。现在，亚洲和非洲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拉丁美洲也开辟了积极进行反帝斗争的战线。几个世纪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曾经是欧美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对象。现在，他们已经站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样，中国人民热烈欢呼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老殖民主义者总是力图保持他们原有的殖民主义阵地和利益。在老殖民主义者迫于形势终于不能不退却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使新兴国家的独立变成有名无实或者名多实少。尤其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更加狡猾和更加凶恶的新殖民主义者，正在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成为亚非人民的主要敌人。新殖民主义者名义上承认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实际上却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把这些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特别利用新独立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通过所谓援助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苏加诺总统说得好，帝国主义并没有死亡，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首先，现在还有不少国家的人民没有取得独立和自由。在亚洲的南朝鲜、南越、北加里曼丹等地，在非洲的刚果、安哥拉、喀麦隆、南北罗得西亚等地，新老殖民主义者还在那里残暴地镇压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绝大多数已经独立了的亚非国家，还需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十八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四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虽然已经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赶出中国大陆，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美帝国主义至今仍然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和领空。帝国主义者还企图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大陆上来。中国人民还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斗争任务。

几乎所有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都需要改变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的国家面貌。政治上的独立还不是完全的独立。只有继续从各方面彻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依靠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完全独立。

全世界共有三十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威胁、压迫和剥削。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仍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认为殖民主义已经死亡、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越是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就越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道路。

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力量，是当代的新兴力量。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是反动的、腐朽的力量。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运动这两支力量在共同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新生的革命力量总是不可战胜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革命浪潮是不可阻挡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论怎样挣扎，都不能阻止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后胜利，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最后死亡。

亲爱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占有光荣的地位。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苏加诺总统不仅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国际上反对殖民主义的伟大战士。

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召开第一次亚非国家万隆会议[5]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贯彻和发扬万隆精神，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作了许多努力。苏加诺总统一

再倡议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会议[6]，这个倡议毫无疑问是适时的，是符合亚非人民的愿望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谴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剥夺印度尼西亚应有权利的无理决定，倡议举行新兴力量的运动会[7]。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对马来西亚的新殖民主义阴谋，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和作出的巨大努力，并且深信，这种努力是一定会取得良好结果的。

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肃清殖民统治后果的重大任务，迫切要求建设自己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是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坚持贯彻苏加诺总统所倡导的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的原则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人民是有志气的人民。我们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亲爱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们！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维护各自的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民，印度尼西亚有一亿人民。我们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于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捍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两国一贯互相支持。在国家建设方面，我们总是互相援助。我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任何惊涛骇浪都不能动摇我们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大桥。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忠实可靠的战友。

印度尼西亚万岁！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刘少奇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日访问印度尼西亚。

〔2〕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晚九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巴厘岛的阿贡火山突然爆发，一直延续到十八日中午。这次火山爆发至二十二日为止造成一千一百多人死亡。三月二十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宣布这次火山爆发为全国性的灾难。

〔3〕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4〕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5〕 万隆会议，也称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

〔6〕 根据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的情况下，考虑下次会议召开问题的建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

〔7〕 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又称“新兴国家运动会”。根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倡议，同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七百多名运动员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邀请，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的有：刘少奇主席夫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公安部局长岳欣、华侨事务委员会副司长朱毅、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树槐。

刘少奇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访问期间，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热诚欢迎和隆重接待，这种欢迎和接待充分地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刘少奇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访问了雅加达、茂物、万隆、日惹和巴厘，并且同印度尼西亚各界人士进行了友好接触。贵宾们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国家建设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访问期间，刘少奇主席同苏加诺总统进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印度尼西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负责分配事务的副首席部长莱梅纳博士、副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和完全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满意地看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的基础上，不断取得了发展。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两国友好条约[3]的签订，这种关系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相互支持相应地有了加强。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双方在有需要的时候，都给予对方以尽可能的援助。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双方表示将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团结和友谊，扩大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双方认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促进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收复西伊里

安[4]和实现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热烈祝贺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印度尼西亚政府重申全力支持中国人民为解放台湾和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坚决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可以并且应该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双方认为，六个不结盟国家的科伦坡会议[5]所通过的建议创造了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争端的有利气氛。双方希望，这种有利的气氛能够进一步加以利用，以导致中印两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这一问题。双方表示坚决反对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外来干涉，因为这种干涉只会破坏亚非团结，从而在寻求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的道路上增添障碍。中国政府感谢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促进中印和解和直接谈判所作的崇高努力，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赞赏中国方面主动采取的停火、后撤中国边防部队、释放被俘印军人员等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极有助于中印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

双方高兴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十分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斗争。双方满意地注意到，新兴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并且在国际关系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双方一致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全

世界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铲除这两个祸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有必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双方重申继续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或维护完全的民族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在这方面，双方表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从而反对落入以马来西亚名义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圈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双方表示坚决支持全体越南人民争取和平统一越南的正义斗争，并且着重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外来干涉。同样，双方表示完全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统一朝鲜的斗争。双方表示坚决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给[6]、葡属几内亚、南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贝专纳、怯尼亚、桑给巴尔和南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双方表示同情英勇的古巴人民，并且重申支持他们为维护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发展自己国家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和威胁的权利的坚决斗争。

双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和发扬万隆精神、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而共同努力。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关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7]的倡议，并且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对于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一定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无限期地停止

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专断行动。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关于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8]的倡议，并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为实现这一倡议而作出贡献。

双方认为，两国国家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对于增进两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刘少奇主席的访问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苏加诺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于雅加达

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该条约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副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签订。四月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批准友好条约。五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友好条约。六月十四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北京互换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在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条约随即生效。六月十五日，条约全文（共八条）在《人民日报》发表。

〔4〕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

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5〕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6〕 莫三鼻给，今译莫桑比克，一九七四年独立。

〔7〕 根据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的情况下，考虑下次会议召开问题的建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

〔8〕 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又称“新兴国家运动会”。根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倡议，同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七百多名运动员参加。

在奈温将军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阁下和夫人，

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我的夫人以及其他同事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访问我们的友好邻邦[1]。我们一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就受到缅甸国家领导人和缅甸人民的亲切的欢迎。现在，奈温主席又为我们举行这样隆重的宴会，我们感到十分荣幸。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奈温主席、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胞波”。在我们两国独立[2]以后，我们的传统友谊又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大家知道，缅甸是最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3]我们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我们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5]我们两国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6]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进行了频繁的友好来往。我们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日益扩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

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奈温主席对于加强中缅友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都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诚如奈温主席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两国都是从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久的国家。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和侵略在我们两国关系中遗留下来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两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始终以两国人民和亚洲和平的根本利益为重，而不被陈腐的殖民主义观念所束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我们双方都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我们双方坚持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我们任何一方从不损人利己，把自己的片面意见强加于另一方。和平共处的原则是适用于有关双方的原则。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两国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合理地解决了两国之间极其复杂的边界问题，并且全面地开展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两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友好的，但是，我们两国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缅甸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政策，为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了许多努力。缅甸是万隆会议[7]的发起国之一，并且对万隆会议的

成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缅甸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8]，坚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正义立场，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促成了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了促进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奈温主席亲自参加了亚非六国科伦坡会议[9]，并且为了使科伦坡会议保持对中印双方都友好的公正立场，作了很大的努力。缅甸在国际事务中这种主持公道的精神，不仅符合缅甸独立自主的立场，也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亚非人民的团结。

同缅甸一样，中国也非常重视亚非国家的团结。我们一贯努力同亚洲邻国发展友好睦邻关系，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我国同缅甸解决了边界问题之后，我们又同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10]中国同阿富汗王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谈判，不久也将开始。[11]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几年来中国政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这个问题一时还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我们并不感到灰心。既然这么多邻国都同中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为什么偏偏中印边界问题就不能和平解决呢？大家很关心中印边境的局势。我可以告诉各位朋友们，由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动措施，中印边境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了。中国主张中印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为基础，迅速开始中印直接谈判。即使一时谈不起来，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终究是要和平解决的，亚洲的两个大国终究是要友好相处的。

尊敬的朋友们，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友好合作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加强这种友好关系，是我们两国的共同责任。我高兴地听到，奈温主席表示将为不断巩固两国的友谊而努力。在我们方面，我们也将一定尽到我们的责任。我深信，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的友谊一定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这是我和我的夫人第一次访问我们的亲戚邻邦。我们非常感谢奈温主席和夫人以及缅甸政府为我们所作的周到的安排，特别是奈温主席还将亲自陪同我们到缅甸各地参观访问。我希望，我们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现在，我提议，

为中缅友好，

为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

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胜利，

为缅甸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奈温主席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刘少奇访问缅甸。

〔2〕 一九四七年十月，缅甸同英国政府签订“缅甸独立法案与英缅条约”协定，脱离英联邦独立。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缅甸联邦政府宣告成立。

〔3〕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政府外交部长伊·蒙致电周恩来表示：缅甸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使节。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在缅甸政府同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一九五〇年六月，两国政府经过谈判后正式建交。

〔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5〕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周恩来与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周恩来与吴努在缅甸仰光总统府互换分别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批准书。中缅边界条约正式生效。

〔6〕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与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奈温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

侵犯条约》。五月十四日，中缅双方政府代表在仰光互换分别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

〔7〕 万隆会议，也称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

〔8〕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9〕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10〕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该议定书是中尼边界条约的附件，也是双方最后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的文件。该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分别代表中蒙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蒙双方代表在蒙古乌兰巴托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陈毅与巴基斯坦政府全权代表、外交部长佐勒菲卡·阿里·布托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

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1〕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发表新闻公报，同意举行边界谈判。六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两国边界谈判代表团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谈判。十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阿富汗王国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分别代表中阿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该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试验的历史阶段[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对于缅甸的国内问题，我不大清楚。感谢奈温主席告诉我很多缅甸国内情况。

在我们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有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会让后起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即使走通，最多也只能像现在的日本那样，最后发展成帝国主义。另一条道路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我们也不愿采取。因此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过多种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试验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试验，苏联也还是在试验中，远还没有最后结束。过去，也有一些人试验社会主义，是失败了。英国工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都曾在欧洲执政过，但没有成功。苏联是共产党执政，中国

也是共产党执政。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采用苏联形式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苏联、中国、朝鲜、蒙古、北越和东欧一些国家采用苏联形式的社会主义，比较成就最多，但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成功，要最后成功，可能还要有几十年的试验。

二

三条道路，实际上只有两条，一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三

我想谈谈南斯拉夫问题。中国所以批评南斯拉夫，就是因为南斯拉夫说只有它的社会主义是真的，中国、苏联、朝鲜、越南等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真的，要把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普遍到全世界，要全世界都学习他们。所以我们才批评他们。如果南斯拉夫只是自己实行它的社会主义，自己进行试验，并不要求全世界都采取它的道路，我们就不会批评它。中国的态度，和南斯拉夫不同。中国并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定要全世界都来学习。各人可以进行自己的试验，有好的经验，互相学习。其他国家愿意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当然很好，如果不学，也可以。只要你不批评我，我也不批评你。

四

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可以不一样，可以试验，彼此相互学习。

五

我们必须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否则政治上的独立不巩固，不可靠。

六

我们要取得经济上独立，需要几十年的工作。在国内，我们必须依靠最大多数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国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尊重我们独立、平等待我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能站得稳。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依靠中国，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

七

中国有些经验，如何对待工人，如何对待农民，如何对待富农、地主，如何对待资本家，如何做执政党。如果缅甸愿意参考这些经验，我们可以介绍。

八

我们欢迎你们派研究小组来。我们可以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经验，好的经验要介绍，坏的经验也要介绍。

九

中国也对苏联的经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42 年前，我就在苏联学习过。苏联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成功的经验，我们学习；失败的经验，我们也要进行研究，可以避免再犯。但是苏联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经验时，只讲成功的，不大讲失败的。其实他们不讲，我们也知道。我们介绍中国的经验时，不采取这种态度，好的、坏的都要介绍。

十

我们党是在 1949 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我们第一步是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势力。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封建势力后，第二步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中，对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只给资本家定息。在农村中，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也实行合作化。这些完成后，第三步就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根据刘少奇审定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访问缅甸。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同奈温在缅甸仙道卫额不里海滩进行会谈。本篇是对这次会谈纪要中刘少奇谈话的节选。

在缅甸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尊敬的奈温主席阁下和夫人，
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贵国的访问[1]，就要结束了。几天来，在你们的首都仰光和掸邦首府东枝，在美丽的茵莱湖和额不里海滨，我们都受到了缅甸政府亲切友好的接待，受到了缅甸人民热烈诚挚的欢迎。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胞波”友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奈温主席阁下和夫人一路陪同我们，关怀备至，使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到亲切、愉快。在这临别的前夕，我愿意向奈温主席和夫人，向缅甸联邦政府和人民，再一次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在访问期间，我们同奈温主席阁下和缅甸政府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我们就两国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无拘束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同认识，并且决定发表联合公报[2]。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合作。

尊敬的主席阁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诚如奈温主席在上次宴会上所说，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巩固的不可动摇的阶段。我很高兴，我们两国都抱有同样的决心，为进一步发展中缅友谊、为促进亚非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继续作出努力。

现在，我请大家同我一起举杯：

为缅甸联邦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为中缅两国的永恒友谊，

为亚非团结，

为亚洲和世界和平，

为奈温主席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亲爱的缅甸朋友们和各国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访问缅甸。

〔2〕 指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缅甸仰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

奈温主席谈到建党问题，我觉得是重要的。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二

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机构等。不把这些旧的上层建筑摧毁，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

三

已经取得革命胜利后，也还有防止堕落腐化的问题。南斯拉夫就是在革命胜利后，逐渐向资本主义腐化堕落。

中国的个别政府机构、个别的军队组织，也有贪污腐化的。有些共产党员，过去是真正革命的，有些老干部身

上还受过好几次伤，但是现在却发现这些人贪污腐化。因此，他们起初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现在不是了。

四

我们对贪污腐化分子在原则上是严格的，但只要他们改正，处罚从宽。这些人过去是真正革命的，后来倒向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还想把他们争取回来。

五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人。

根据刘少奇审定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应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邀请访问缅甸。四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仰光国宾馆和去仰光机场途中，同奈温进行会谈。本篇是对这次会谈纪要中刘少奇谈话的节选。

祝贺印度尼西亚接管西伊里安行政权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兼总理苏加诺阁下：

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接管了西伊里安[1]的行政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旗成为飘扬在西伊里安的唯一的旗帜。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新的重大胜利。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阁下，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个胜利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一百多年来，为反对荷兰殖民主义在西伊里安的统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一致，坚决贯彻总统阁下关于同荷兰实行全面对抗政策的决定和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的结果。这个胜利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新的鼓舞，它再一次证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要坚持团结，敢于斗

争，就一定能够击败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赢得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胜利。尽管帝国主义仍将继续玩弄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西伊里安的发展，但是，我们深信，在阁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保持警惕、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解放西伊里安的彻底胜利，一定能够实现建立一个从沙璜到马老奇统一的共和国的正义事业。

中国人民一向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共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

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

尊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自从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1]，我们就置身在中柬友好的极为热烈的气氛之中。你们的殷勤招待和至为盛大的欢迎，使我们深为感动。现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又为我们举行这样亲切、隆重的宴会，使我们有机会同许多尊贵的朋友们会见，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通过诸位，向柬埔寨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敬意。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柬埔寨王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珍视独立的国家。柬埔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自从柬埔寨获得独立[2]以来，你们为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柬埔寨王国坚持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对于维护印

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柬埔寨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家不论大小，只要主持正义，就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柬埔寨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作为你们的友好邻邦和亲密的朋友，我们对柬埔寨王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柬两国的关系历来是很好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遥远时期。尤其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今天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一九六〇年我们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3]，把我们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几年来，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互相支持不断加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我们两国进行了频繁的友好往来。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十分高兴能够在七年之内四次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殿下。[4]作为柬埔寨的卓越政治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每一次访问，都为中柬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柬友谊的不断加强，是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努力分不开的。

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朋友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在这方面，无论是中国或者是柬埔寨都有过深切的体会。长期以来，中国遭受过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待遇，柬埔寨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因此，无需解释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两国对大国沙文主义如此深恶痛绝。在中柬两国关系中，我们严格遵守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5]和万隆精

神，真正做到相互尊重而不强加于人，平等相待而不高人一等，互利互助而不损人利己。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说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良好榜样。

我们中柬两国一贯相互支持。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始终支持我国人民解放台湾和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为了促进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亲自参加了亚非六国的科伦坡会议[6]，并且一直坚持对中印双方都友好的公正立场。[7]对于所有这些，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努力，中印边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尽管中印直接谈判一时还不能开始，中国政府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相信，在亚非友好国家主持公道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扩大中印边界争端、破坏亚非团结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印边界问题终久是要和平解决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干涉、颠覆和侵略，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在这里，我愿意再一次表示，在今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你们的这种正义的斗争，中国人民将始终是柬埔寨人民可靠的朋友。

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中国有句成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相信，我和我的同事们的访问，一定能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

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我提议：

为柬埔寨王国的繁荣昌盛，

为中柬两国传统的深厚友谊，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王后陛下的健康，

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健康，

为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刘少奇应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访问柬埔寨。

〔2〕 柬埔寨一八六三年被法国侵占，一九四〇年九月又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于当年十月重新侵入柬埔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柬埔寨王国获得独立。

〔3〕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福·波伦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4〕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应周恩来的邀请，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中柬两国于同年七月建立大使级正常外交关系后，应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宾的身份率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第二次访

问中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三次访问中国。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四次访问中国。

〔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6〕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7〕 在科伦坡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多次强调：“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的中印兄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将以亚非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名义作出这种努力。”“对目前的边界争端的分歧拟出一项肯定的解决办法，这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的事，像我们这样的第三者不应该，也不能在实质问题上进行干预。但是需要——迫切需要——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而在促进直接的双边会谈方面，友好的第三者可以在情势允许的情况

下起有用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他们恢复他们的谈判，即使会谈的范围是有限的；当第一次举行了这种会谈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保证这种会议继续进行到达成普遍满意的解决办法时为止。”“印度和中国将以谅解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建议：无论如何不应该从强加于他们的仲裁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建议。而且，双方完全有自由不接受我们的决议中的某一点或另一点。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同意恢复直接接触并且心平气和地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应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邀请，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在柬埔寨王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陪同刘少奇主席阁下访问的有：刘少奇主席夫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以及中国的其他高级官员。

在访问柬埔寨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和其他贵宾们参观了首都金边、磅湛、暹粒、吴哥古迹和吉里隆山庄。这些贵宾们到处受到柬埔寨人民十分热烈和十分友好的接待。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示的这种欢迎和兄弟般的款待，充分体现了中柬两国亲戚般的友谊。

柬埔寨王后陛下会见了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元帅和夫人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并且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贵宾们对柬埔寨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柬埔寨人民在其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

王的英明领导下所作出的努力和在发展国民经济、文教和卫生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阁下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就有关继续加强中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东南亚的局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参加会谈的，中国方面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外交部顾问王幼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陈叔亮、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

柬埔寨方面还有：王国政府首相诺罗敦·康托尔亲王殿下，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宾努阁下、王位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涅·刁龙阁下、国家元首私人顾问松山阁下、国防大臣龙诺中将阁下、外交国务秘书胡森巴阁下、柬埔寨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西里克·马塔克亲王殿下。

这种洋溢着完全谅解的会谈是在极其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结果表明双方对会谈中讨论的问题意见完全一致。

双方指出，两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卓有成效的。双方认为有必要牢固地保持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2]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这种合作关系。

双方认为，中柬两国的相互关系，真正体现了互相尊

重和平等相待的精神，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刘少奇主席重申：中国政府支持柬埔寨人民为了维护柬埔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一贯进行的勇敢的斗争，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和平中立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柬埔寨主权和中立的侵犯。

中国方面认为，柬埔寨王国政府一九六二年提出的，由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保证和尊重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的建议，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的愿望，而且有助于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建议，并且随时准备在柬埔寨王国政府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两个文件上签字。中国方面希望，其他有关国家同样对这一建议作出积极的响应，俾使它迅速得以实现。

柬埔寨方面表示，柬埔寨王国政府和柬埔寨人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柬埔寨维护它的正义事业，并且感谢他们的慷慨和无条件的援助。

柬埔寨方面重申它对台湾问题的一贯态度，即：这个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同样地，应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合法权利。柬埔寨一贯坚决支持中国在国际问题的讨论中应当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中国方面对此表示赞赏。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柬埔寨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单方面停火和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以后，就主动释放印军被俘人员问题作出的决定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个决定是有助

于和缓局势并表明中国对谋求和平解决争端具有真诚愿望的一项新措施。柬埔寨方面希望，中印双方尽快地在科伦坡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直接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柬埔寨方面认为，应该用和平方式公平合理地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中国方面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积极参加了科伦坡会议[3]，以及为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所作的真诚努力和采取的公正态度。[4]中国方面重申，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并且将为此继续作出努力。

双方认为，老挝联合政府的组成和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5]签字，对老挝人民实现独立、中立和和平的愿望，以及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刘少奇主席对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钦佩。

双方认为，最近几个月以来老挝局势的恶化，使这个王国的独立和中立遭到严重的威胁，使日内瓦协议的执行有被完全破坏的危险。作为老挝的邻国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中国和柬埔寨对此表示深切的不安。双方指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有迫切的义务切实遵守日内瓦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老挝的内政[6]。只有忠实地和严格地执行这个协议才能使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得到维护。

双方重申，他们决心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侵略和干涉，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双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守。柬埔寨方面对中国没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示赞扬。

双方重申，支持关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7]的建议。同时，为了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团结，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指出，亚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间进行亲切会见，就有关他们的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刘少奇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对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双方满意地指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三年访问中国[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〇年访问柬埔寨[9]，使中柬两国的友谊不断得到发展。刘少奇主席这次对柬埔寨的访问，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于金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家元首

刘　少　奇　　诺罗敦·西哈努克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3〕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六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锡兰、柬埔寨、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

度尼西亚、加纳等国。

〔4〕 在科伦坡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多次强调："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的中印兄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将以亚非团结与世界和平的名义作出这种努力。""对目前的边界争端的分歧拟出一项肯定的解决办法，这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的事，像我们这样的第三者不应该，也不能在实质问题上进行干预。但是需要——迫切需要——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而在促进直接的双边会谈方面，友好的第三者可以在情势允许的情况下起有用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他们恢复他们的谈判，即使会谈的范围是有限的；当第一次举行了这种会谈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保证这种会议继续进行到达成普遍满意的解决办法时为止。""印度和中国将以谅解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建议：无论如何不应该从强加于他们的仲裁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建议。而且，双方完全有自由不接受我们的决议中的某一点或另一点。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同意恢复直接接触并且心平气和地谈判。"

〔5〕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6〕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当前老挝局势的声明》，坚决支持老挝爱国力量加强团结、反对美国的干涉和侵略，声明如果老挝局势进一步恶化，要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考虑重新召开关于老挝问题的十四国会议。

〔7〕 根据一九五五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的情况下，考虑下次会议召开问题的建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在雅加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

会议。后来由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使会议一再延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上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

〔8〕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应周恩来的邀请，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中柬两国于同年七月建立大使级正常外交关系后，应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宾的身份率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第二次访问中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三次访问中国。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第四次访问中国。

〔9〕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应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并与柬埔寨王国首相桑云签署发表《联合声明》。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至九日，应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邀请，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并与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福·波伦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福·波伦的联合声明》。

在金边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尊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亲爱的柬埔寨朋友们：

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金边市各界人民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不久以前，我在北京荣幸地接待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2]，现在，我又荣幸地带着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真诚友情，访问了你们这个古老而又是新兴的国家。我们的访问，已经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刚才双方隆重地举行了中柬两国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3]这个声明，充分表明了我们两国继续加强友好合作的决心，表明了我们双方对于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共同认识。我和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一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给我们这样热烈、盛大的欢迎，衷心地感谢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对我们这次访问的精心安排和殷勤周到的款待。

我们来到你们的国家，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你们国家的美丽和富饶，人民的勤劳和勇敢，特别是你们对

中国人民真挚友好的感情，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一到你们花园似的首都金边，就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特别是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人民社会同盟成就展览会，并且亲自为我们讲解，使我们了解到，七年来，柬埔寨王国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几天来，亲王殿下不顾疲劳，还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象征中柬友好合作的磅湛纺织厂，访问了标志着柬埔寨悠久历史文化的吴哥古迹和新建设的游览胜地基里隆。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对柬埔寨王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

柬埔寨人民是珍视独立和自尊的民族。柬埔寨王国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英勇地抵抗了外来的干涉和侵略。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对柬埔寨进行种种干涉和颠覆的活动，甚至对你们实行经济封锁，在你们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妄图迫使柬埔寨王国政府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和平中立政策。但是，他们的侵略和干涉遭到了有力的回击，他们的威胁和压力受到了坚决的抵制。柬埔寨人民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使我们感到衷心钦佩。

柬埔寨王国是坚持执行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和平中立政策的国家。柬埔寨王国政府所奉行的这种政策，不仅符

合柬埔寨人民的利益，而且对于稳定印度支那局势和维护亚洲和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尊重并且积极支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柬埔寨王国的侵略和干涉。一九六二年，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和“关于柬埔寨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要求有关国家签字，以保证柬埔寨王国的中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这一措施，并且准备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我们希望，至今尚未作出响应的国家，也能采取同样积极的态度。

我们高兴地看到，柬埔寨王国对国际事务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4]取得协议就有柬埔寨王国提供的一份力量。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中，柬埔寨王国对于制定万隆会议十项原则[5]、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6]，是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倡议下召开的。这些事实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能够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歧视和轻视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进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但是总的趋势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长期以来，亚非各国人民是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对象，被剥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蓬勃地发展；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亚非各国人

民已经觉醒和站立起来，成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因素。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说得好，今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乱成一团。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

但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是不会甘心的。他们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来继续侵犯亚非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我们两国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在老挝发生的事件更证明了这一点。[7]因此，亚非各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实现我们共同愿望的斗争中相互合作，并肩前进。

中、柬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相处的。自从我们两国先后取得独立和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8]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一九六〇年我们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9]，体现了中柬两国人民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几年来，我们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加强了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增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各自的国家主权、维护印度支那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我们两国始终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

中柬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同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在这方面，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王后陛下也对中柬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中柬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

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中国人民将为不断加强我们这种传统的深厚友谊而努力。不管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怎样猖獗，柬埔寨的朋友们可以相信，在你们反对外来干涉、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中柬友谊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刘少奇应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访问柬埔寨。五月五日，出席在金边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大会。

〔2〕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应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邀请，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

〔3〕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下午，刘少奇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金边王宫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就刘少奇主席在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联合声明》。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4〕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达成《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通称“日内瓦协议”。

〔5〕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

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6〕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7〕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协议后，美国干涉老挝内政，于一九六三年春制造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事件，挑起老挝川圹和查尔平原的武装冲突，使老挝面临民族团结政府被颠覆、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的危险。

〔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

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9〕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福·波伦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邀请崔庸健访华的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崔庸健同志

敬爱的委员长同志：

我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并且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诚地邀请你在1963年6月上旬前来我国访问。[1]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我们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也正在全面地发展。我深信，你的来访，必将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和团结、对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敬爱的委员长同志，我和中国人民怀着十分亲切和愉快的心情，热诚地期待着你的光临。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 年 5 月 8 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应刘少奇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等访问中国。

给女儿刘平平的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亲爱的平平：

祝贺你就要满十四岁了。希望你的十四岁生日过得有意义。满十四岁，在生理上，就已成长为青年；在智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我们希望你在满十四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里，大多数青年都是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但是，仍有先进的、一般的和落后的青年之分。做个落后青年，整天想不费力气、不费脑筋，而又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玩得多些；看来，似乎是最讨便宜，最“享福”的；实际上，这样的人，是最苦脑〈恼〉的。他们没有远大理想，不关心别人，只计较吃、穿、玩，计较个人得失，不仅当前不会心情舒畅，将来，也是没有前途，没有用处，经常要处在苦闷和困难中。在困难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在某些关键的时刻，这样的人就很可能变为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共产主义的坏分子。你应当力争上游，不要安于中游，不要做落后分子和自私分子。我们认为，根据你的健康状况、智力条件和你自幼所受的党的教育，你不应当只安于中游，不应当马马

虎虎地渡〈度〉过你的青春时期。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现在学习要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当然，要这样做是会有许多困难，要吃苦，要吃一些亏，要受委屈，甚至要牺牲的；但是，只要你真正决心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虽然，吃了苦，吃了亏，你反而会心情愉快，心情舒畅的。希望你认真地考虑。只要你真正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永远听党的话，并严格地要求自己、管束自己，依靠老师、同学和家里的帮助，你一定能够给党和人民做出更多的工作，党和人民一定会更喜爱你的。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以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共青团员应做到的事，你都要做到，做错了的事，勇敢地改正。这样，等你满了十五岁以后，共青团的组织一定会欢迎你成为共青团的一个正式团员的。

吻你！

爸爸和妈妈

1963，5 月 9 日晚

赴越前夕，于昆明。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在越南国宴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

亲爱的胡志明主席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个亲切、友好的宴会上，我们又同越南各位老朋友和亲爱的同志们聚会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今天河内市人民给我们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使我们非常感动。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陈毅[2]同志和其他来访的同志们，对你们盛大的欢迎和热情的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越南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历史性的光辉胜利。今天，解放了的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以同样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从事着越南历史上空前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在过去短短的九年时间里，越南北方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帝国主义长期奴役所造成的贫穷落后的状况正被逐步消除，新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作为越南人民的亲密兄弟，我们为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人民在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革命的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背信弃义的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3]政权粗暴地破坏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4]，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并且对越南南方人民发动了野蛮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企图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英勇的南方人民已经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不断地壮大了自己，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所有主持正义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站在越南南方人民这一边，都站在越南人民这一边。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体越南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我们相信，不管美帝国主义是继续采取武装干涉的办法还是采取政治欺骗的办法，都决不能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越南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取得和平统一祖国的最后胜利。伟大的越南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以有越南人民这样坚强的战友和兄弟而感到自豪。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越南民

主共和国坚定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线，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致力于发展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为维护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5]，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7]，同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日益增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越两国是兄弟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两国人民总是相互鼓舞，相互支援。我们两国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相互之间的友好团结，全面地发展了两国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我深信，随着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我们两国这种久经考验的友谊和团结必将继续获得巩固和加强。

我提议：

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繁荣和昌盛，

为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为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和世界和平，

为胡志明主席和越南领导同志的健康，
为全体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日晚，出席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举行的国宴。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3〕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期间任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

〔4〕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通称“日内瓦协议”。

〔5〕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6〕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

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7〕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里提出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在中越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节选）[1]

（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

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现在有些人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不能说明问题或者说错了。这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相当普遍的现象，直接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赫鲁晓夫[2]反对斯大林，不仅是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而是更多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举着反对斯大林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特别是他的著作，大部分是马列主义的，小部分是错误的。全部否定斯大林，就是大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他们说现在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可以利用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来取得政权。这个意见不是新的意见，是老的意见，很早以前社会民主党就提出过。列宁写过很多文章批判了这种意见。现在有人提出来，说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关于这个问题，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3]时，我们给苏共中央提了一个书面的备忘

录。我们就怕他们事后不认账，所以提了一个书面备忘录。1957 年的宣言[4]采纳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但没完全采纳。

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的路线问题，我们认为，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

赫鲁晓夫提出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路线，是取消世界革命、反对世界革命的路线，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的学说，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如果不要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不要，就毫无用处。要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全世界大多数人要革命，因此，绝大多数人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能取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的。不管现在有些人怎么讲，不管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5]或铁托[6]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不是无原则的分歧，也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问题。我们看过他们很多文章可以知道，他们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鼓励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而是麻痹他们的革命意志，号召人民进行妥协。被压迫者同压迫者是不能妥协的。因为妥协就是要他们忍受帝国主义

的压迫。他们说，你们忍受20年，等我们苏联超过美国了，你们不用斗争就可以胜利了，或者到那时你们再斗争。我们说，全世界各国人民要胜利，就要靠他们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其他国家可以帮助，但是他们的胜利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斗争。

现在一提到发生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是这样呢？世界大战只有一种——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这不一定。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的，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开始打的。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提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一种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斯大林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但是很难打起世界战争。我看斯大林的这个观点现在还是正确的。现在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马上就打起来，我看不可能。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先打，帝国主义也不会马上打，它没准备好。美国如果不武装起德国人、日本人，它不敢向苏联、向中国进行战争。现在西德和日本还没有武装起来，因此它就不可能向苏联，向中国进行战争。

有些人说，苏联在1936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是全民国家了。现在你们已经实现了集体化，我们的农业也完成了集体化，是不是也成了全民的国家了呢？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否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熄

灭了。我看不仅在中国、越南阶级斗争没熄灭，就是在苏联也没有熄灭。而且还要经过几十年才能熄灭，如果搞的不正确，几十年也不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苏联说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阶级还没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还没有消失，但是国家先消灭了。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提法。因为资产阶级总是说，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从来不承认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宪法就写着自由、平等、博爱，苏共纲领又加上一个和平、劳动、幸福。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走向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报纸宣传也在自由化。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要开始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向资本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问题，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南斯拉夫起先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蜕化成资本主义国家。波兰也有这个问题，苏联也有这个问题，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在我谈到国内建设时再谈。

二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首先是要不要革命，然后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真的还是要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争论？黎笋同志说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而不是客观上的原因。赫鲁晓夫同

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也是这样说的。[7]争论不是纯粹主观性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党内争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客观原因的。严重的党内斗争，一般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就是有人在帝国主义的核战争威胁面前，发生恐惧，害怕战争，害怕革命。这些人总是梦想最好不搞世界革命，等社会主义阵营建设好了，二十年以后苏联超过了美国，那时帝国主义就垮了，革命自然而然就胜利了。这样，不是阻止而正是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要知道，不搞革命，帝国主义是可以腾出手来打仗的。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革命，要解放，这是压不下去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打仗，特别是不可能向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进攻。

还有些党的领导人受了工人贵族的影响。工人贵族既然能够影响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不能影响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也曾经是真正革命的。恩格斯曾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但是后来社会民主党堕落了，成了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组织。现在有些共产党一心走议会斗争的道路，表面上喊一些革命的口号，真正的思想是取消革命。他们的纲领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和老修正主义的纲领的再版。意大利的社会党南尼[8]就向陶里亚蒂提出，你现在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不承认，还是干脆承认好。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了高薪阶层。苏

联的一些领导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收入很高，许多人有自己的别墅和汽车。此外，还有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对于贪污盗窃分子，斯大林采取严厉的法律处分的办法，但是没有发动群众来揭发，因而老是搞不完。我们是采取放手地让群众揭发的办法。1952 年，我们搞了一次“三反”、“五反”[9]，现在又搞一次“五反”[10]。群众一揭发，贪污在一万元以上的为数不少。干部特殊化，也是一个问题。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手，掌握了领导权，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就变了质，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有些机关、企业的干部党员走私做生意。让农民合作化，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不容易的。苏联集体农庄的目前情况值得研究。据说，许多集体农庄里有一条漂亮的街道，大都是历届农庄主席的房子。苏联有一位老党员、老教授告诉我们留学生说，这就是我们的富农。集体农庄的劳动实行包产到组，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一个组，有的加上一两个亲戚朋友编成一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单干。农村已经有了雇佣劳动。讲起来使人难以相信。我们不是幸灾乐祸，这些现象的确值得研究。这些高薪收入者、新的富农、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掌了权，很难相信他们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还要搞什么革命。

这些人掌权，想要他们搞马克思列宁主义、搞革命是不行的。这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无产阶级统治呢？一个人贪污了很多钱怕人揭露，必然要拼命保护自己。揭露对

他们是生死存亡问题。于是就互相包庇贪污，真正的正直的人抬不起头来。要革命的人是多数，这是对的。问题是领导层是什么人多？是贪污的人多，还是廉洁的人多？是谁占优势？像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贪污盗窃分子，要他们变好是不可能的。现在苏联基层的党支部书记60%至70%都换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大多数都换了。换上去的人多数不是那么干净的。苏联报纸曾经发表过青年的理想，有个青年答复说，他的理想是一栋别墅、一辆汽车、一所漂亮的住宅、一个美丽的妻子。就是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共产主义，又有漂亮的妻子是可以的，但是有漂亮的妻子而没有共产主义是不行的。这就是目前苏联青年的理想，而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散发到外国。这种情况是暂时的现象，一时的动摇，形势变了就会改变过来吗？我看不见得。这不只是主观上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客观原因。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蜕化变质。

列宁的党取得了胜利之后，又走一段回头路，有没有可能？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不对头，走一段回头路有没有可能？铁托以前也是真正革命的，现在走着回头路。捷克、波兰是不是有可能走一段回头路？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多次走过回头路。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些阶级和剥削，比资产阶级革命要困难得多。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走一段回头路是可能的。你们越南和我们中国如果搞得不好，也有可能走一段回头路。我们已经有个别的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被贪污盗窃

分子掌握了。前两年我们国家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他们少数人却发了财。他们用高价卖肉、粮食、布匹等。他们组织小集团，互相包庇，揭露不出来。这些单位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些大贪污犯、贪污组织，当然已经不是什么共产党的组织了。这种情况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看不会少。要消除这种情况，不动员全体工人、农民、学生、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里也有的。单靠法律审判是搞不干净的。譬如一个工厂要开全厂大会，一个报告，把全厂群众都动员起来，这些问题就都揭露出来了。会上很多人都讲话。这些坏分子，有的害怕了，有跳楼自杀的、逃跑的；有的承认错误，把贪污的东西交出来，要求宽大处理。你们这里再过几年，如果不搞也有危险的。大体上每五年要搞一次。最近几年我们没有搞，他们就慢慢嚣张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在搞一个“五反”，就是要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这是社会经济原因。

我们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他们又不能接受这些原则。所以斗争是长期的。情况一时不能改变。如能求得妥协和暂时的解决当然也好。但是，斗争绝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发展下去有没有分裂的可能？现在每个党都有几派，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有不革命、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多数党都在分化。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会分裂？中心是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你们和我们都看到了这

个问题。我们方面可以保证，中国党是决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的，中苏两党的关系是有关全世界大局的问题，我们必须慎重处理。但是，赫鲁晓夫是否会采取同中国分裂的步骤，我们没有把握。

1960 年中国党发表了三篇文章[11]，他就一下撤回了一千多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这不是冒险步骤？按国际惯例是要赔偿损失的。但是他不经过任何谈判就片面地加以撕毁。我们忍受了数量很大的损失，没有公开加以谴责。此外，同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把导弹运入古巴，也都是冒险步骤。所以我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最大的冒险主义者，是有事实根据的。因此，对于他是否会采取同中国分裂的步骤，我们是没有把握的。

破裂了，怎么办？中国党考虑过这个问题，总的说，没有什么，天坍不下来。经济援助，已经没有了。逼债，我们也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四条：一、不做生意；二、毁约（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2]）；三、绝交；四、开战。这四条我们都想过。生意，我们要做，他们也要做，实在不愿意同我们做，我们可以同其他国家做。毁约，也没有什么，无非是告诉美国人可以进攻中国，他不管。我们同美国、日本都打过仗，我们靠自己。绝交撤回大使，我们就动员人民群众欢送，希望他再回来。开战，不可能。搞边境事件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至于动员苏联的全军全民向我们开战，他做不到。除非他在苏联实行了长期的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否则苏联军队和

人民不会答应。所以向我们开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对我们搞颠覆活动，组织印度、泰国等反动力量来反华。这个他们已经做了。而且搞了好几年，对我们没有多大危害。

我们仍然力求团结、避免破裂。但是，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对这一点应该有所准备，要在干部中讲明白，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准备，以免到时措手不及。你们也应当有所准备。力争好的团结的前途，同时准备最坏的可能。即使破裂了，也没有什么。植物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小孩，河里的鱼继续游动。你们照样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南方进行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力争团结的前途，但是对分裂应当有所准备。分裂了也不怕。天不会坍下来。不会到处都是乌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走曲折的道路，是完全有可能的。分裂的因素不仅来自帝国主义，而且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党派别。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内部有一部分人是赞成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分裂过。列宁就分裂过。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了，就不会分裂？你能保险？在那些国家里，有力量的、掌握领导权的还是修正主义者。即使分裂了，革命还是要胜利的。现在比列宁当时的情况好多了。那时，在全世界，有组织的革命的党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在其他国家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但是，最后还是列宁胜利了。现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让他们那些不想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分裂出去，不会削弱革命力量，相反，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三

我们所讲的团结问题，是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苏的团结。团结的反面就是磨擦和分裂。其所以要强调团结，就是因为有磨擦和有分裂的可能。

我们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如果基础动摇了，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就不可能。现在就是这个基础发生了动摇。我们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不是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说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不是在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现代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性质？修正主义是否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它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人贵族、高薪阶层、富农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等。关于修正主义，正如列宁所讲过的，他们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不要只看他们的口号、决议、宣言，而要看他们的行动。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变质。

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力量？是否可以把修正主义领导

的力量看作是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修正主义领导的力量是不革命的力量，是反对革命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修正主义虽然有时也同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发生冲突，但是，不能把它看作是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各国反动派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不能认为苏联同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就把修正主义看成是革命的力量。修正主义领导的力量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了。我们要团结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劳动人民的力量，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能把革命的力量同反对革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谈到团结问题时，我们要进一步分析，到底团结什么力量？这个问题搞不清，团结是搞不好的。

我们还设想：如果在一切方面分裂了，以后还会不会再合作？分裂一下又合作也有可能。我们同蒋介石全面分裂，打了十年内战。但是又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又分裂了，现在我们又向台湾提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好吗？蒋介石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在那里也可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军队的供应全部由我包起来，只要他同美国断绝关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一提，他们内部很多人都动摇了，直到现在，蒋介石也没有斩钉截铁地拒绝。所以，同蒋介石还可能有第三次国共合作。

同修正主义的合作和同蒋介石的合作不同，但是有类

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性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加封建买办。我们是这样看法：同修正主义的联合，应该看作是同资产阶级某种派别的联合，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联合，不适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这是我们的看法。

必须经过痛苦才能产生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组织，生孩子也是要有阵痛的。

要实现世界革命，可能不仅要经过一次分裂，而要经过多次分裂。一个国家的党不经过分裂也不行。就拿中国党来说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同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王明[13]分裂过，以后又同高岗[14]有分裂。一个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不经过分裂恐怕也不行。苏联共产党也经过分裂，列宁同少数派分裂，同社会革命党分裂；斯大林跟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15]分裂；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16]等人分裂。分裂是合乎规律的。你们越南党过去没有分裂，将来会不会分裂？不一定。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去对待，使分裂对革命更有利，使分裂出去的人更少一些。根本不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考虑国内党的分裂，是不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考虑到分裂，作了准备，这样更好些。

我是不赞成分裂的，是坚决赞成团结的。但是，如果团结不了，人家硬要把分裂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怎么办？没有想到、没有准备分裂，那是要吃大亏的。准备了，如果不分裂，更好，分裂，我有了准备。没有准备，分裂

了，怎么办呢？要么投降，要么惨重的失败。

目前是一个关键的时候，是全世界共产党都要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因为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对马列主义进行“修正”。应该很好地读他们的文章。应该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要读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17]等人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要注意帝国主义怎样评论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过去我们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完就过去了，没有印象，现在读就不同了，就能记得住了，因为读它是为了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

我们现在搜集了不少老修正主义的材料。我们派人到西欧、东欧国家的图书馆搜集他们的材料，搜集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现在正在翻译出版。

一看就非常清楚，例如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老修正主义是怎样讲的，马克思、列宁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怎样讲的，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怎样讲的。这样可以大大地提高我们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这就可能产生新的马克思、新的列宁。

我们党内正在进行学习，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在搞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可以成长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列宁说他碰到什么问题，先要看所

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然后再写文章。

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能认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就没有了。复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复辟在开始时不一定就是资本家再开工厂、地主重占土地，也不一定就是美国支持纳吉[18]搞法西斯进攻那种形式。像赫鲁晓夫那样实行“和平演变”也是一种形式。还可能有其他形式，可能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或者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就有个别的工厂厂长和党委书记结成一把子，把厂里的产品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更好的产品走私投入市场，高价出售。这样，全民所有制就部分地变成了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你说那个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国家的领导人员、工厂厂长、合作社主任可以搞这些事，不服从国家计划，或者是半心半意的，搞走私，多了，社会就会变质。形式上没有变，实质上变了。

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国际范围内没有解决，在苏联国内也没有最后解决，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毛主席在 1957 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里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但是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19]而且就是在经济上，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再过几年还可能有变化的。像那些变了质的企业单位和合作社，就不是真正按劳分配，而是干部特殊化，隐瞒私分，贪污盗窃，实际上是一种剥削。这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进行剥削。

再谈一谈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国营企业、合作社、商店、学校、文化团体以至个别的党组织，都有变质的可能。我们自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情况。这些个别的变质如果泛滥起来，可能使整个国家和党变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变质的可能。莫斯科声明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复辟没有可能了[20]。只讲了经济，没有讲思想。实际上政治上变质就会影响经济基础。列宁说，国家性质是由政权性质决定的。是由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来决定的。俄国在1917年11月7日以前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1月7日以后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那个时候俄国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改变。但是，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和它所实行的政策，经济上原来没有社会主义就可以搞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要看什么人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经济上没有资本主义，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到底是什么国家，有人说还搞不清楚，说它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理由是工厂不是资本家的。问题是什么人掌握政权，国家政权是阶级的工具，哪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这个国家的性质。

此外，在思想文化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次不行，要多次进行。

四

保持现在的团结，我们赞成；比现在的情况改善一些，我们更赞成；比现在的情况更坏一些，但保持团结，也可以，我们也赞成，最后分裂，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分裂，力争团结，但是不怕分裂。这是我们的方针。我同意你们的某些意见。但是希望你们也要准备更坏的可能，要准备几种可能。现在要取得协议，比1960年81个党会议时更困难了，但是仍然有取得协议的可能。中苏会谈可能不只谈一次，也可能谈几次。我们准备中苏先谈好，然后再召开兄弟党会议。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先谈好，宣言的起草过程长些，但是大会时间比较短。1960年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取得协议以后留下几个问题，在81个党的大会上去争，所以开了一个多月，几乎破裂。我们赞成1957年的方式，不赞成1960年的方式。中苏两党不谈好，不起草好文件，不开大会。开大会就是开团结大会，不开分裂大会。

我们对待敌友我的态度是各有不同的。首先要分清敌友我，不能混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是一种方法；对敌我矛盾的处理又是一种方法。首要的问题在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自己人，这首先要分清。不能混淆敌

友我的界限，不能把敌人当作朋友和自己人；也不能把朋友和自己人当作敌人。如果界限没有分清，或者搞错了，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

五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应该根据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到中苏关系恶化会带来的损失。我们宁愿忍受这些损失，坚持真理，坚持马列主义。这是世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中国一个民族的利益，应该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利益。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赫鲁晓夫做得对的，我们支持；赫鲁晓夫做得不对的，我们不能支持，有时还要批评、反对。

一旦分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共产党会有损失，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困难是暂时的，而马列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了，革命的旗帜竖立起来了，修正主义的思想遇到了抵抗，受到了批判。这是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完全不是根据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考虑的，阿尔巴尼亚也不是只根据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考虑的，而是根

据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考虑的。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讲话，中国就能得到好处，一讲话，中国就会有困难，难道我们对这些不清楚吗？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如果我们采取民族自私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不讲话。人家说我们是民族主义，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忍受牺牲，忍受困难，是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马列主义政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应该在适当时候说出他应该和必须说出的话。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一日上午至十五日下午，中越双方共举行五次会谈。本篇一至五是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本人在五次会谈中发言的节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陈毅，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方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维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黎清毅，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阮志清，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国环、文进勇，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素友、黎文良，外交部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春水，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陈子平。

〔2〕 赫鲁晓夫，指尼基塔·谢尔基耶维奇·赫鲁晓夫，当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4〕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5〕 陶里亚蒂，指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当时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指莫里斯·多列士，当时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6〕 铁托，指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

〔7〕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一月十六日，赫鲁晓夫在会议上讲话。

〔8〕 南尼，指彼特罗·南尼，当时为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9〕 “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0〕 这里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

官僚主义的运动。

〔11〕 这三篇文章是：一九六〇年《红旗》第八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

〔12〕 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3〕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大革命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革命遭到失败。后参加中国托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罗章龙，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随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被开除党籍。

王明，即陈绍禹，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右倾错误主张。一九五六年去苏联，后留居。

〔14〕 高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一九五三年，和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发和批判。会后自杀。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

〔15〕 托洛斯基，亦译托洛茨基，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加米涅夫，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季诺维也夫，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布哈林，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经济学家。

〔16〕 莫洛托夫，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17〕 伯恩斯坦，通常译为伯恩施坦，指爱德华·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考茨基，指卡尔·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指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别尔托夫），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

〔18〕 纳吉，指伊姆雷·纳吉，亦译“纳吉·伊姆雷”，曾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把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解除党交托给他的一切职务。一九五八年六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作出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死刑的判决。同月，纳吉被执行死刑。

〔19〕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这段话的原文是：“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

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见该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第230—231页。

〔20〕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中说：“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消灭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

在河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

亲爱的胡志明主席同志，
亲爱的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越南光荣的首都河内，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巴亭广场上，同兄弟的越南人民会面，感到非常高兴。[1]在这里，我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光荣的越南劳动党，向英雄的河内市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

自从我们踏上兄弟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土地以来，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真诚的、热烈的友情之中。这使我回忆到中越两党同志和两国人民的共同经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越南和中国的黑暗年代里，许多越南同志在本国进行英勇斗争的同时，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两党同志和两国人民，曾经并肩战斗，不仅共尝艰难困苦，而且共享斗争胜利的快乐。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同越南老战友和新战友欢聚一堂，感到特别亲切

和高兴。我们之间的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友谊是在革命风暴中形成起来的战斗友谊，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友谊。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赢得了八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越南历史的新纪元。又经过九年的英勇抗战，越南人民终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进攻，在越南北方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胜利地保卫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年轻的共和国。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坚强地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维护东南亚、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长和壮大，越南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2]的决议正确地指出，现阶段的越南革命，负有两个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战略任务，这就是，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促进南方的民族、人民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统一。自从一九五四年和平恢复以来，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一系列光辉的成就。越南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迅速地治愈了越南北方在长期战争中所造成的创伤，完成了土地改革。从一

九五八年起，越南人民在越南北方胜利地完成了发展、改造国民经济和发展文化的三年计划，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一九六一年起，越南人民开始执行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胜利地完成了头两年的任务。越南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正在把北方建设成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牢固基地。目前，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光辉照耀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快、猛、稳地建设社会主义，为胜利地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最近，越南劳动党中央又提出集中全力促进农业生产，更好地解决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一些迫切问题，主要是粮食、副食品、衣料和一些最必要的消费品，作为今年国家计划的首要任务。我们深信，有着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有着越南广大干部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有着越南人民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南方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越南北方人民在奋勇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仍然被人为地分割。胡志明主席说得好，越南人民“一天没有把美帝国主义从南方赶出去，没有把南方从美吴集团残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一天也寝食不安”。背信弃义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吴庭艳[3]政权，不仅破坏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4]，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而且还悍然对越南南方人民发动了不宣而战的战争，企图把越南南方变成美国

的殖民地，变成美国侵略越南北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基地。肯尼迪[5]政府把一万五千多名美国军事人员投入越南南方，运进各种新式武器，在那里进行“特种战争”的种种罪恶试验，对南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越南南方人民，并没有被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所吓倒。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万众一心，拿起武器，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了英勇的武装自卫斗争。他们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摧毁了敌人建立的一批又一批的“战略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气焰，有力地捍卫了北方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捍卫了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为全世界要求解放的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也得到了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正义斗争。我们坚信，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在北方同胞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最后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去，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

越南北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神圣事业的不断胜利，越南为实现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6]、维护印度支那和平所作的努力

和贡献，越南国际威望的日益增长，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伟大的力量，在正确的革命方针指导下，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干出翻天覆地的事业。

同志们，朋友们！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很好的。这种形势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阴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争取改善生活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广泛地展开。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加速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日益陷于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犹如夕阳西下。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正如旭日东升。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趋势。

国际形势中这些有利的变化的出现，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人民为一方，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正是经过这些较量和斗争，国际阶级力量

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优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人民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国际工人运动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和平运动力量，这些力量的联合，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

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地缩小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活动范围，大大地促进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能够给予决定性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它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肯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影响和示范作用，决不意味着代替或者取消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决不意味着代替或者取消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主要的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正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的时候，在他那篇具有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讲话[7]中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严重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时代。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形势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冒险和更加狡猾的手段，来实现它的反革命的全球战略。美国肯尼迪政府口头上谈论和平和裁军，实际上却在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并且正在打“特种战争”。它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到处进行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采取武装镇压、政治

欺骗和经济渗透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进行军事侵略和战争威胁之外，正在加紧进行颠覆和渗透活动，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妄图在这些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美帝国主义对古巴人民的战争威胁从来没有停止。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武装侵略一直在进行。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字还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勾结老挝反动派，破坏老挝爱国力量的团结，企图颠覆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和重新挑起老挝的内战，使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遭受到严重的威胁。无数的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和平的敌人，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扩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再接再厉，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只要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计划是可以挫败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为着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每个执政的兄弟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一九五七年宣言[8]和一

九六〇年声明[9]特别规定，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必须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并且实行互利的合作和互相援助。严格遵循而不是违反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对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和平共处政策。实现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不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实现和平共处，首先要求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要求取消这种斗争，更不是要求取消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坚决支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只要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哪里的人民就一定要起来革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力量的直接同盟军。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血肉关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割断这种血肉关系，以便他们能够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同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10]。

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

割、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说，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不能引申到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上去，不能用和平共处来取消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义务，更不能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来代替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路线。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最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我们曾遭遇到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困难。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民已经基本上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我们的情况都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国人民正在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立更巩固的基础而奋斗。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帝国主义总是阴谋消灭或者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于灭亡，总是要勾结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党和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及

其他组织中，也还要产生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由于这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才能最后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任务在于：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以及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我们知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密切地依靠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历史上的奇迹，从来都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中国人民既然能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也就一定能够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越两国是亲密的兄弟邻邦。我们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我们两国一向休戚相关，相互支持；一向紧密合作，相互援助。我们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是经得起任何风暴的考验的。为了我们的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和共同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并肩前进！

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英雄的越南人民万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万岁！
光荣的越南劳动党万岁！
胡志明主席万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二日，刘少奇出席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二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并讲话。

〔2〕 指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至十日在河内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3〕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期间任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

〔4〕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通称“日内瓦协议”。

〔5〕 肯尼迪，指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一年一月开始担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6〕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

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7〕 指黎笋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八十周年在越南阮爱国党校的讲话。这篇讲话以《高举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引导我们的革命事业走向全胜!》为题，发表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出版的越南劳动党机关刊物《学习》杂志第四期上。文章共四个部分：（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二）我们正处于严重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时代；（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问题；（四）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做好我们当前的任务。

〔8〕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9〕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0〕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这段文字的译文是：“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见该书《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一文，第311页。

在河内阮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亲爱的长征[2]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十分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参观以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命名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直属党校并且同全体教职员同志和学员同志们见面。在这里，我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以我个人和所有来访同志们的名义，向你们致以亲切的同志的问候和共产主义的敬礼！刚刚校长同志谈到了中国对越南的帮助。在可能条件下援助你们，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你们认为我们尽了自己的国际义务，这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安慰。但是应该指出，首先是你们援助了我们，你们在北方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你们国家的巩固，你们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都是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的援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中，援助从来就是相互的。现在有些人总是强调自己对旁人的援助，抹煞旁人对自己的援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态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校长同志又谈到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问题。十月革命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越南革命也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对伟大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总结为九条共同规律[3]。全世界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人已经走过的路。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再干俄国人已经干过的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同志们目前正在这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常性任务。但在目前，展开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正在世界范围内在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展开一场尖锐的斗争。论战的中心问题是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去领导世界人民革命。这场斗争的发展关系到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在这样重大的原则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袖手旁观的，是不能走中间道路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却在肆无忌惮地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内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

点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力图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严格规定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恢复或者保存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斗任务不是回避现代修正主义的挑战，而是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它的进攻，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高举革命红旗，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胜利的道路。

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首先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请教，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我们也要认真地研读反面教员提供的材料，包括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4]等人的著作以及帝国主义评价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当然，也要读现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文章。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一下，在当前争论的每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样讲的。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我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这样做，一定可以大大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水平，百倍地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力量和信心。

我们大家过去都读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读过的东西就不必再读了。其实不然。我们过去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时候，由于不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常常体会不深，读过也就忘了。现在，为了回答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再去读它，情形就不一样了，体会也就深了。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许多论点并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是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观点在新条件下的重复和发展。大部分是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批判过了的。

在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一切“左”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国际国内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制订他们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照抄书本，硬搬外国的经验，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人云亦云。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我们深信，尽管当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会战胜修正主义，并且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奋勇前进吧！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百战百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参观河内市郊的阮爱国党校并讲话。阮爱国，即胡志明。

〔2〕 长征，当时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3〕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中总结的九条共同规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4〕 伯恩斯坦，通常译为伯恩施坦，指爱德华·伯恩施

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考茨基，指卡尔·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指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别尔托夫），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陪同刘少奇主席一起访问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陈毅，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方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周秋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公安部局长岳欣，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树槐，张茜同志，王光美同志。

刘少奇主席和陪同访问的其他同志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兄弟的越南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友好的接待。

在访问期间，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就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2]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陈毅，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方毅，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武元甲，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维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清毅，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潘继遂，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志清，农场部部长、越南民主党总书记严春菴，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社会党总书记阮阐，外交部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春水，文化部长黄明鉴，外贸部长潘英，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陈子平。

会谈是在十分真挚和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一致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社会主义阵营的

力量更加强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垄断资本、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深刻化。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帝国主义阵营正在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这种形势的出现，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当代各种伟大力量，即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国际工人运动力量、和平运动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相互支持、共同斗争的结果。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它越是接近死亡，就越要进行疯狂的挣扎。美帝国主义正在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积极扶植各国的反动势力、特别是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加紧向世界各国人民进攻。它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并且正在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采取武装镇压、政治欺骗和经济渗透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还加紧控制它的同盟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剧烈地争夺市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进行军事侵略和战争威胁之外，正在加紧进行颠覆和渗透活动，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妄图在这些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美帝国主义的所做所为，进一步证明它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国际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和平最危险的敌人，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双方认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制止核战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双方坚定地相信，在当代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情况下，依靠各国人民群众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维护和平、制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制止核战争是可能的。

双方主张普遍裁军，主张完全禁止使用、贮存、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主张在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在内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双方认为，经过各国人民反复的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关于裁军的某些协议和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在帝国主义还不肯裁军，并继续准备核战争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防威力，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优势，是十分必要的。

双方完全支持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反对统治集团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政策、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双方强烈抗议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镇压和迫害。

双方热烈赞扬和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双方对于英雄的古巴人民表示极大的钦佩。他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尊严和革命果实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双方一致支持古巴人民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的五项正义要求。[3] 双方满意地看到，《哈瓦那宣言》[4] 的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各国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那里的民族民主运动浪潮正在日益高涨。

双方一致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军继续占领南朝鲜、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双方坚信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双方对于斗争中的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支持，相信他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双方向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他们经过长期斗争，在收复西伊里安[5]、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双方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双方反对马来西亚的新殖民主义计划。

双方对于日益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表示兄弟般的敬意。继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喀麦隆、安哥拉、怯尼亚、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南非共和国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和越南期望他们的斗争早日获得胜利。

双方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不断高涨的民

族民主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这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

双方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的和平中立政策，赞同和支持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保证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的建议，并且希望有关国家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

双方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最近在老挝加紧进行干涉的挑衅行为。美国利用老挝反动派正在加紧挑拨和分裂老挝爱国力量的团结，企图颠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和重新挑起老挝内战，以便最后实现控制老挝的阴谋。[6] 这是对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7]的公然破坏，是对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老挝的邻国，又是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中越两国对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老挝严重局势，不能不予以极大的关切。双方重申坚决支持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政策，坚决支持老挝一切爱国力量加强团结、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争取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独立、统一和繁荣的老挝的斗争。双方认为，日内瓦会议所有与会国家有责任认真遵守和维护日内瓦协议。双方重申要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制止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侵略和干涉，消除对老挝的独立和中立的威胁，维护这一地

区的和平。

双方支持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签订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以期在欧洲的中心消除战争温床的建议。同时，双方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两个德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建议。

双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武装侵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野蛮残暴的“特种战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剂作为战争的手段。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8]政权加紧破坏日内瓦协议，大肆镇压和奴役越南南方人民，企图长期分割越南，变越南南方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和新式殖民地。这不仅引起了越南南方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强烈的反对。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正在紧密团结起来，为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集团的反动统治，实现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并进而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坚决斗争。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惨无人道的杀戮，越南南方人民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武装自卫斗争，给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以沉重的打击。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看成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一个光辉的榜样。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全体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并且坚信这一斗

争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中越两党、两国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活动中，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发展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五项原则[9]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必须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刘少奇主席热烈赞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贡献。他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印度支那、东南亚有着重要地位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对于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以及维护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维护和实施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10]、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立场和政策，热烈赞扬越南民主共和国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亚洲、非洲一系列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日益增强，国际威望日益增长，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

胡志明主席热烈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维护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和

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胡志明主席重申，在解决各项重大国际问题时，代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者，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实行友好睦邻政策。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热烈赞扬中国方面主动采取的停火、后撤边防部队、全部释放被俘印军等重大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充分表现了中国方面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胡志明主席希望，中印双方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迅速开始直接谈判。

双方强调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11]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12]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于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的胜利，极为重要。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宣言和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就是，实行联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双方重申，他们将坚持不渝地维护和贯彻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竭尽一切的努力。

双方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正确论断，即在目前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

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力图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麻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破坏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南斯拉夫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教条主义使革命政党不能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根据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双方强调指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是各国共产党人当前的战斗任务。

双方对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存在的分歧深为关切。双方重申，有必要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便通过内部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双方肯定，为了使兄弟党国际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会谈。

双方满意地看到，最近中苏两党中央通过交换信件肯定举行两党会谈[13]。双方表示真诚希望，中苏两党的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加强中苏两党的团结，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胡志明主席强调，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最大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负有最大的责任，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支柱。胡志明主席相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增强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将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双方对于中越两党的亲密团结和中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感到十分满意。这些年来，中越两国在共同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实行全面的互助和合作。这种互助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不断增强，具有重大的意义。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友好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是永远不可动摇的。双方表示，中越两党和两国，将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两党、两国的友好和团结。

刘少奇主席热烈赞扬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路线和快、猛、稳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对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表示敬佩；并且深信，越南人民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中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胡志明主席热烈赞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深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趁此机会，胡志明主席对中国人民给予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

双方确信，刘少奇主席这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和两国主席的亲密会谈，不仅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而且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助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于河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刘少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胡志明

根据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

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六日上午，刘少奇和胡志明在越南河内签署联合声明。

〔2〕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一日上午至十五日下午，中越双方共举行五次会谈。见本书《在中越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节选）》（一九六三年五月）。

〔3〕 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古巴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美国除了必须立即撤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外，还必须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一切颠覆和破坏活动，停止对古巴的海盗攻击，停止侵犯古巴的领海和领空，撤出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并把它归还古巴。

〔4〕 有两个哈瓦那宣言：一、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二、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第二次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古巴人民致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

〔5〕 西伊里安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部，一八四八年被荷兰侵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荷兰政府继续占领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加诺发布解放西伊里安的三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订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协定。同一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同时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荷兰代表范罗延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荷兰政府对西伊里安领土的权力将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接管时终止。在这同一天将升起联合国旗；荷兰的武装部队将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监督下开始撤出和遣返；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降下荷兰国旗，并将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

同联合国旗并列；向印度尼西亚移交权力一事将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后尽快实现。根据这个协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接管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

〔6〕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协议后，美国干涉老挝内政，于一九六三年春制造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事件，挑起老挝川圹和查尔平原的武装冲突，使老挝面临民族团结政府被颠覆、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的危险。

〔7〕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8〕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期间任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

〔9〕 这里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稿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10〕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

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通称“日内瓦协议”。

〔11〕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12〕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3〕 指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

关于校对中越两党会谈记录事给周恩来等的信[1]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恩来、小平[2]同志并陈毅[3]同志：

这份记录，我又看了一遍，有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上修改。请你们看看（可只看改的地方，容易看），我意，可派原来的记录和翻译同志到越南去一次，经过朱大使[4]，同越南同志校对一次。越南的负责同志也可能对他们讲话有一些修改，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份记录两党的其他负责同志要看，还要存档。如你们认为可以，请陈毅同志办理。[5]

刘少奇

五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刘少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五月十一日上午至十五日下午，中越双方共举行五次会谈。见本书《在中越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节选）》（一九六三年五月）、《刘少

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4〕 朱大使，指朱其文，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

〔5〕 邓小平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批示：“尚昆同志：此事已在主席处面议，少奇同志已同意不向越南同志校对记录。现将此件送存。”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指毛泽东。

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稿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三年六月）

一

（四）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只要组成阵营的各国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一致，坚决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那就必然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只要

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坚决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那么，它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强大推动力，是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强大支柱。

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作是继十月革命之后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实行正确的国内国际政策，对于它们的团结一致，对于它们的力量的增强，对于它们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寄予热切的期望。与此相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非常害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害怕它们的团结一致，害怕它们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内国际政策，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以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积极领导本国人民群众贯彻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努力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实行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力量，包括各国的国防力量。如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力量，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实行的政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努力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的同时，还必须履行自己的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有这样，才符合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要求和期待。如果取得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履行历史赋予它们的这种光荣的使命，那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由于这个国家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坚决反对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但是，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就不仅仅是维护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要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

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政策、坚决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如果不积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破坏这种团结，任意攻击这个和那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或者跟在别人后面，不问是非曲直，也照样地攻击这个和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而是维护任何一个或一些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政策，不是维护坚决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不是维护坚决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而是维护民族自私、民族沙文主义、同帝国主义妥协、压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那就是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二

康生[2]同志、吴冷西[3]同志：

此件第四段，我作一些修改，还不成熟，送上，请你们看看，并加斟酌。

刘少奇即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本篇一是刘少奇对复信（五月三十日稿）第四部分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封复信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同年六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四）”改为“（六）”，文字又有改动。本篇二是写在这个复信稿上的批语。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在欢迎崔庸健国宴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朝鲜贵宾们，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热烈欢迎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和随同来访的朝鲜同志们，感到特别高兴。崔庸健委员长同志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伟大友谊不断增进的标志。让我以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朝鲜人民的友好使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崔庸健同志和其他朝鲜同志，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劳动党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最亲切、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朝鲜人民是有革命志气、坚强不屈的人民。在以金日成[2]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高举反帝和革命的旗帜，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长期斗争中，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年祖国解放战争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的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国家。朝鲜人民为捍卫社

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国人民以有朝鲜人民这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战友，而感到极大的光荣和自豪。

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无畏战士，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能手。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千里马运动的引导下，在金日成同志倡导的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以及大安工作体系的推动下，团结一致，为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进行忘我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完全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在巩固一九六二年攻占六个高地的胜利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朝鲜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同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分不开的。朝鲜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建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进行的巨大努力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是重要的贡献。朝鲜人民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并且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的具体实践，及时地给朝鲜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朝鲜人民不断地从一

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朝鲜劳动党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朝鲜劳动党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3]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4]的革命原则，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朝鲜劳动党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久经考验的突击队，不愧是光荣的、有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促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国际威望一天比一天提高。

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强烈愿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提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合理主张，并且为此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美帝国主义至今还继续霸占着南朝鲜，顽固地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不断地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干涉和挑衅活动，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为和平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理主张。朝鲜人民要求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是不可抗拒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亲爱的朝鲜同志们，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甘共苦、

肝胆相照的战友和兄弟。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用血肉凝成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友谊和团结是经得起任何狂风暴雨的严峻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革命者参加和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些朝鲜革命者中，就有我们所熟悉和尊敬的崔庸健同志。朝鲜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朝鲜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一贯给予有力的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始终采取坚持原则、明辨是非的正义立场。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九六一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5]签订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真正做到了在各方面紧密联合而又独立自主，相互支援而又平等互利。我们两国之间这种友好互助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

最后，让我再一次对亲爱的崔庸健同志和其他朝鲜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预祝你们的访问圆满成功。现

在，我提议：

为中朝两国人民亲密的、伟大的兄弟友谊，

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伟大团结，

为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和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金日成同志的健康，

为崔庸健同志的健康，为随同来访的全体朝鲜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应刘少奇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访问中国。六月六日晚，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欢迎崔庸健一行。

〔2〕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3〕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4〕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

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5〕 指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在崔庸健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李孝淳[2]同志，
亲爱的朝鲜贵宾们，
同志们，朋友们：

几天来，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和其他朝鲜贵宾访问了我国首都北京和天津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人民公社、文化机关和名胜古迹，同工人、农民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在访问期间，我们两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友好的同志式的会谈，并决定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3]。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你们的访问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果，对于进一步增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充满着友情的宴会上，对崔庸健同志的成功的访问，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我还要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朝鲜劳动党、光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英雄的朝鲜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崔庸健委员长的这次访问，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像迎接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兴高采烈

地欢迎朝鲜人民的友好使者。你们在访问中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民是如何热爱朝鲜人民、朝鲜的党和他们的领袖，是如何珍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在访问的过程中，你们同我国各界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转达了兄弟的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介绍了朝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同时，中国人民也从崔庸健同志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讲话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强意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朝鲜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鲜明立场。对此，中国人民表示钦佩。

崔庸健同志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和有力的支持。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在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我国的期间，我们两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会谈。我们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会谈的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两党、两国都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两党、两国都决心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两党、两国都决心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

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样，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历史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4]政府正在大吹大擂地推行它的所谓“和平战略”，来掩盖它扩军备战、进行侵略扩张活动，来麻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求各国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而绝不能对帝国主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求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替它涂脂抹粉。正如崔庸健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使他们奋起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敢斗争，必须反对大谈和平而放弃反帝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立场。中国人民愿意同朝鲜人民一起，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起，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亲爱的朝鲜贵宾们，当你们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其他地区进行友好访问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现在，我提议：

为中朝两国人民伟大的兄弟友谊，

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伟大团结，

为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为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世界和平，

为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金日成[5]同志的健康，

为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和其他朝鲜贵宾们的健康，

为韩益洙[6]大使和夫人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应刘少奇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访问中国。六月十五日晚，崔庸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2〕 李孝淳，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

〔3〕 见本书《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4〕 肯尼迪，指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一年一月开始担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5〕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6〕 韩益洙，当时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对李富春因病住院后工作安排问题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

周、朱、彭[2]阅。退尚昆照办。[3]

刘少奇

19/6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关于李富春住院后的工作安排问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报告上。报告说：李富春因病今晚已住院，在医院里交代他秘书报告四项事情：（一）计委工作，请薄一波管。（二）计委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李先念负责。（三）“五反”小组工作，请谭震林负责。（四）为北戴河会议准备工业问题决议工作，请薄一波负责。请报告少奇同志批准后通知他们。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五反”，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周恩来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报告上批示：“已与富春、一波、先念商定，改请伯达同志挂帅搞工业文件。我将报告常委。”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邀请，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陪同崔庸健委员长一起访问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孝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黄长烨。

崔庸健委员长和陪同访问的其他同志，在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和沈阳，进行了参观访问，到处受到了

中国人民真诚热烈的欢迎和亲切友好的接待。这种热情洋溢的气氛，充分地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兄弟友谊。

在访问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会见了崔庸健委员长和李孝淳、朴成哲、姜希源、黄长烨等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崔庸健委员长和刘少奇主席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郝德青。

朝鲜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孝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黄长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益洙。

在会谈中，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十分满意地回顾了中朝两党、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日益巩固的友好团结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日益加强的互助合作关系。中朝两党、两国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完全符合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1]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2]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并且有助于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双方表明坚定的决心：今后将一如既往，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彻底维护两党、两国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并为一九六一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进一步巩固起来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

刘少奇主席对兄弟的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赞扬。以金日成[4]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朝鲜的革命实践，制订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朝鲜人民高举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千里马运动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基础。朝鲜劳动党关于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充分体现了朝鲜人民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精神。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和大安工作体系，高度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刘少奇主席深

信，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在实现宏伟的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斗争中，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崔庸健委员长热烈赞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勇敢地粉碎了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诡计，成功地克服了近几年来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使得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普遍有了好转，使得工业和农业有了更加巩固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崔庸健委员长表示确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发挥着忘我的爱国精神和积极的创造热情，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双方一致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加强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这两支强大的力量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正在日益加强着反对垄断资本、争取民主权利、改善生活条件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帝国主义固有的矛盾日

益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双方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认识和善于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大力推进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双方一致指出，美国肯尼迪[5]政府正在加紧推行更加狡猾和冒险的反革命的全球战略。它疯狂地扩军备战，既准备打核战争，又准备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并且正在打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采取武装镇压、政治欺骗和经济渗透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除进行军事侵略和战争威胁之外，正加紧进行颠覆和渗透活动，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妄图在这些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美帝国主义还在加紧控制它的同盟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剧烈地争夺市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一直把加强西德军国主义发展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作为它的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德和日本已经日益成为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两个温床。

美帝国主义为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使它充当侵略亚洲的“突击队”，正在加紧策划早日结束“韩日会谈”和拼凑侵略性的“东北亚军事联盟”。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乘机实现它向海外进行扩张的侵略野心，一面加紧以核武器武装日本，一面公然制订向海外派遣军队的计划，特别是疯狂地企图实现重新入侵南朝鲜的阴谋。今天被美

帝国主义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对亚洲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必须对它的侵略阴谋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近，西德和法国也进一步勾结起来，签订了所谓“合作条约”。[6]法德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法德条约是一个进一步有利于西德军国主义发展的反动条约。双方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仍然是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的靠山，在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的同时，必须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帝国主义。

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同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扩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今天，离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势力的斗争，就谈不上任何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来争取。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国际工人运动力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能够挫败的，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双方指出，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是：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着帝国主义阵营及其追随者，还存在着许多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国家和民族。

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活动中，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必须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双方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的。绝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并且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而忘记了不从各方面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谈不上和平共处。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引伸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去，借口和平共处来取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义务。

中朝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向相互支持，亲密合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前线，坚守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对于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起着重大的作用。刘少奇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南部和阻挠朝鲜实现和平统一的侵略罪行。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不断进行挑起新战争的罪恶阴谋活动，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对南朝鲜人民加紧进行野蛮的法西斯镇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为实现

朝鲜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合理主张，坚决支持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刘少奇主席指出，朝鲜被人为地分裂的状态，必须结束；美国必须毫不迟延地撤出它在南朝鲜的侵略军队；朝鲜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实行友好睦邻政策，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朝鲜政府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顽固地霸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等一系列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毒的敌对行为；完全支持中国人民英勇地击退帝国主义的各种反华活动和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朝鲜政府坚决支持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热烈赞扬中国方面所采取的停火、后撤、全部释放被俘印军等史无前例的主动措施。崔庸健委员长指出，印度方面不顾中国政府的真诚努力，拒绝和平谈判，继续毒化中印关系的立场是错误的，并且申明，印度方面应该响应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合理建议。

双方重申，中朝两国政府一贯主张普遍裁军和全面禁止核武器。但是，在帝国主义拒绝普遍裁军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必须普遍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优势在内。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同时又最广泛地动员世界各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核讹诈政策进行最坚决的

斗争，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关于裁军的某些协议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

双方热烈赞扬和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双方一致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当代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

双方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觉醒了的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最近日本人民展开全国统一行动，反对美国核潜艇在日本停泊，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7]，这是完全正义的。双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复活和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组织东北亚联盟的侵略阴谋。双方指出，严重侵犯朝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威胁亚洲和平和安全的“韩日会谈”，必须立即停止。

双方对于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当前老挝的严重局势[8]，表示异常关切。双方坚决支持老挝一切爱国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破坏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9]、利用老挝反动派分裂老挝爱国力量、颠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重新挑起老挝内战的罪恶活动。双方深信，坚持斗争的老挝人民在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

双方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武装侵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野蛮残暴的“特种战

争”。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10]集团的爱国斗争是正义的。越南全体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是正义的。越南人民的这一斗争将始终得到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双方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双方向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用革命的武装打败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攻和侵略计划。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美帝国主义拒绝古巴的五项正义要求[11]，公开表示保持入侵古巴的自由，并且悍然宣称西半球的共产主义是不能谈判的。所有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美帝国主义正在变本加厉地策划扼杀古巴革命和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罪恶阴谋。中朝两国重申，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并且深信，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必将在两个哈瓦那宣言[12]的革命旗帜下胜利前进。

双方热烈祝贺非洲一系列新兴国家赢得了独立，双方欢迎并祝贺非洲首脑会议[13]对加强非洲人民团结、促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双方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赢得了自由和解放，并且

正在为巩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和支持。双方高兴地看到，喀麦隆、安哥拉、怯尼亚、南、北罗得西亚、南非及其他各国人民，正在风起云涌地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并且坚信，他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朝两党、两国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正如宣言和声明所正确指出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麻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适应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需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许别人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双方强调指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是各国共产党人当前严重的战斗任务。

双方一致认为，南斯拉夫铁托[14]集团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它公开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破坏工作。共产党人必须同铁托集团划清界限，并且对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同铁托集团站在一起，只能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国内、国际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动脑筋，不研究全部有关事实，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使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双方强调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宣言和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即实行联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决不能违背平等协商的原则，把一党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党、另一国。决不能借口相互援助，损害另一国的独立和主权，干涉另一国的内政。双方重申，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渝地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

双方认为，目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分歧，必须通过内部平等协商的办法来求得解决。为了消除分歧、增强团结，有必要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双方真诚希望，中苏两党的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双方确信，崔庸健委员长这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

问和两国领导人的亲密会谈，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并且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崔庸健委员长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人民，邀请刘少奇主席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愉快地接受了这项邀请。[15]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2〕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3〕 指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4〕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5〕 肯尼迪，指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一年一月开始担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6〕 指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在巴黎签订的《法国—西德合作

条约》。

〔7〕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8〕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协议后，美国干涉老挝内政，于一九六三年春制造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事件，挑起老挝川圹和查尔平原的武装冲突，使老挝面临民族团结政府被颠覆、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的危险。

〔9〕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

〔10〕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期间任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

〔11〕 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古巴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美国除了必须立即撤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外，还必须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一切颠覆和破坏活动，停止对古巴的海盗攻击，停止侵犯古巴的领海和领空，撤出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并把它归还古巴。

〔12〕 指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和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第二次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古巴人民致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

〔13〕 这里指第一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有三十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代表，以及非洲未独立国家的一

些民族主义政党领袖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讨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洲的团结和统一等问题，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关于非殖民化、关于地区合作：非洲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前景等六个决议，一致同意建立一个“非洲统一组织”，规定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为“非洲解放日”。

〔14〕 铁托，指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

〔15〕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应崔庸健的邀请访问朝鲜。

对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三年六月）

一

我们应当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作既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高度的艺术素养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二

此件已阅。退回。在32页改了几个字，请酌定。[2]

刘 少 奇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刘少奇对周恩来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批示印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阅看的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修改稿第三十二

页一段文字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刘少奇写在这个修改稿首页上的批语。

〔2〕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这个修改稿上批示：“已照改。”七月二日，国务院第一百三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七月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所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七月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这个报告。

对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报告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

主席、周、朱、富春、先念[2]阅后发。

刘

1963年六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报告的通知稿上。谭震林、聂荣臻在给毛泽东、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汇报了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开始到三月底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基本情况、所拟订的十年规划的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以及实现规划的重要措施等问题。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3〕686号文件下发转发通知以及谭震林、聂荣臻《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一九

六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语中指出：“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谭震林、聂荣臻同志《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是开得适时的。会议对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形势的估计，以及所提出的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方针和办法，都是正确的。会议所制订的《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等六个专题方案，中央责成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十九个专业和专题规划，责成国务院各有关部和各地方党委与人民委员会在全国统一安排下负责组织实施。会议所提出的十大研究任务，应成为今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全国性的长期的重点，必须大力促其实现，务期在今后十年内做出显著成绩，为我国农业过关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中央和国务院认为，为了加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目前采取下列措施是适当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在国务院下成立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委托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负责具体领导；二、农业科学技术干部，必须尽可能归队，以充实生产、研究和推广普及的技术力量；三、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应当逐步按自然区划调整；四、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推广普及工作的投资和经费，应当有显著的增加，在农业总投资中应占适当比例（这个比例应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加以确定），并须专款专用，切实保证；五、十大研究试验任务及其所需的投资、经费、劳动工资等，应由国家科委、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逐项作出专门的计划，在目前体制的条件下，其中属于各部门、各地方负责的部分，应由各部门、各地方分别纳入各自的计划；综合性的重大措施，应该列入国家科学事业计划，均应切实予以保证。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今后都应该经常关心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推广普及工作，

并定期检查这一报告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在执行中所发生的各项问题。这个规划的进一步落实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若干修改、补充和发展，以及相应发生的其他问题，今后一律由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处理。现将谭震林、聂荣臻同志的报告和《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其余附件，供参考。”

〔2〕 主席，指毛泽东。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关于继续中苏两党会谈的指示电报[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

邓、彭、康[2]：

一、代表团十一号报告悉。同意你们下次发言要点。

二、人民日报明（十三）日发表社论[3]，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以后准备每日发表一篇观察家的文章[4]，批驳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南斯拉夫铁托[5]集团、印度反动民族主义者对中苏分歧幸灾乐祸、挑拨离间的言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这些敌人。

三、在第三轮讲话中，对方如果不提出中断会谈、下次继续会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国际会议等事，你们在第三轮讲话中也不要主动提出休会。可以这样你一篇我一篇地讲几次，以便更多地侦查对方的动向和决心，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中　　央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二十二时

二

特急。主席、总理[6]阅后发。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中用仿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用楷体字排印的是周恩来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刘少奇写在本篇一电报稿上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共举行九次，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立场。七月二十二日，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发表《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公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

〔2〕 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康，指康生。

〔3〕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4〕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观察家文章《不许美帝国主义插手中苏分歧》、《必须同叛徒铁托集团划清界限》、《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

〔5〕 铁托，指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

〔6〕 主席，指毛泽东。总理，指周恩来。

关于应邀访问朝鲜事给崔庸健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亲爱的委员长同志：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邀请我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来信。我谨向你、并且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你的邀请。[1]我相信，我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对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作出贡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 年 8 月 18 日于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等访问朝鲜。

对《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1]

（一九六三年八月）

一

苏共中央公开信[2]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3]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

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

三

总结报告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使这一切都服从于和平共处政策。

四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4]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

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稿）中四段文字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该文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文字有所改动。

〔2〕 指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3〕 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基耶维奇·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

〔4〕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在朝鲜欢迎国宴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

亲爱的金日成[2]首相同志，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中午，平壤市人民刚刚给了我们十分隆重、十分热烈的欢迎，现在，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又为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这一切，使我们深为感动。在这里，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名义，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以我个人和其他来访的中国同志们的名义，向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政府，向朝鲜各位领导同志，向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是在朝鲜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前来访问的。跨上了千里马的朝鲜人民，在去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现在，朝鲜人民正在再接再厉，为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第三年计划的目标而奋斗。朝鲜人民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美国侵略者所造成的战争废墟上，建立了幸福的人民乐园；把自己的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具有巩固的自主民族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

国。这是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朝鲜人民这个伟大的胜利。

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胜利，是朝鲜劳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千里马运动的胜利，是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胜利。朝鲜人民的辉煌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朝鲜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朝鲜人民在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英雄业绩。现在，朝鲜人民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镰刀和锤子，坚强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朝鲜人民的胜利斗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朝鲜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愧为英雄的国家。

霸占着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是人为地分裂朝鲜的罪魁，是南朝鲜人民目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的根源。为了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朝鲜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建议，作了重大的努力。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朝鲜全体人民和朝鲜政府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坚决支持南朝鲜人民的反美救国正义斗争。美国侵略者必须从南朝鲜滚出去。朝鲜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坚信，朝鲜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朝鲜劳动党，是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革命

的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光荣的队伍。朝鲜劳动党，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3]和一九六〇年声明[4]的革命原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朝鲜劳动党，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破坏这种团结的分裂活动，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华运动。中国共产党以有朝鲜劳动党作为自己亲密的战友而感到自豪。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中，一向得到朝鲜人民兄弟般的支持，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向朝鲜人民和朝鲜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一定很关心中国的经济情况，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经过两年来有成效的调整工作，已经基本上克服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不管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的情况是在一天天好起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我国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两国人民总是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亲密合作，并肩战斗。我们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在今后的岁月里，不管世界上出了什么事，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革命理想而斗争到底。

现在，我提议：

为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为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金日成同志的健康，

为崔庸健委员长同志的健康，

为朝鲜其他领导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的健康，

为世界和平，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应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的邀请访问朝鲜。九月十五日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共和国内阁在平壤市举行国宴欢迎刘少奇一行。

〔2〕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3〕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

〔4〕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在朝鲜咸镜南道和咸兴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咸镜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咸兴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访问你们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城市，感到十分高兴。首先，请允许我对于你们这样盛大的欢迎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通过你们向全体咸镜南道和咸兴市人民转达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敬意和最亲切的问候。

你们的城市，中国人民是熟悉的。早在三十年代，咸镜南道的工人和农民就进行过英勇的反帝斗争。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人民游击队，同英勇的人民军一起，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你们对于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兄弟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朝鲜人民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

是十分敬佩的。

咸兴市，是遭到最严重的战争破坏的一个城市，也是迅速恢复起来的一个城市。在战后短短的几年里，你们在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战争废墟上，以千里马的气势，创造了建设的奇迹，把咸兴市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我们虽然刚刚来到咸兴，你们城市的宏伟规模和崭新面貌，已经使我们得到了鲜明的印象。我们热烈地祝贺你们的辉煌成就。

朝鲜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以金日成[2]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制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千里马运动、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大安工作体系和新的农业领导体系是符合朝鲜实际情况的，自力更生地建设自主民族经济的方针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七年计划，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拥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朝鲜北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南朝鲜人民反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朝鲜人民正在奋起斗争。李承晚[3]已经倒了。朴正熙[4]倒下去的日子也不会很远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阴谋诡计最终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朝鲜人民反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体朝鲜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侵略者是要

被赶出朝鲜的。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一定会重新统一。朝鲜三千万爱国同胞一定会重新团聚。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来到朝鲜虽然才有几天，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新的朝鲜。朝鲜的城市是社会主义的新城市，朝鲜的农村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见到的人民，是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镰刀和锤子的革命的人民。你们一方面努力建设，一方面警惕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看到你们，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中朝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亲兄弟，是志同道合的好战友。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贯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在我们的国旗上，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你们的国旗上，有中国革命烈士的鲜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我们两国人民这种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在今后的岁月里，在任何风浪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团结在一起，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高举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朝友谊万岁！

朝鲜人民万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朝鲜劳动党万岁！

金日成同志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的邀请访问朝鲜。九月二十日，出席朝鲜咸镜南道和咸兴市群众欢迎大会。

〔2〕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3〕 李承晚，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为大韩民国总统。

〔4〕 朴正熙，当时为大韩民国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总统。

在平壤举行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金日成[2]首相同志，
亲爱的崔庸健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友好访问，就要结束了。在这十二天的访问期间，我们受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政府的殷勤接待，受到了朝鲜人民极其热烈和亲切的欢迎。在这个告别宴会上，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全体来访的中国同志的名义，向金日成首相同志，向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向朝鲜其他党政领导同志，向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些日子，我们访问了朝鲜的民主首都平壤和东海岸的工业中心咸兴，参观了工厂、农场、水利设施和文化机关，欣赏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会见了勤劳智慧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劳动知识分子。我们亲眼看见了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朝鲜。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已经奠定了自主的民族经济的基础。朝鲜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轻工

业体系，正在不断加强农业的物质和技术力量，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的条件。朝鲜人民的文化艺术，既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内容，又有优美的民族形式，既有高度的政治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朝鲜停战以后短短的十年内，朝鲜人民艰苦奋斗，重整河山，在美国侵略者造成的战争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工业、新的农业、新的文化。看到你们的辉煌成就，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英雄的朝鲜人民，是经过了战争考验和建设锻炼的人民，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有觉悟、有志气、有干劲、有纪律的人民。在这样的人民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你们的青年和少年，爱祖国，爱劳动，艰苦朴素，朝气勃勃。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朝鲜民族的远大前程，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朝鲜的光辉前景。

朝鲜人民的一切成就，都是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朝鲜劳动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朝鲜劳动党，坚决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能够最终赶走美国侵略者，实现祖国的和平统

一；一定能够在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中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这次访问期间，兄弟的朝鲜人民给了我们最真挚、最热诚的欢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在我们访问的地方，还是在我们路过的地方，到处是欢声四起，笑脸相迎。这种情景，是我们每一个来访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欢迎，充满了阶级感情，充满了国际主义感情。这是朝鲜劳动党深入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光辉结果。这是中朝两国人民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的生动表现。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同金日成首相同志、崔庸健委员长同志和朝鲜其他领导同志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团结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就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两党、两国、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朝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伟大的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请大家同我一道举杯，

为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为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革命友谊和

团结，

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为金日成首相同志的健康，

为崔庸健委员长同志的健康，

为朝鲜其他党政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刘少奇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的邀请访问朝鲜。九月二十六日晚，在平壤举行告别宴会。

〔2〕 金日成，当时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祝贺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的电报[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

拉各斯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纳姆迪·阿齐克韦总统阁下：

值此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和阁下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之际，谨向阁下和尼日利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尼日利亚联邦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督纳姆迪·阿齐克韦就任总统。

祝贺乌干达独立一周年的电报[1]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坎帕拉

乌干达总统穆特萨二世阁下：

值此乌干达独立一周年和阁下就任乌干达总统之际，谨向阁下和乌干达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乌干达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祝中国和乌干达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增进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乌干达宣布独立。

慰问古巴遭受飓风灾害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哈瓦那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顷悉古巴东部各省遭到飓风袭击并引起了水灾，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不幸受灾的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坚信，英雄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灾害所造成的困难，胜利前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群众反映》摘登的一封干部来信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

先念[1]同志：

此件[2]请阅，并酌处。

刘少奇

18/10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七十一期摘登的江苏省江宁县一位匿名干部十月八日的来信。信中说：今年江苏稻谷丰收，省委决定用加任务的办法多购一部分粮食。我们认为，加任务的办法不太妥当，会影响党的威信，不利于生产，建议把追加购粮任务改为换购，增加换购部分，这样做，群众不认为是加任务，也不需国家多拿出换购物资，既能完成任务，还可以多购。但是，省委对加任务的工作催得紧，部分地区已经布置下去。希望中央尽速促请江苏省委考虑，最好用比较快的方法，先通知各地注意生产不受破坏，特别在已公布地区，更要加紧做好工作。

对《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和批语[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2]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根据刘少奇修改件刊印。

二

康生、吴冷西同志：

此件又看了一遍，有一些增删，请酌定。

刘 少 奇

21/10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稿）给刘少奇的请示中说：“根据您和常委同志的指示，我们又作了一次修改，现将修改处用红笔划出，送上请审阅，并请于明日（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前退给我们，以便最后定稿。”本篇一是刘少奇对该文一段文字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刘少奇写在该文首页上的批语。十月二十二日，这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2〕 戴高乐，即夏尔·戴高乐，当时为法国总统。

给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尊敬的总统阁下：

荣幸地收到阁下1963年10月17日来信。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总统阁下勇敢坚定的领导之下，为巩固独立、建设国家、发展革命事业、支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的钦佩和敬意。这一斗争不仅关系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前途，而且对整个非洲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将会作出更加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为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得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支持。中阿两国人民在斗争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不久以前，阿马尔·乌兹加尼部长阁下来我国访问[1]，更使我们两国

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在继续反对国内外敌人的神圣斗争中，正面临着一些困难。中国人民在这个时刻支援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由于目前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提供的援助还是不多的。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勇敢行动感到十分不安，它们决不会甘心已经遭受的挫败，更不会甘心阿尔及利亚人民沿着革命的道路顺利前进。它们必然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但是，我们坚信，久经战斗考验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总统阁下坚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勇敢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由胜利走向胜利。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总统阁下和阿尔及利亚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签字）

1963 年 10 月 26 日于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九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邀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率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典，并访问杭州、上海、云南等地。

对印发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批示[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小平同志：

此件似应再印一次，发给各同志仔细看一下，然后再开会讨论。开会日期、地点及到会人数，请你酌定。[2]

刘少奇

27/10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后定名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的通知稿上。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通知稿上批示：“刘、周、朱、邓、彭、瑞卿、伯达、富治、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这个通知后经

毛泽东和中央有关同志修改，于十一月十六日定稿。通知所署时间定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并由中共中央以中发〔63〕745号文件发至全党，直至基层支部。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家英，即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2〕 邓小平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这个通知稿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印发（少奇同志批语印发），可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间可定在本礼拜四（卅一），也请请示少奇同志后通知。"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

祝贺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

雅加达

苏加诺总统并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值此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召开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始人——总统阁下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我们深信，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行将为发展新兴国家的体育事业，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总统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所表现的坚定精神和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和尊敬。

祝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成功和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九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提出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七百多名运动员参加。

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在群众中进行反修宣传试点情况报告的批语[1]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

许立群[2]同志：

此件送你参考。你还可向内蒙再要一些典型材料来作参考。此外，你们可和北京市委联系，即在北京几个单位和中央直属几个单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只要几天时间就够了），然后，你们写的提纲才可以写得更好一些。

刘少奇

9/11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所属盟市、旗县委批转并报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的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九月一日关于在工人、农民群众中进行反修宣传试点情况报告的文件上。区党委宣传部的报告着重反映了包头市进行反修宣传试点中了解到的工人农民思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清

楚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为什么这样严重；担心中国在世界上孤立；害怕中苏不和引起战争，特别怕引起核战争。这些思想问题，主要是不明真相，不分是非，误听谣言所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转发批语中指出：这个材料说明群众对中苏分歧的关心是强烈的，思想震动是很大的，群众迫切要求了解中苏问题的真相。各地应根据中央和区党委的指示精神，把群众中的反修宣传普遍开展起来。应该充分发挥读报组、收听广播组的作用，认真组织群众阅读和收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正在陆续发表的反修文章，并趁机把读报组普遍恢复和建立起来。同时，各级负责同志可以针对群众思想，做些简明、扼要、通俗的报告。在城镇、工矿区，可以组织一批专职报告员，专门向职工、居民做报告；农村、牧区也可以短时间抽调一批干部，经过训练后向群众宣传。

〔2〕 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你们的扩大会议[2]已开了许多天，我看了会议的一些文件，未看完，又听了周扬[3]同志等的汇报。我认为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很必要，很及时。

你们提出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是很正确的。

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和国际的人民群众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需要更深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斗争。需要在中央的各种报纸刊物上，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刊物上，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艺理论及其他各个学术战线上，进行这种斗争。这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是深入到各个方面的，是深入到各个学术部门的。他们的挑战，是从许多方面进行的。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斗争。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粉碎他们进攻。

为了进行这个斗争，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很好地团结起来，参加到这个斗争中去。

必须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斗争中去。一方面，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也为了使更多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提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反资本、反帝、反对“左”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目前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有具体的斗争目标，在目前如果不参加这些斗争，就不能使自己成为好的革命者，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各门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不能发展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是需要发展的。世界革命的规模已经极大的扩大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许多国家深入了。新的经验已经大量积累起来。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就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今后的运动。

在这些新的经验面前，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作出了他们的结论，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攻，实际上否定最重要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全世界向坚持马列主义的政党、政派和个人举行疯狂的进攻。首先向中国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起来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对于被修正主义者所歪曲、篡改、阉割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

确地总结新的历史经验，提出我们的看法，作出我们结论，在全世界人民群众中，树立我们的革命马列主义的旗帜，同现代修正主义对立起来，彻底驳倒、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我们的文章和著作，是给国内和国际上的人民群众看的，首先是给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的。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总结世界革命的新的经验，要正确地分析当前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要对国内和国际的人民革命斗争有所帮助，因此，我们写出并且公开发表出去的东西，应当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应当采取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并且是力求通俗易懂。所有现代修正主义在争论中采取的捏造、歪曲、断章取义、谩骂等恶劣手法，我们都不应当采取。

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需要占有大量的材料，鉴定一些材料，审定一些经典著作的译文。需要就一个专题组织若干人座谈，提出意见，拟出提纲，写出初稿，再进行讨论，然后，再写出二稿、三稿、四稿……。应当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征求读者的意见，也征求党政领导人的意见。我想，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领导人应当尽量同你们合作，尽量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成绩来。

哪些应当写，哪些不应当写，哪些应先写，哪些应后写，一共应写多少？应当分门别类拟出题目，定出初步规划。再组织人员来进行工作。

我赞成出版内部刊物。除开中央出版一个外，每个大区似乎都可出版一个。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论政治性或者学术性的，都可先将草稿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也可以登几稿。再从内部刊物的文章中加以选择，进行加工，然后在公开的报刊发表。为了慎重起见，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中央一级的，先由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央有关同志审阅后批准，各省市自治区的，由各中央局批准。内部刊物的发行范围应有控制。应当规定阅读范围。其他不是专为反修文章，也可在内部刊物上刊出。

反对现修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各个方面的。这个斗争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成败。这是当前世界上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这个斗争中一定会要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一定会要成长许多坚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凡是不畏艰苦，努力学习，努力钻研，不怕犯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人，不论他是党内的或者是党外的，都可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并且使自己得到改造和提高，成为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从而也就可以在学术上作出更多的建树。以反对现修斗争为纲，来带动学习马列主义，各方面的马列主义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

在国际上进行反对现修的斗争，大大有助于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当前我们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外国的修正主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深入各个方面，这样就会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打开人民群众眼睛，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就困难了。我们进行这个斗争是为

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现在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粉碎现修，然后写出我们的各种著作。做好这些工作，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在国内也有伟大的意义。应当大大加强这条战线的工作。应当有更多的青年投入这条战线，扩大这条战线。

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培养这条战线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必须抓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工作。我的意见是：科学研究工作干部应当在适当范围内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进行交流。青年干部应当参加一个时期的基层工作，以后，逐步参加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工作，同时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以后再作一时期科学研究工作，从事写作。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应当避免苏联培养干部工作特别是培养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的某些缺点。这就是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工作的缺点，实际工作者缺乏理论的缺点。这件工作如何具体进行，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研究的。

目前的国际形势到底怎样？

美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台湾蒋介石匪帮尚未消灭，其他一些帝国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我们，印度反动派在美帝苏联支持下反对我们，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又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被修正主义的领导集团所控制。如此看来，世界革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是不是被孤立起来了。我看不是这样。

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出了修正主义，无疑在世

界上要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件好事，并可能成为一件大好事。它可可以教育我们，并教育全世界革命人民，来重新考虑问题。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总是要起来革命的。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并在许多国家已经取得胜利。帝国主义不可能把这些革命镇压下去，修正主义也不可能阻止这些革命。修正主义的丑恶面貌已经在世界人民群众中暴露出来，并将继续暴露。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其中有中国党，越来越取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那些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党内，革命的马列主义左派到处迅速地形成起来。我们完全不感到孤立。革命力量在世界上正重新组合，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相反，帝国主义阵营已进一步分裂。美国现在已无法指挥法国的政策，西德和共同市场其他国家必然要跟着法国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也会跟着摆脱美国。美国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南越吴庭艳[4]被杀害，台湾蒋介石很恐慌。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善。亚非许多友好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

目前革命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到底怎样？在南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南越人民武装力量超过美国和吴庭艳的力量。美国和南越反动派不能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相反，人民武装力量可能把美国人和反动派赶走。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力量已经把法国和北大西洋联盟的反动力量赶走了。

在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只要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如南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就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革命的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

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干了许多坏事，以后他们到底还能干出一些什么坏事来？以后，他们还要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出卖革命人民的利益。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在基本上是不可能取得妥协的。中苏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取得根本改善，也不可能。进一步恶化是可能的。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断交，毁约，不作生意。这些都没有什么。边境事件，已有。会继续有。中苏开战——这没有可能。因为要动员全体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才能和中国作战，而苏联人民是不可能被动员起来和中国作战的。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但最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至于打笔墨官司，那是要作充分的长期的打算的。以后仍然应当很好地进行中苏友好工作，仍然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好的和坏的经验。中苏两国人民是会要永远友好下去的。

总起来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确实是很好的。我们的国内形势也已全面好转，这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斗争。相反，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形势倒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也不能不削弱他们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寿命也长不了。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刘少奇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报告而写的提纲，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2〕 指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

〔3〕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期间任南越“越南共和国”总统。

致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的复信[1]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
朱利叶斯·克·尼雷尔阁下：

我已收到你11月12日的来信，对阁下接受访华的邀请感到十分荣幸，并期待着你的来访。届时，阁下定会受到我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欢迎。

关于访华的时间，我同意你来信中的安排。至于确切日期及其他细节，我已指示我国驻贵国大使何英先生同阁下商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63年11月　日

根据审定件刊印。

注　释

〔1〕 周恩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复信稿上批示："拟同意。即送刘、邓、彭核阅，退外交部办。"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1]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记取这一次洪水和其他各次水旱灾害的经验教训，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决心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把河北水利建设好。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题词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祝贺桑给巴尔独立的电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

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苏丹贾姆希德·本·阿卜杜拉陛下：

值此桑给巴尔宣告独立[1]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桑给巴尔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桑给巴尔正式宣告独立，首都桑给巴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的批语和加写的话[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一

有一点修改，请你们酌定。

刘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根据刘少奇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

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在给刘少奇的请示中说：“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又修改了一遍，文章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一节，重新改写了。送上请审阅指示。”本篇一是刘少奇写在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刘少奇在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封公开信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为题，由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